

炎黄春秋



民国，30年代初期，周谷城、陈伯华、周文斌等人在武汉

周谷城：要科学对待民国这段历史

用中国人的脊梁
保卫大武汉

抗联总司令赵尚志的
壮曲悲歌

援越抗法重大决策

秘录

为包产到户拼搏
无悔的周日礼

10
95



炎
黄
春
秋
创
刊
四
周
年
纪
念



详细报道见本期
第86页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景翼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洪 炉
 丁洪章

执行主编:刘家驹 王恂 舒元璋

理 事 长:杜导正
 名誉理事(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李华鹏 贝兆汉
 理 事: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北京西城区天津街7号
 邮 编:100802
 印 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出版日期:每月15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杂志社电话:6016633-227
 6076801

定 价:3.20 元

专 稿	春 秋 笔	英 杰 谱	人 海 浪
④ 要科学对待民国这段历史 周谷城	⑥ 援越抗法重大决策秘录 张广华 ⑫ 用中国人的脊梁保卫大武汉 陈道阔 ⑤⑩ 周恩来与国民党杀手张冲 仲向平 ⑬ 共和国史册上的大匪患 屈德慕	⑤⑥ 红军总供给部长在乌兰巴托讨饭记 蹇才鹏	③① 包惠僧和陈独秀 张继华

目 录

求实篇	殒星篇	遗闻录	文荟园	信息窗	编读窗
<p>⑥9 ②5 为包产到户拼搏无悔的周日礼 习仲勋和刘志丹的荣荣辱辱</p> <p>田方 江毓池</p>	<p>③4 ③8 抗联总司令赵尚志的壮曲悲歌 出身寒微的「政治夫人」李德全</p> <p>舒云 朱秀海</p>	<p>⑥7 ④7 ⑦4 傅斯年与毛泽东 《文汇报》的苦斗岁月 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访延安</p> <p>傅哲清 傅强 杨培新 金牛</p>	<p>⑦7 ⑧2 伟哉！三峡文物保护工程 柳亚子与毛泽东的诗文</p> <p>冯锡刚 王兆麟</p>	<p>⑧6 《炎黄春秋》过四岁生日</p> <p>赵友慈</p>	<p>⑧5 相濡以沫 共度难关</p> <p>——为一九九六年本刊调价敬告读者</p> <p>本刊编辑部</p>

本期导读

用中国人的脊梁保卫大武汉

大别山麓，积尸如山；滔滔长江，赤血扶岸。作者从当年千里战场拾起一个个悲壮的故事，向我们真情地讲述了这场罕见的战争奇观：120万中国将士是怎样舍死忘生地为民族生存而战。

出身寒微的“政治夫人”李德全

她出身寒微，从小就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她梦想办个医院，可机遇却使她步入国民党高层政坛。日寇侵华，她和冯玉祥共纾国难；蒋介石破坏和平，她组织民主人士声讨内战，她的一条腿还被特务打伤……她一生忧国忧民，赢得世界妇女称赞。

援越抗法重大决策秘录

新中国初建，胡志明秘密来华求援，一穷二白的中国却以礼义之邦的大度，将无偿军援滚滚送往越南。作者用亲身参加者的笔触，颂扬了两党当年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无间。此后几十年世界风云变幻，现在回头来再看看这段历史，是否也有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呢？

刘志丹和习仲勋的荣辱辱辱

三十年代初，刘志丹和习仲勋在外争内斗中几经险恶，终于携手建成了陕北根据地，使延安光复新中国。三十年后，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又被牵进小说《刘志丹》的政治旋流，在劫16年之久。作者亲历此事件，如实地披露了这场文字狱的前因后果。

周恩来与国民党杀手张冲

张冲还是中统特务时，他造谣中伤、布点设网，全力捕杀周恩来。在他和周朝夕相处、理解这位共产党人后，他俩又结为患难。蒋介石封他为上将，他的心却倾向共产党。病疴夺走了他的生命，周恩来的痛哭震撼了国民党，毛泽东也送来情真意切的挽幛。

红军总供给部长在乌兰巴托讨饭记

苏德战争爆发，在莫斯科终止学习的杨至成归途阻绝，为保密，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只好在另一个共产党国家流浪。他打工，割草，放羊，却难得一饱。他曾经管过红军百万粮饷，此时此刻，他不得不沿街要饭……五年艰辛备尝，才辗转回到延安。

抗联总司令赵尚志的壮曲悲歌

英雄的功业，让关东军心惊胆寒；英雄的缺憾，又使他招来暗算。他给人诤进异国囚笼，开除了党籍，为驱出日寇，他回归故土后，单枪匹马也要和敌人作殊死搏杀。他的头颅不知抛向何方，他的悲歌至今还在白山黑水紫响。

为包产到户拼搏无悔的周日礼

那年，安徽灾情严重，一个曾扛大盖枪解放合肥的人民战士，怀着悲愤的心情，建议对深受人灾的农民实行包产到户，为此，毛泽东罢了省委书记曾希圣的官，他也靠边站。粉碎“四人帮”后，他又提出“包产到户”，万里书记采纳了他的意见，还为他顶住了某领导人的责难。

下期要目

- △筹办“抗大”毛泽东点将罗瑞卿
- △邹韬奋、周恩来忧时救国戒知己
- △张克侠将军抗战日记摘选
- △“《新生》事件”与杜重远遇害
- △美、蒋包庇冈村宁次的丑剧
- △张太雷一封残破家书的由来
- △民国初年临城劫车案的台前幕后
- △视饕餮为“治国之要”的康熙皇帝

要科学对待民国 这段历史

●周谷城

——《民国丛书》序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推进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去年仲夏,我曾撰文呼吁《加强近现代史的研究》。《民国丛书》的编纂出版,从根本上说,正是为了保存史料,抢救文献,了解时代,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鸦片战争被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打开大门以来,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在这个艰难的历程中,由于困难重重,成就有限。自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时起,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38年。民国时代,正值社会剧烈变动时期,它是中国数千年剥削制度旧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也是离社会主义新中国最近的一个朝代。就发展言,要了解中国的今天,必须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而了解昨天,比了解前天尤其重要。在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向现代化进军的今天,对民国时期这段历史,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

研究中华民国这段历史,资料不怕多。证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要有大量有效的参考资料。资料大源,便是书籍。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图书,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民国时代,中西文化交流,新旧思想冲突,产生了许多学术著作和历史资料。“五四”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乎变成了世界学术的缩影,各种主义、党派、学派、教派纷纷传入,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一个时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在学术思想界、文化教育界,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民国时期,新旧军阀各霸一方,但他们在实行

反动统治的同时,始终未能达到思想上学术上定于一尊。一些具有不同观点不同倾向的书籍大量出现,以不同方式出版和流传。

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种图书,总计约在十种以上。其中虽然不少是糟粕,但不可否认,确有许多精华及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杰作。对于民国时代的学术成就和图书质量,我们要采取正确对待的态度,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民国时期,不论在语言文字、文学、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翻译诸方面,都有所建树,取得了多方面的学术成果。就历史学而论,其成就是相当可观的。当时的史学界,十分重视史料的鉴别,重视古书的真伪,重视神话传说与真实历史的区别,并突破封建传统观念,运用资产阶级观点或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问题。在这些方面,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他学科方面,亦是如此。民国时代的学术成果,主要表现为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众多学术著作和历史资料。但是,几十年来,我们对于这些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认真地加以传播。一些中青年学者没有机会接触“五四”以来的文化学术著作,对于民国时代的学术成果不甚了解,在学术研究上吃了亏,付出了代价。人类文化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连续性。我们今天要搜集、整理、研究和总结文化遗产,如果撇开民国时代的学术成就,视民国图书资料如草芥,那必然会违反或破坏历史文化发展的连续性。

造成研究民国时代学术文化的断层,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民国图书的馆藏量少和流通不善,书籍难与广大读者见面,严重影响了民国时代的学术成就直接服务于现代化事业。

当前,民国图书成了学术文化界迫切需要而又最难寻的书籍。全国只有少数大城市和几所主要大学藏书较多,但也缺乏完整性与系统性。而且纸张变质,有的字迹模糊不可卒读。十年动乱,人为损坏更加严重。因损失较多,有些书籍已成为孤本。在流通中,只能作为内部参考而不对外开放。同时,由于古籍的影印本与文献复制本的出现,竟形成了民国图书比明清古本、甚至宋元古本更难看到的奇特现象。面对现状,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便是编辑出版民国丛书。我国历来有编纂丛书的优良传统。它开始于南宋,完备于明代,兴盛于清代中叶。编纂时间较近、影响较大的如《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在保存和流通书籍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学术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整理和保存民国时期的重要图书资料,抢救珍贵的历史文献,教育后代,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推进祖国统一和现代化大业,编辑出版一套大型的《民国丛书》,应是当前学术出版界责无旁贷的当务之急,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适逢今世,时不待人,机不可失。我们要抓紧完成这件大事,千万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编好《民国丛书》,既要着眼于当前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要达到保存史料、抢救文献的目的。既要兼顾各科各类之齐备,又要容纳各家各派之并存。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力求系统完整。既要重学术性与资料性,又要注意可读性与实用性。既要重点选收具有代表性、权威性的著作,又要适当撰入某些带有开创性的普通读物。特别要强调的,必须坚持百家争鸣与实事求是的原则。学术观点上,要兼收并蓄,多说并存。不因人废言,亦不因言废人。不能像《四库全书》那样,只收正统派著作,而排斥所谓异端作品。对于评论图书好坏的标准,不能局限于僵化的模式,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这样挑选出来的书籍,在广大读者中,仍然难免见仁见智,纷纭聚讼;但是,希望它能够基本上反映出民国时代学术上的风貌、成就和图书出版的客观实际。



周谷城

为了编好《民国丛书》,一要突破一家一地图书馆的界限,对全国主要的民国图书出版地和收藏民国图书较丰富的图书馆,进行一次全面清查,使挑选书目具有扎实的基础。二要依靠老专家学者。他们是民国图书最初的读者,也是作者和编者,对民国时期的各种出版物最有发言权。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这些优势,努力把《民国丛书》编成中国历史上一部较好的丛书。

自来丛书的编纂,都有赖于多人的合作,群策群力,方可望成功。《民国丛书》的编纂出版,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壮举,是一项无比繁重的工程。在此,我们谨向热心支持这项工程的所有单位和个人,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单位欣然同意选编他们出版的图书。感谢全国各地各大学图书馆慷慨提供他们的馆藏资料。感谢关心选书纂修的各地专家学者以及编委、编辑小组同志们,为选好书目、审定版本贡献了极大的力量。感谢上海书店勇挑重担,独力承担起丛书的影印出版任务。

余不多叙,即以此为序。

1989年元月

中国援越抗法 重大决策秘录

●张广华

胡志明秘访求援

1950年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越南高平省复和县崎岖不平的土路上，有位身材瘦削、头缠毛巾的老人，向中国广西龙州水口关走来。他就是越南共产党（当时称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主席胡志明。随他同行的有负责越南人民军后勤工作的越共中央委员陈登宁以及五、六个助理人员。

胡志明此行完全是秘密的，就是越党中央领导人也只有少数人知道。他刚主持召开了越共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分析当前斗争形势时，全会一致认为“缺乏正规军，缺乏攻坚和攻城的兵种及重型武器，缺乏快速通信手段，缺乏真正懂得韬略的指挥运动战的干部”，是当时抗法战争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会议指出必须加紧培养和建设人民军，建设与新的斗争形势相适应的主力部队。胡志明此次访华的目的，就是向中共中央通报越南抗法斗争的情况，请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帮助建设军队，并派出军事人员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

水口关，胡志明非常熟悉。过去为了越南的革命事业，他多次从这里进出，现在新中国建立了，再次来到这里，心境与过去迥然不同。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广西军区保卫部的一位负责同志率领30多名解放军干部战士，早已在那里等候他的到来。

胡志明缓缓来了，中国同志立即迎上前去。

“谢谢，谢谢。”胡志明说，“这里现在是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边卡，以前我经过时总是左盘右问，担惊受怕，现在完全不同了。”

胡志明是用白毛巾裹着头，化装成伤兵步行来到中国的。他脚穿草鞋，身着布衣，瘦削的脸上，显得有些疲倦。从太原出发以来，十多天的徒步行军，怎能不使这位60岁的老人疲惫不堪呢？

胡志明在广西龙州住了一夜，第二天到达南宁，下榻于民生路金山大酒店。

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和省政府主席张云逸，当晚设宴欢迎胡志明等越南客人。张云逸告诉胡志明：现在广西刚刚解放，土匪特务活动十分猖獗，工农业生产急待恢复，土地改

革尚未开始，我们一定努力工作，使广西成为越南抗法斗争的可靠后方。由于当时湘桂铁路只通车至南宁东北的来宾，胡志明一行由南宁乘汽车到来宾，再由那里乘火车去北京。

几十年来，胡志明的革命活动，许多时候是在中国进行的。在去北京的旅途中，他心情激动，浮想联翩，那些如烟的往事，一幕幕地重现出来：

——1924年，胡志明由莫斯科来到中国广州，他在那里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工作到1927年。“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这个越南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的革命组织，就是他在广州建立的。

——1930年，印度支那共产党在香港成立。那时，他多次由香港来到上海进行革命活动。1938年秋天，胡志明由苏联来到延安，加强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然后由延安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从那里来往于贵阳、重庆等地。

——1940年2月，胡志明在昆明领导越共海外部的工作。同年五月，胡志明与范文同、武元甲在昆明会面，在他的提议下，海外部吸收范

文同、武元甲二人入党。——1940年10月，胡志明由昆明来到桂林，在那里成立了“越南独立同盟会办事处”，不久又成立“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

——1942年8月，胡志明不幸在广西德保县被国民党地方政府拘捕，辗转监押中，胡志明备受折磨。后经中越两党、越南在华侨团以及国民党进步人士的多方营救，才在1943年9月10日恢复自由。

1945年2月，就在同盟国胜利在望的时刻，法军竟向日军投降。

胡志明从昆明回国，迅速召开党中央会议，决定武装总起义，并发表《独立宣言》，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几年间，胡志明建立了一支约10万人的武装，但由于军政素质差，装备落后，难以对付卷土重来的法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攻击……

刘少奇说，援越是 我们应尽的责任

胡志明于1950年1月底抵达北京，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访问，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当晚，刘少奇在中南海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聂荣臻、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人作陪，越方的陈登宁、黄文欢等参加了宴会。

在宴会中，刘少奇谈起胡志明1925至1926年在广州组织越南政治训练班，关切地询问当年训练班同志现在还有哪些人时，胡志明说，



胡志明主席与韦国清在前方

今天在这里的黄文欢就是其中一人，不少同志已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

黄文欢这次是辗转到中国参加亚澳地区工会会议后暂留中国的。

胡志明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在广州举办训练班时，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延年、李富春、恽代英以及领导省港大罢工的一些同志，都为我们讲过课，少奇同志也是训练班的授课老师之一。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同志对越南革命事业的关怀与帮助。”

黄文欢说：“我是广州训练班的第三期学员，当时在广州的仁兴街上课。通过中国同志的讲授，我们学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在第一次大革命中的许多宝贵经验。”

说到这里，黄文欢激动地站起高举酒杯，代表训练班学员向刘少奇敬酒。这杯酒引发了黄文欢的兴致，他继续说：“那时中越两党革命者志同道合，亲如兄弟。当时政治训练班没有食堂，我们每天到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吃饭，常常与中国同

志一起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等革命歌曲。”

按照刘少奇的安排，由他本人参加，有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等人与胡志明等越方同志会谈。

胡志明说，我们非常高兴地迎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你们的胜利提高了我们胜利的信心，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斗争经验。我们希望并请求中国同志帮助我们训练部队，建设一支战斗力较强的越南人民军，帮助我们进行作战指挥，并在物力上给我们以支援。

刘少奇说，现在的国际形势，对越南的抗法斗争是很有利的。中国已决定承认越南，并将与苏联磋商，建议他们承认，使越南获得国际地位。我们党认为，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责任。中国刚刚解放，一切工作均在从头做起，特别是肃清匪特、经济恢复、土地改革等等任务极其繁重，但是我们决心对越南的抗法战争给予支援，此事在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回来后，中

共中央将认真研究援助的内容和方法,我们将根据你们的要求来具体确定。

胡志明知道,对于这样的大事,刘少奇能够明确表态,说明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此事早已有所考虑。

胡志明还告诉刘少奇:他准备尽快去苏联找苏共中央,面见斯大林,请求苏联党和政府给予援助。毛泽东、周恩来都在莫斯科,到苏联去正好可与他们一起商谈。他要中国尽快安排,联系他去苏联的事宜。

周恩来考诚回国 接胡志明赴苏

刘少奇立即把胡志明去苏联的要求向毛泽东报告并转达苏共中央,中苏两国领导人均同意胡志明到莫斯科去。

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周恩来得知胡志明很快访苏时,于2月1日致电刘少奇,并要刘转告胡志明:中越两国已互相承认,并即将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已承认越南,其他各新民主国家估计亦可能承认(越南请求各国承认并建立外关系的申明

文件,我驻苏大使馆已转达各新民主国家的驻苏使馆)。我们为越南加入以苏联为首的反帝民主大家庭致深切的庆贺。

与此同时,毛泽东要周恩来来到中国东北与胡志明见面,迎接胡志明来苏联。胡周两位老战友在东北旅大相见时,互相拥抱在一起。胡志明说,分别十载,我们又见面了。

周恩来向胡志明通报了中苏两党会谈的情况。在旅大略事休息后,于2月3日飞往莫斯科。在飞行途中,这两位老战友又热烈谈起1940年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最后几次相见的情形。

胡志明当时化名胡光,虽然比周恩来年长8岁,却对周恩来以“恩哥”相称。来办事处时,身份是保密的,一般均是周恩来直接与他联系,向大家介绍时,就说“这是越南胡同志,留法时期的朋友”。胡志明住在办事处楼上一间小屋里,随身有架外文打字机,不时在屋内打字,写文章寄往国内发表,他讲话带着广东口音,很像一个农村教师。

“我那时作为八路军成员在中国云、桂、川、黔等地活动,学习了许

多革命知识。”胡志明说,“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给我们启发极大,我们在越南也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不但有劳动人民,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在越南工作的进步的法国人。事实证明,统一战线也是我们越南革命的一个法宝。”

斯大林说援越 主要由中国负责

胡志明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欢迎宴会。斯大林没有出席。毛泽东十分清楚斯大林此时的心态,斯大林担心胡志明是个民族主义者,铁托第二。在与斯大林一次交谈中毛泽东耐心地说明,胡志明是越南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深得越南人民的拥戴,是越南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应尽快见见胡志明同志,问问他有什么要求和想法。

斯大林说:“胡志明同志要求苏联直接向越南提供援助,帮助他们打法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有点不同的考虑呢!”

未等毛泽东说什么,斯大林继续说:“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中国已成为亚洲革命的中心,我们认为,支援与帮助越南的工作,主要由中国来承担为好。”

毛泽东说:“越南需要的主要是武器弹药,也还有其他军事物资,中国不一定都能满足其需求,他们自然希望苏联也给予援助。”

斯大林抬头看了看毛泽东,继续讲他的意见:“中国和越南地理靠近,联系较多,由中国去帮助较为方便。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苏联的重要任务。



韦国清等和越南领导人武元甲等在前线

我们已经打完世界大战，大量的武器装备用不上了，可以把它运到中国去，有些越南适用的，你们当然可以运一些到那里。”

斯大林惧怕引起国际纷争，这对领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来说，已经领教过了。前不久，刘少奇秘密访苏时，斯大林一再强调要“国际分工”。对此，毛泽东再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2月上旬的一天，斯大林在他的办公室终于与胡志明会见。苏共政治局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越南的陈登宁和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等参加了那次会谈。

“我们是亲密的朋友和兄弟。”斯大林说，“见你们晚了一点，请予谅解吧！”

“那里，那里。”胡志明说，“我们对斯大林同志热诚与我们相见，听取我们的情况汇报，是很高兴，也是很感激的。”

胡志明按照事先的考虑，扼要地向斯大林谈了越南共产党的基本情况、当前抗法战争的形势和请求援助的建议和要求。

谈完以后，胡志明望着斯大林。从他的眼神里，可以明显地看出一种希冀和期待。

“我们非常感谢胡志明同志的介绍。”斯大林说话从来就是慢条斯理的，而且迅速进入实质性的内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完全应该援助你们的抗法斗争的，不过，我们与中国同志商量过，援助越南抗法战争的工作，主要由中国负责更为适宜。”斯大林说，“中国与越南相连，比我们更了解越南的情况，中国的斗争经验对越南更有借鉴作用，帮助你们会更加方便。”

按照自己的思路，斯大林继续发表他的想法：“打败法国人，国外的支援是必要的，更重要的还是要将国内各方面的工作做好。发动群



胡志明、罗贵波和顾问团的女同志在一起

众，把广大群众真正动员和组织起来，是打败法国人的关键所在。”斯大林似乎不很满意地说，“发动群众，带领群众战胜敌人，就必须给群众以实际利益，使群众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越南为什么不学习中国党用土地改革来发动与组织群众的做法呢？建议你们尽快研究中国土地改革工作的经验，在越南认真进行这项工作，相信你们搞好这件事情，会加快打败法国人的进程。”

“我们曾考虑过这件事，由于军事斗争任务重，未能下决心去做。”胡志明说，“看来关键是我们没有真正弄清土地改革与抗法战争的关系，也没有完全认识土地改革与发动群众的关系。我们党将尽快研究并着手进行这一工作。”

苏越两党会谈结束了。胡志明知道，援越工作今后将主要由中国承担起来。他非常欣赏用《中苏友好同盟互组条约》那样的办法，把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与巩固下来，确信那是一个巨大的力量源泉。他很想越苏之间也有一个类似的条约，并寻机向苏联共产党提出这个问题。

2月16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盛宴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苏联党政军负责人几乎都参加了，胡志明等越南同志也应邀出席。斯大林情绪很好，席间不断与客人谈话。胡志明抓住这个时机，微笑地问斯大林：“您对我们越南的工作还有什么指示？”

斯大林笑道，“我怎么能指示你，你是国家主席，官比我还大呢！”

胡志明又说：“你们同中国签订了条约，趁我在这里，我们也订个条约吧！”

斯大林说：“那人家要问你是从那儿冒出来的呢？我们如何解释啊！”

胡志明答道，“那很好办，你派架飞机把我送上天转一圈，然后再找些人到机场欢迎我，在报上发个消息不就行了么？”

斯大林大笑说：“这倒是你们东方人特有的想象力。”在场的许多人都都大笑起来。

**毛泽东说，中国
只能向越南派
土顾问啊！**

2月17日下午，毛泽东、胡志明

与周恩来乘火车回北京。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到火车站送别，在车站上举行了欢送仪式，毛泽东发表了告别讲话，秘密访苏的胡志明安静静静地坐在车厢里。

毛泽东踏上归程后，决定每到一个大站，都下车看看，了解铁路沿线各地的情况。胡志明非常赞同毛泽东的安排。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他们参观了一家机器制造厂和斯维尔德洛夫大学。

——在鄂木斯克，在游览市容后，参观了机器工具制造厂。毛泽东看见该厂部分成品正在装箱出厂，陆续运往中国。

——在新西伯利亚，参观了两个军工厂，观看了芭蕾舞剧《伊戈尔王子》的片断。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参观了生产自动联合收割机的工厂，观看了俄罗斯的歌。

——在伊尔库茨克，游览了市容，参观了茶叶包装厂。该厂茶叶都是中国进口的。

——在赤塔，参观了幼儿园。胡志明特别喜欢儿童，孩子的歌舞引发了他极大的快感。

列车继续东去，下站就是苏联的最后一站——奥特堡尔。

胡志明凝视窗外，远方天际群山起伏，峰峦覆盖着终年积雪，铁路两侧的原野上也是一片白色。他微闭起双眼，回味着苏联之行和一路见闻……斯大林说援越工作主要由中国去负责，可是中国会给什么军事援助呢？中国会给越南派出军事顾问吗？

胡志明决定向毛泽东问个明白，便来到毛泽东的车厢。胡志明开门见山地用中国话说：

“毛主席啊！斯大林不准备直接援助我们，也不同我们签订一个条约，越南今后的抗法战争只有靠中

国援助了。”

毛泽东亲切而又友好的凝视着胡志明：“我们是兄弟党，又是近邻嘛！在军事物资上尽量援助你们是应该做的，这当然是我个人意见，决定还要由中央去做了。”

毛泽东觉得还应把中国的情况再说清楚些：“你们当然也了解，中国的军事工业是极其落后的，我们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解放军打败蒋介石，主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绝大部分是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送来的，我们连一张借条都没给他打呢！”

“法国人的武器装备是不错的，可是我们缴获的很少。”胡志明说，“今后我们要很好学习你们的经验，可是我们的人民军装备落后，很少训练，更缺真正懂得战略战术的指挥员。因此，我们还请中国派出军、师、团、营各级军事顾问，帮助我们训练部队、建设部队和指挥作战。同时，我还想，如果中国还能派出……”

毛泽东沉思片刻：“胡主席呀！有些问题要根据今后各方面情况从长计议与考虑，是不是暂时可以不谈。关于向越南派军事顾问的事，与援助军事物资一样，我是赞同的。你要武元甲同志提出一个具体方案。我们回到北京后，中央也要具体研究一下，做出正式决定。”

“不过我要说清楚。”毛泽东说，“我们派去的干部是些土顾问啊！”

到北京以后，胡志明向中国政府提出，任命黄文欢为越南政府和党驻中国的代表（后改为大使），毛泽东表示同意。

中国军事顾问 团秘密入越

1950年3月9日，我党联络代

表罗贵波抵达越北印支中央所在地。他与胡志明、武元甲等越南领导人研究以后，一致认为当前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打通中越边界的交通，以保证援越物资能顺利运往越南；为此，就必须在越南北部的高平、老街地区作战。3月19日，罗贵波电报中共中央：越方拟组织高平、老街地区战斗，歼灭那里的敌人，并要求中国选调军、师、团、营干部若干，充任越军顾问。

接到罗贵波报告后，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很快做了商讨，一致认为应该满足越南的要求，尽快组织军事物资援助越南，筹组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

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援助越南是完全无偿的，没有任何条件的。我看凡是越南实际需要，我们又有的，就尽力提供，物资要给，军事顾问也要派。”

中央军委根据中共决定，很快确定韦国清为军事顾问团团长。

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要韦国清持信找各个野战军领导，请他们为军事顾问团选派干部。

韦国清拿着刘少奇的信，先找到邓小平：“邓政委，中央决定要我去越南军事顾问团工作，少奇同志要我向你们汇报，请二野为顾问团选调一批顾问人员。”说着把信件交到邓小平手中。

当年百色起义时韦国清还是个红小鬼，邓小平把自己老部下送来的信看了一遍，微笑着说：“这样吧，我们好在都在这里开会，你一个一个人去找太辛苦了，我们一起去找他们商议一下！”

邓小平与韦国清来到林彪住处。他对林彪说：“中央决定派军事顾问团去越南，韦国清来请我们各野战军选调干部，少奇同志还带了信来，我们一起去彭老总那里商量一下如何？”林彪表示赞成，便一同

到了彭德怀住处。

彭德怀与林彪分别看了刘少奇的信以后，彭德怀高兴地说：“现在国内战争基本上结束了，你们要什么干部就给什么干部，要多少就给多少，我们全力支持。你要多少人说吧！”

韦国清说：“越南现在组建有3个师，有的是罗贵波去后刚组建起来的。越方意见，除总部机关外，第一步要选派3个师的各级顾问去越南。”

林彪也随即表态说：“我是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要多少人就给多少人，决不打折扣，而且一定选调好的干部去。”

邓小平说：“我看3个师的顾问由中央去决定分配吧！军事顾问团团部人员，为工作方便，就由你所在的第三野战军选调如何？”

韦国清说：“这样办好，我再向少奇同志报告。”

第二天上午，韦国清赶快来到中南海向刘少奇做了汇报。

刘少奇说：“小平同志的意见很好，团部人员就由三野选调，那3个师，还有一个学校的顾问，要发个通知向各野战军明确分配一下吧！”

韦国清说：是否由二、三、四野各选调一个师的各级顾问，军政学校的顾问和教员，由四野就近选调吧！”

刘少奇说：“这样好。一野在西北地区，任务也很艰巨复杂，人员又少，这次就免了吧！你把这个考虑向聂总报告，看他还有什么意见，请中央军委发个通知！”

4月17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从第二、三、四野战军各调1个师从师到营的各级顾问，由三野调配军事顾问团本部工作人员，组成赴越军事顾问团。另外，由四野调配越军军政干部学校的全套顾问和教员。

“通知”中具体规定了选调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六个条件，如“政治上完全忠实可靠，思想进步，纪律性强，作风正派，能团结干部”、“有一定业务能力及一定社会知识”、“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年龄在40岁以下”等等，还强调此乃一件十分严重的政治任务，必须“认真送选，由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亲自审查，并经中央最后审查，不合格者退回另调。”

在军事顾问团没有进入越南以前，胡志明点将，请陈赓先去越南协助筹划与组织边界地区的作战，中共中央同意了胡志明的要求。陈赓在7月7日率领二野调给顾问团的人员离开昆明赴越南。

6月27日上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中南海颐年堂亲切接见北京的40多名顾问人员。毛泽东说：“不是我要派同志们去越南，是胡志明主席到中国来向我们要的。我们革命先胜利了，就应该帮助人家，帮助他们就叫国际主义嘛。”毛泽东又说，“在历史上，中国欺负过越南。”毛泽东详细地讲了汉朝“马援征交趾”的故事。毛泽东说：“你们去越南后要对他们说，我们老祖宗欺负你们，我们向你们陪礼道歉，并一心一意帮助你们打败法国殖民主义者”。“你们到越南去，要旗开得胜。”

接见结束后，韦国清、梅嘉生、邓一凡三个人就在颐年堂商量起顾问团的工作。韦国清说：“中央要我抓顾问团总的工作，我只好照办了。我考虑司令部一头就由梅嘉生同志来主持，嘉生同志就是参谋长了；政治工作一头由邓一凡同志来负责，就是政治部主任了。”后来进入越南，梅、邓均为军事顾问团副团长，而顾问团同志仍称“梅参谋长”、“邓主任”。

三个人正在商谈时，刘少奇又

走进颐年堂，说：“你们还需要什么人，尽管提出来，然后我们来批准就可以了。你们还有什么困难问题也可提出来。”

韦国清说：“中央已给我们安排得很周到了，答应为每个同志破例地发派钢笔、皮鞋、手表，还准备把家属认真安排，大家十分满意。”

顾问团抵达南宁后，广西省主席、省委书记张云逸见到自己在1929年12月领导百色起义时，一直在红七军成长起来的韦国清担任中国援越抗法军事顾问团团长，分外高兴，并应韦国清要求，向军事顾问团全体同志做了一次重要讲话，帮助韦国清做了一次很有作用的思想动员工作。

顾问团在出国前，制定了《军事顾问团工作守则》，使大家在今后工作和行动中有了明确的准则与要求；成立了以韦国清为书记、邓一凡为副书记的军事顾问团党委，成员有梅嘉生、马西夫、李文一、邓清河等。

1950年8月9日，军事顾问团由南宁启程。途经田东、百色、靖西，在8月12日拂晓到达越南高平省广渊地区人民军边界战役前线指挥部驻地，受到武元甲、陈登宁等越南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

在越南抗法战争中，中国是唯一提供无偿大量军援的国家。据有关资料，中国援助越南人民军枪支15万多支（挺）、火炮3000多门，以及大量的弹药、车辆、被服、粮食、副食及其他如蚊帐、毛巾、瓷碗等日常用品。在往后的援越抗美斗争中，中国提供的无偿军援价值竟达二百亿美元之巨。

（张广华：原军科院研究员，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秘书，与人合作著有《战略学》、《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等。

（责任编辑：刘家驹）

用中国人的脊梁 保卫大武汉

●陈道阔

史家认为,1938年6月12日,日军攻占安庆的那个雷雨暴烈、天昏地暗的中午,就是拉开历时四个多月武汉会战序幕的时刻。

笔者顺着当年日军从安庆登陆的路线,逶迤西行,……使人黯然伤神的是,笔者走过的许多地方,对于抗日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战役——武汉会战——20余万民族烈士的悲壮故事,除了唇腐齿落者的口碑,方圆千里战区,已渺渺无痕。

幸存的老者,你哭什么?

然而,真正值得一哭的,不是你们!

于是,我艰难地记述出本文,并

不是仅仅为了纪念我们的胜利……

双方倾其国力

早在国民政府撤出南京驻节武汉之初,蒋介石和阁僚们就拟定了《第三期作战计划》,已勾画出武汉保卫战的决心图。马当、田家镇、黄鄂三大要塞夜以继日的紧张施工,还沉船封江,彻底断航。中共派驻武汉的领导机关以他们最富感召力的口号,更是使武汉三镇热血沸腾。

日军大本营于台儿庄会战结束之际,便开始拟定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决定会师徐州,西取平汉而南

下。为准备进攻武汉,只留两个师团在本土,而把34个步兵师团倾在了中国战场。日军大本营从4月4日开始,组建了9个师团,其中的5个师团将部署到华中战场。

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上集结了80万精锐主力。中国凭借的仅仅是兵员优势。日军的军费开支一年就是50亿日元,是中国一年财政收入的5倍。日军仅投入中原战场的飞机就有500余架,坦克、装甲汽车5000余辆,大炮3000多门……在这样的敌人面前,只能像台儿庄战役一样,用千千万万血肉之躯,筑起保卫武汉的防御阵地!

此时,日军的攻击态势使蒋介石悚然心寒,他得到的谍报是:日军第五、第一、第一一四师团以及第三、第五、第十三旅团正沿陇海铁路两侧急速西进……胡宗南部已被阻隔在豫东战场,战不能战退不能退,随时都有不测……

蒋介石深深望着地图上的那条横贯东西九曲十八湾的黄河兀自站立了许久。不久前,有人建议他以水代兵,组织部长陈果夫还提出了具体方案……

第二天,6月1日上午,军事委员会部院以上长官齐聚珞珈山中央会堂小会议室。作战厅厅长刘斐指



蒋介石在武汉部署武汉会战

着挂图概述了敌我态势之后，宣布作战部署。

“……为了阻敌西犯，确保武汉会战的顺利展开，依据党政军各领导多次建议，决定于郑州以西实施黄河决口，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率部负责实施……”

历史，蒙上了一层乌黑的云烟。

面对泰山压卵而来的日军攻势，愈来愈多的党国要员把他们悲怆的目光，投向那条默默无语的滔滔的大河。

蒋介石 用黄河抗战

挖开黄河花园口，“功劳”首推商起予。

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把最高军事委员会关于挖开黄河大堤的命令，转达给前敌总司令薛岳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行政长官朱庸、陈慰儒等，留下工兵上校参谋王果夫驻郑督办，他连夜率领长官部的幕僚们开拔往洛阳。

薛岳因归德的失守，心情非常不好，愤愤地说：“将士无能，只有拿黄河抗战了！”他把挖堤的任务交给第二十集团军具体实施。

第二十集团军下辖第三十二、第三十九、第五十三军。总司令商



黄河决堤，中原人民在水中逃难

震，号启予，有时也用“起予”，同时兼任第三十二军军长、河南省政府主席、河防总司令。商震时称海内豪杰：“陕西之于右任，烟台之商启予”。他早年追随孙中山，转而投靠袁世凯，再而依附阎锡山，再后来，他成了蒋介石的股肱之臣。本世纪七十年代初叶，他又成了毛泽东的坐上宾，90高龄病逝于日本东京后，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牺牲祭祀，光耀泉壤。

这天一早，商震就带领参谋长魏汝霖等，驱车直抵赵口。

真是天怒人怨，扬起弥天黄沙，五步之外便一片模糊。灰蒙蒙的尘雾里，五六百人发出的铁镐声，脚

步声，泼水声，扁担吱呀声……在呼啸的风暴中闪烁沉浮。

商震被士兵们一色的赤臂短裤所组成的劳动场面感动了，他扬臂高呼：“同志们，猛劲干！我宣布，给完成任务出色的施工部队奖赏一千元！”

工地上静了一会，随即爆发一阵吼叫：“啊——一千元！……”

商震怕兵力不够，命令驻防邙山的新八师移住郑州东北郊开掘花园口。

郑州失守，赵口掘堤失败，国民党溃军像滚豆般涌来。蒋介石口谕：赵口失败原因待查，花园口务必成功！



黄河决堤后，我军涉水出击东岸之敌

1938年6月9日上午8时,中原大地剧痛般的痉挛颤抖,黄河堤“哗”地撕开,黄得呈铁锈色的河水奔涌而出,一道高高的水墙席卷而下,沿贾鲁河直扑涡河而去,23个村庄顿时一扫而光,95个村镇没入水底。淮河顷刻暴涨,蚌埠为之陆沉。洪泽湖如煮沸的豆浆,四围漫溢,一日数尺,临淮、成河等滩头大镇,如海市蜃楼般地云散烟消。

豫、皖、苏三省44县市。受灾面积1万3千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250余万,390多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90万人死于非命。

这个结局是正挥师南下的日本军队土肥原没有想到的。现在,开封以西全被黄水覆盖,他的师团全部撤进了中牟县城,在县城四周筑起堤坝,堵塞城门,犹如困守在孤岛。土肥原觉得他的雄才大略和精兵十万全陷进一堆烂泥。

卢沟桥事变后,他土肥原跻身军界,便成了一个直接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那时,他仅指派一个大队的日军,以占领宝莲寺为发端,中国军队被逼向黄河,不敢回首。这回,他指挥第十四师团顺着平汉线南下,血洗长垣城,屠杀1700余平

民,200多妇女被轮奸后一一处死。接着攻下浚县,屠杀4500人,受辱妇女540多,浚县无家不戴孝。

土肥原几乎战胜了他到中国后的一切对手,对来自天水的黄河却毫无办法,此时此刻,他沮丧地向自己挚友告别:“中岛君,我要走了,非常对不起呵,请多保重!”……

黄泛区的出现,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攻占武汉的作战部署。

在广阔千里战场 水陆空一起上

对黄河花园口决堤后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中国统帅部策划已久,李宗仁认为,鉴于日军重兵集结于徐州一带,其有可能沿大别山北麓西取信阳,再南下武汉,此乃捷径;陈诚则判断敌人沿长江,取九江,经南昌切断粤汉铁路,合围武汉。蒋介石倾向于陈诚的分析,便把自己以为最得力的战将放在那关键处所。

现在长江南岸的马当要塞已暴露在敌人面前。要塞的长山、黄山等炮兵阵地掩体,以钢筋水泥脱模而成。30余门大炮是从已作封江殉葬

的“大同”、“自强”等19艘炮舰上拆下来的,仍是威镇要津的重型武器。军令部设计的水雷900余颗也布上了马当水域。

中国空军也受命出动,连续三批轰炸了香口江面的日本近藤舰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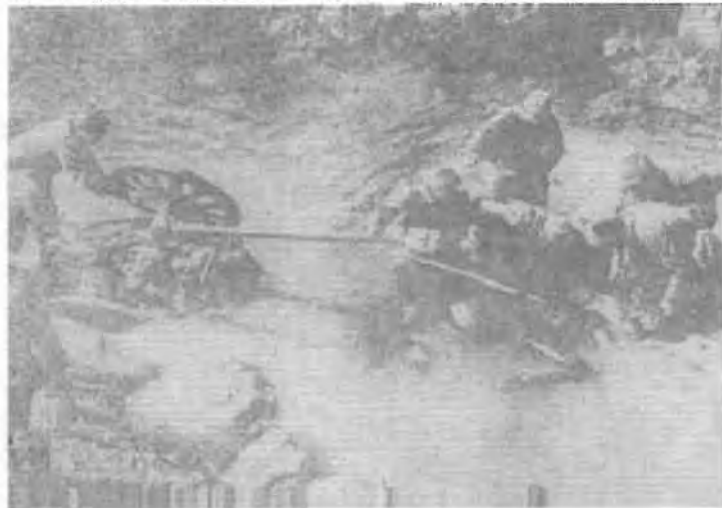
这一晚长山像一堆失火的爆竹,轰鸣了整整一夜。一日本随军记者小侯行男三天后采访攻打长山的“勇士”时,新泻人浅泽七郎大尉表情异常激动,他的右手吊着绷带,挥舞着左手神采飞扬地说:“……部队从香口登陆后,就直扑湖口,晚上8时,敢死队冲进了白天怎么也没有冲过去的湖道,中国人在岸上每隔几十米就建立一个碉堡,还用重炮从两边山丘上交叉轰击。我拼着命冲过封锁线,挥着军刀在黑暗中与敌人肉搏。真叫人心痛啊!士兵们一个个相继倒下,后续部队被敌人抄了后路,我们,伏在地上等待天亮。天亮后又开始拼杀。这场混战持续了30多个小时,敌我双方尸体堆成了小山。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而我们只是杀进了敌人前沿阵地。活着的没有一个身上不挨子弹的,你说说,这是不是一场激战!……”

26日傍晚,硬顶了两天两夜的长山中国阵地,被日军截成了数段……

马当要塞失守后,近藤的海军扫除马当附近水域590余颗水雷,于6月28日启开长江水道,一步步逼近九江。

这时陈诚来到九江,在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上将的陪同下,视察九江战区的防务。

九江市柏油马路被挖得体无完肤,每个路口都设置着铁丝网、沙袋等街垒工事。许多民房屋顶和墙上刷着鲜艳的星条旗、米字旗等旗徽。西天主圣在九江的仆人——教会组织在发中国人国难财,说涂上外国



日军也陷进黄河的汪洋

国徽，日机就不会丢炸弹。每买一个版权50至100元法币。街上除了头戴宽边钢盔、身背斗笠的粤籍官兵，渺无人迹。

陈诚巡视了整整一天，没有一点劳顿颜色。他的第九战区60余师60余万人，仅九江沙河这一块三四百平方公里的地面就集中了30个师兵力。

第二天，第九战区师以上主官齐聚莲花洞，陈诚说，“想听听弟兄们的高见”。

陈诚在此行之前，蒋介石在武昌广里堤省府行营召见了，指头在自己的股肱战将面前一点一点，语重心长地说：“薛修啊，这个仗绝对不能像淞沪抗战的打法。日军的企图是消灭我主力，我们的方针是力求战而不决。我们应只以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进行保卫武汉的消耗作战，保留百分四十的兵力作今后持久战。能守到8月13日，或支持到8月底，时间越长越好。”不可拼得太猛，更不可退得太快，这个仗就要陈诚具有特别的指挥艺术。

众将官各抒己见，吐词铿锵。最后，陈诚淡淡一笑，开始不紧不慢地阐述他的“三线布阵、交替防守、轮流歼敌、步步为营、层层抵抗”的战略方针。他整整唠叨了三四小时。

日机这几天发疯地轰炸九江一带国民党军阵地，国民党军空军出动220余架次，炸沉炸毁近藤英次郎舰船10多只。

隔三差五的武汉上空空战，也就成了二战期间中国战场的特殊景观。

第一次大空战发生在2月18日。近40架日机沿着长江悠哉游哉地溯江而上，他们哪曾想到，武汉的天空电光石火，已设下十面埋伏。中国空军第三、第四大队分别从孝感、汉口机场起飞，26架苏式E15型战斗机和27架美式霍克三型战斗机

立即投入战斗。

近百架飞机，在武汉上空奔雷走电，绞杀一团，机枪吐着火舌，伤者拖着浓烟，你追我赶，上下翻腾。日机上的红太阳与我机上的白日徽在长空

飞旋流泻，划出条条闪电。这一战，共击落13架“红太阳”。

武汉空战的序幕至此拉开，愈演愈烈。4月29日是裕仁生日的“天长节”，为天皇祝寿，日空军决定大举轰炸武汉。当日机首批战斗机进入武汉上空时，我三、四大队奋起迎击。日军第二航空大队又倾巢而出69架，在佐世保的亲自率领下，大有将中国空军一口吃掉之势。

南天远方，麻麻点点似一窝黄蜂，驮着沉雷滚滚而来。苏联志愿军空军战斗机大队，在老将拉赫曼诺夫的率领下，也急驰武汉上空。一时间，二百余架飞机在武汉的天空搏杀，马达声、枪炮声、呼啸声、爆炸声……一架架日机拖着浓烟陨星般地划过长空，栽向天际。……

空战整整进行了30分钟。共击落敌机23架。

武汉保卫战之前的5月下旬，中国空军还飞临日本本土上空，投放“宣传弹”。从精神上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者。

全面抗战， 蒋介石留了一手

1938年7月6日下午3时，国民参政会首届会议在汉口上海大戏院隆重召开。

蒋介石刚站上月牙形的讲台中



周恩来在武汉

间。“哗——”800余双巴掌一起挥动，激烈得似一项体育运动的拍手比赛。

蒋介石摘下洁白的手套，也拍起手来。他微笑着用显得分外黑亮的双眼扫视着全场。真正使他陶醉的是，台下为他鼓掌的不仅仅是他的选民，更多的却是与他他不共戴天的生死政敌。

对政治家来说，最动听的莫过于敌人的赞歌了。

冯玉祥，焕章“如胞兄”……蒋介石笑眯眯地向第一排的这位浓眉大眼虎背熊腰的赳赳大汉点点头。

蒋介石的目光移向冯玉祥右侧的陈济棠，向这位前不久还在翁半玄、詹天眼两位阴阳术士的蛊惑下，图谋天下神器的“南天王”点了下头。

蒋介石注意到了。王明——陈绍禹，共产党驻武汉代表团第一负责人，还有他身边的周恩来、秦邦宪（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都在鼓掌。

蒋介石张开双臂，似在指挥乐队一般，示意已延续太久的掌声停下来。他运足底气，开始讲话：“各位先生，今天国民参政会举行开幕典礼，中正躬逢其盛，很觉荣幸。当此寇军深入、强敌压境之时，诸君集合一堂，这在民国历史上实有最重大的意义！趁今天开幕之机，兄弟有几



我军在九江湖区作战

点意思要贡献给各位……”

虽然是宁波口语，但抑扬顿挫，吐词清晰，在麦克风的润色之下，大厅里回荡着一篇决战宣言的道白。

鉴于朝野一再抨击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政策，蒋介石听取各方意见，在3月29日至4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组织国民参政会，“集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自清王朝覆灭之后，日军的屠刀终于斩断了中国内战连年的乱麻，使青天白日的徽章缀在了每一个军人的头顶，也成全了蒋介石此日此时九五之尊的最高殊荣。

“……我们的国民参政会集中了全国各阶级各团体最有道德、最有学问经验的贤才，表示我国一致抗战的决心和行动，这实在是给敌人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们全民族的力量集中起来殊死斗争，必然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台下爆发出似乎等待已久的掌声。

清瘦白净的汪精卫，夸张地高举着双手拍击；肥胖臃肿的孔祥熙在程式化的鼓掌。

就在昨天，7月5日，汪精卫的特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秘密到了东京，当即在离皇宫不远的陆军省官邸和陆相板垣征四郎讨价还价后，接着会见内阁首相近卫公爵，要求近卫放弃“不与国民政府为

对手”的方针，保证“日本政府愿意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的中心”。汪精卫以为高的行动瞒天过海，其实蒋介石洞若观火，而孔祥熙的香港基地这几天也忙得不可开交，孔令侃承乃父的旨意，和父执日人萱野长知等频频接触，寻找“化干戈为玉帛”的最佳方案……

也就在蒋的誓言赢得掌声雷动的此时此刻，一架美制霍克75式歼击机正穿云破雾，向东方飞去。

这是中国空军仅有一架最快的飞机，飞行员汤卜生，空军学校三期毕业，公认的技术尖子。

汤卜生的任务是将蒋介石的一封绝密信空投给代表天皇来南京慰劳日军的裕仁长弟秩父宫亲王。

在这封信上，蒋介石委婉地提出，只要日本停止关内的活动，可以考虑承认日本对东三省的主权。

汤卜生技术虽好，城府却差，把个直飞南京的天字号机密炫耀于袍泽，竟弄得一时间飞短流长，空军政治部不得不编出一个飞行员南京谒陵的惊险而动人故事来掩人耳目——

那冯玉祥、陈济棠、阎锡山……什么的桂系、粤系、西北系，川军、湘军，东北军，好收拾得很，周恩来，共产党，心腹之大患啊！

陕甘宁，秦川八百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北方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扬威

晋中，第一二〇师进军绥远，第一二九师跃马太行……金边银角，大气浑元；在南方新四军那儿，桐柏烽火，浙闽旗开，鄂赣龙虎，苏皖貔貅，人家一个小小的营团序列也可浸润千里，割据一方，前景着实堪忧。

毛泽东也是钦定的参政员。他没有到会，发来了言简意赅且文词古雅的贺电，说：“……泽东备员一席，因齿病及琐务羁身，未能亲聆诸公宏议。就管见所及，凡有利于抗战建国诸大端，已托其他同志，并案详陈，效其绵薄。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

毛泽东不可能到会。他太了解蒋介石了。

一个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政权，所谓的“参政会”，不过是一个招徕社会名流的政治沙龙。

在国民党里，也有一个人把蒋介石的抗战誓言信得很足，声嘶力竭地高喊着抗战口号。

“领袖如果不抗日，我和同学们一起打倒他！”

陈诚，在接见西安的学生代表时，这样说。

当蒋介石的讲话结束，长时间的掌声后，陈诚腾地站起来，一口浙

江话大声而又谦和地说：“各位参政员先生，小弟今晚准备了一台文娛晚会，抗战戏剧《保卫祖国》，请先生们一定赏光！”

就在参政员们为《保卫祖国》的故事热泪盈眶的时候，12万支冲天燃烧的火把烧红了武汉三镇的天空。蜿蜒在中山路愤怒的火，走在最前面的是郭沫若、田汉等文化巨子。

应该说，是共产党的主张和艰苦细致的工作，点燃了武汉三镇的滚滚激情。汉口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八路军办事处，“一门二中将，三楼四参谋”。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是武汉会战的政治工作指挥中心。

郭沫若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说，此日武汉民众的抗战热情“掀翻了武汉三镇”。汉口车站拥挤着参军上前线的热血青年，一车500人，一车又一车……。5座固定献金台，3座流动献金台，一时间募得法币超过100万。那时的法币1比1兑换银元，因质轻好携带，币值比银元还要坚挺。参加献金的人数达100万人次以上。

江汉关前，国民政府参政员邓颖超和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六位参政员来了，他们捐献了自己7月份参政员的全部薪金，邓颖超的是250元。邓刚走了，来了两位中将，一个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一个是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周恩来的薪金比他的妻子少10元，240元，也全部交给了献金台上的工作人员。

毛泽东从延安打电报到武汉，捐献他参政员的全月薪金。上将戎装的陈诚，在众目睽睽之下走上武昌司门口献金台，将1万元的兑条小心地放进箱子里，转过身来，高高地举起双手，向龙游蛇走般的长长的献金队伍致敬。

献金的多是孩子们。他们成群结队，在教师的带领下，有的抱着扑满，有的捧着银币，像交答卷似地列着队走向献金台。这一天绵延不绝的献金队伍，包罗了武汉三镇的特色人物，商贩市民、富户小康自不必说，有卖蚕豆、卖报纸、卖纸烟的打着赤脚的小孩，还有浪艺，苦力，妓女……报章载文感叹：商女也知亡国恨！

冈村宁次到 前沿督战

8月22日清晨，日军近藤海战队、波田支队以及第一〇六师团，按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19日命令，扫雷艇开道，炮舰护航，在飞机掩护下，运输船满载南九州的海盗后裔，向九江发起了攻击。

冈村宁次发布攻占九江的命令后，第二天就把指挥所移到了彭泽。在冈村眼里，中国军队是不堪一击的，“我一个旅团足以击败国民中央军三个正规师，杂牌部队五个师。”他在日记里这样断言。

早年，他在北海道屯兵营任职，有一天他训练两个新兵排，他喊口令：“目标正前方海面，持枪，开步——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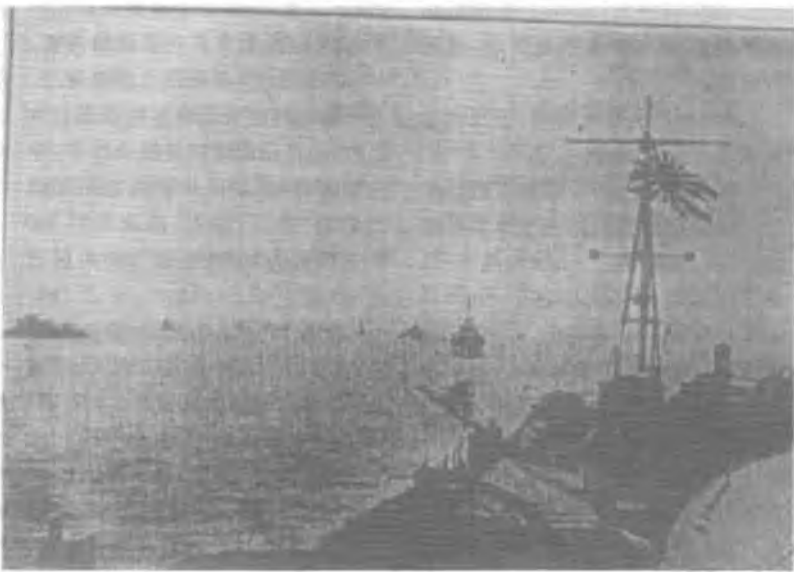
两个排长指挥两排新兵，喊着“一二一”向海边走去，到了悬崖边，一个排长喊口令：“原地踏步！”

另一个排长领队走到大海悬崖边，却突然喊出口令：“冲呀！”新兵们一个接一个跟着排长跳进海里。

冈村下令将早准备好的救生圈扔进海里，把在海浪中挣扎的排长和新兵们一一打捞上来。而那个下达“原地踏步”口令的排长，他不由分说就地枪毙，新兵们悉数关了禁闭。冈村的这一非凡举措在陆军省看来，正体现了武士道精神的精髓之所在……

冈村在石钟山古寺一僧房挂上了作战地图。山下就是他步兵的前沿哨位。把指挥部安置在敌我视线内，令从本土前来看望他的故执惊异不已。

日机在九江上空盘旋，不断地投弹扫射。松浦师团和波田支队从姑塘登陆后，中国军队李汉魂指挥



在长江水面上向武汉攻击的日军军舰

陈公侠第一五五师、孔可权第一八七师、吉简章预六师、赵锡田第三师等部顽强抵抗。日军以弹幕掩护大小船艇突击，孤注一掷地冲进了滩头阵地。江滨一场白刃格斗从下午四时直杀到太阳西沉，街巷堤面摆满了尸体，江堤汨汨流下的紫血使波滔扶岸为赤，长江镶上了一条红边……

这一股敌人终于一个不留地被歼灭了，但龙开河西岸阵地被敌人突破。当敌人怪叫着冲过铁桥，向第二十六团二营阵地涌来时，全营官兵在营长率领下，一把把刺刀迎上去，将敌人捅得七零八落。波田支队在马当长山缴教过中国军队的刺刀，近藤海战队第一次发现中国也有视死如归的勇士。

都杀得精疲力竭了，龙开河两岸乃至江滨，空寂渺然。市区没有一星灯火，如一片阴森的坟地。

这晚，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了九江防线。

屠杀南京的六师团 又血溅长江北岸

九江得手后，在长江北岸的稻叶率他的第六师团疾急西进，逼近宿松城。

大别山下，号枪传响，国民党军在夜色中频频出击。

28日激战一天，烽火山岿然屹立。守卫在这里的第六十军军长刘汝明，曾是冯玉祥一手拔拽起来的，中原混战时冯部多出宵小，他却算得上是个重义轻利之士。早在长城抗战时，他便亲率手枪队活捉日军大佐，扬威罗文峪。这次刘部群雄争先，人人仍以大刀迎敌。

这一场血战，从营长到小兵全在和敌人厮杀中战死。500英雄之血，使烽火山为之色变。稻叶沿途经过大大小小290余战，直到8月2

日才占领黄梅。

几位老人指点着远近高低的大小山岭，向笔者介绍当年的战斗情景，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72岁的张在田说：“抗战完了我回来，哎呀，我们这四望山啊，满山都是人骨头，白花花的像晒了一山的红薯干。我们把死人骨头拣一起，还有没烂的鞋底鞋帮，堆得有楼房高呢，然后就打石头，圈着那些白骨骨头盖了一座塔，叫骸骨塔，每年九月里，夜里还放光哩，白光，白皑皑的光，……”

这样的骸骨塔在这片战场有10多座，最大的并不是这座，而是松山上的。但这些堆积中国军队官兵骨殖的石塔，都在1958年大跃进时拆了，石板被运去盖了公社的粮库，骨头烧成了灰，肥田……

有朋友告诉笔者，日本名古屋附近的山顶上，耸立着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为大日本捐躯的民族英雄”，那是东条、松井，土肥原等七名战争罪犯的骨灰存放地。从首相到官僚，宁愿丢掉乌纱宝座，也敢冒天下之大不讳顶礼膜拜……

稻叶四郎的第六师团攻占黄梅后，于8月30日这个满天阴霾山河失色的上午，直扑广济县城梅川镇。

所过之处，真可谓生灵涂炭。

第六师团有过南京的罪恶狂欢之后，便异化得像噬人兽一般了。牛岛旅团第45联队中队长田中军吉大尉的“助广”军刀，已砍下了300颗中国人头，因此而成为第六师团的“神勇”代表。

凉亭河一战结束后，没有逃走的30多户人家中的100多人，全遭杀害。现住下街的八旬老人石经福，亲眼目睹日军将陈家妻子脱光衣服、摧残后吊死在路旁的树上和16个青年被砍死在上街河滩的惨景；严恭庵、余松发的母亲怀孕8个月，被剖腹取出胎儿，挑在刺刀上玩；鲁

家莹刘氏母女二人同时被摆在一起轮奸致死。贺子良老人说，蒋家三口，男的被杀在村口，老婆被摧残而死，两岁的女儿被喂了狼狗……宿松县城被糟蹋的妇女达157人，全城没逃出去的妇女，没一人躲过野兽的蹂躏。工农街潘连枝老大娘回忆，有陈、黎、齐、蒋四个妇女是被几十个鬼子活活折磨死的，才12岁的蒋代妹开始哭得很惨人，后来没有声音了，死了，鬼子们还一个一个地在那孩子身上发泄兽性……

“打鬼子用不着做思想工作。”参加过反法西斯作战的老军人都这样说。

黄埔十一期生、第五战区军地联络参谋王长勋走遍了广济各个战场。在他眼里，第五战区的中国官兵，“可以说人人都是英雄好汉！川军不能打？在界岭，整整打了一个多月！西北军，刘汝明部队的大刀，砍得鬼子满山跑！黔军，何绍周的部队，全是草鞋，苦啊！就是能打！广西军，‘广西猴子’更行……”

雷雨霏霏，夜黑深沉，确乎伸手不见五指。第八十四军军长覃连芳率领的“广西猴子”们于泥泞的堑壕中抱枪蜷卧。

山下有响动……轰轰隆隆地有如天籁之声……

“鬼子来啦——”一声尖叫，令人毛骨悚然。顷刻间，枪声、拼刺声、手榴弹爆炸声……625高地鼎沸起来。

满山遍野敌我犬牙交错，墨汁一样的浓黑中咫尺不辨，枪弹茫无目标。

10000多男人的猛烈吼叫震撼了群山，未发出吼叫的，一个个全成了攻击的对象而纷纷倒下了。李金田的一一九师的400多名敢死队员，各抱一把白闪闪的大砍刀，赤着脊梁，天地悄然之中，大刀队向敌阵摸去了……“杀——”一片片大刀

欲出闪电似的白光，一对对古铜色的身影在夜暗中分外耀眼，血肉横飞之中，胜负立见；300多日本九州武士横躺在山坡上断了武运。

日军头目今村的人格是再卑鄙不过了，他命令向大风寨以及中国军队各阵地施放毒气。一时间，大风寨山上守军一个营全部罹难。

同样的“广西猴子”，第一八八师在自己的阵地上顶了两天，就报告说坚持不住了，没等覃连芳派出预备队，第一八八师就退了下来。

由于第一八八师让出了通路，日军稻叶部队于9月6日进入梅川镇。

横在稻叶前面的鄂东的界岭，这是进入武汉的大门。

稻叶这回摆出了破釜沉舟的架势，将本师团的4个步兵联队全部投入一线，志在一战定乾坤。

抵挡稻叶的是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冯玉祥的亲兵、韩复榘的心腹、蒋介石的重臣，貌似憨愚心有奇窍，换骑易主不露形色，人荣他荣，人辱他也荣。政治经验警告他：以自己大不清楚的历史，丢界岭就等于丢脑袋。时值中秋佳节，他将后方慰问的月饼一块块地亲手交到一线官兵的手上，“弟兄们，这是个团聚的日子，可是，日本鬼子害得咱们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啊……”

第五十五军算得曹福林的家乡子弟，吃着月饼，想着北国胡尘中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不觉凄然泪下，哽咽难咽……

史载，五十五军拼

杀中击毙敌官兵2000余人。待稻叶补充了3200新兵后，再攻界岭的龙顶寨时，掩护部队撤退的第三十二师第六十八团一营300余官兵全部战死，其中70多名伤兵被日军用绳子吊在庙旁的松树上活活饿毙。

守卫在大别山麓富金山主阵地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激战11天，10000余官兵仅剩800余人；牟中珩师也伤亡官兵6000余人，无力再作阵地战。

梅川城里年过花甲的老人，大都能讲出一些他们目睹过的日军兽行。

9月7日那天清晨，梅川城西门文昌阁小街一深宅大院里，升起黑沉沉的浓烟，人们还以为失火了。一个大胆的紧邻扒墙一看，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几个日本兵正在往熊熊燃烧的木垛上放尸体。尸体全是

一丝不挂的10至15岁的小女孩，一共10多具。这些可怜的女孩，在这群“神国勇士”的兽欲摧残下，一夜之间全部致死。“勇士”们胆怯了，为了掩盖其罪行，紧张张地焚尸毁灭……

大风寨刘汝明军的大刀队使日本今村旅团威风扫地。当刘汝明军撤走，今村占领大风寨之后，为拣起面子，竟向大风寨地区的乡民疯狂报复。大风寨山下余坑是刘军营地，日军闯进下余坑，见男人就杀，见女人就奸。青年农民郑雨喜见自己的小妹子被一群日军强奸，不顾一切地操一根棍子扑过去拼命。日军捉住郑雨喜，将他绑在树上，一个士兵从身上掏出一把剃须刀，划破郑雨喜的头皮，开始活剥人……，眼皮全剥下来了，郑雨喜还没有死，眼珠子还在转……青年妇女张翠莲怀



在万家岭地区村舍与日军巷战之我军

孕行将临盆，日士兵脱光了张翠莲的衣服，看婴儿在肚子里蠕动，将张按在地下，用脚在肚子上踩，张翠莲当即死去。日本士兵直踩到张翠莲阴户流血，看到了挤在阴道口的小儿头，才心满意足地笑着离开……

毒气开路 铁蹄踏过中原战场

9月9日，日军冈田资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潢川东十五里铺张自忠的第二十七军团第一八〇师第二十六旅阵地发起攻击。

激战两天两夜，敌我阵地犬牙交错。第二十六旅715团已与敌人拼过三次刺刀了，三营营长陈芳芝向旅长张宗衡请求支援。张宗衡严厉地说：“我这里没有部队，只有军团长的手令！”话筒里突然响起一个粗重的山东口音：“陈营长吧，我是张自忠，希望你们坚持到最后一分钟，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军团长也在一线指挥啊！二十郎当岁、正是青春如火的陈芳芝，顿时热血灌顶，放下话筒，大吼一声：“跟老子上啊！”带着全营官兵发起反攻，一举夺回了失去的阵地。

指挥部设在春河的冈田资恼羞成怒了，将一参谋刚在地图上往后移的小红旗用力地掐下来，狠狠地甩在地下，命令：“给我毒！给我通通地毒死这些支那秽多！”

一阵嘶嘶怪叫的沉响中，潢川城国民党军阵地全部埋在乳白色的云雾里。

咳嗽、鼻涕、窒息、喷嚏……可怜第五十九军燕赵勇士，尽管以毛巾尿尿捂鼻，个个痛不欲生。

“师长，你、你……”

第一八〇师师长刘振三中将正在一线督战，毫无例外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难过起来，急得卫兵真情的大哭失声。

毒气消散，是敌人进攻的时候

了。刘振三两眼通红，鼓励官兵英勇杀敌，“弟兄们……”他正挥舞着手臂慷慨激昂，阵地上又是一片“吓吓”的爆炸，又弥漫起可怕的白烟……

冈田资直取潢川侧后切断了守军退路，打一个大大的歼灭战。

从9月9日开始阻击敌人，到9月19日10天过去，张自忠终于接到了孙连仲令该部撤出潢川的指示和对其超额完成任务的嘉勉电。武汉会战以来，如期完成阻击任务的部队从来就不多，张自忠自此一洗留守北平的污垢，朱红紫贵起来，不久被蒋介石重用为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曹福林等西北军官宿老名将，尽归其麾下遭遣。

大别山北麓冈田资击破张自忠的潢川防线，从罗山直扑信阳的时候，日军藤田进第三师团主力赶到了潢川。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从空军的侦察报告中得知，国民党军信阳守军有装备先进的机械化部队，还有强大的炮兵。

在国民党军序列里，信阳守军的实力确乎大不一般。邱清泉、高吉人的坦克部队在信阳的田野里曾轧出一行行钢铁的对偶车辙，彭孟辑的炮兵第7旅，辖三个野战炮团，也给信阳以东的公路染上了现代化的色彩；深藏在丛林里的一座座高炮阵地时隐时现。可是，罗山一带是连绵起伏的丘陵，水稻产区，田埂交错，阡陌纵横，车炮根本无法离开信罗公路。于是，整团整营的炮群，只能在公路两侧次第展开，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堂堂的炮兵旅，只在信阳溜了一圈，还没真正显露锋芒，就匆匆撤下阵来。

邱清泉的坦克部队也是如此。在那水网湖沟地带，坦克的机动性能严重受阻，连掉个头也深感困难，更不用说冲锋陷阵了。

坦克大炮是国民党军的娇子，

胡宗南怕有个闪失全赔了进去，命令通通靠后边滚蛋。他背了个装备最好的虚名，遭人嫉妒，却只苦了他的前线将士。

这时，蒋介石14日电令第五、第九战区“于一星期内变更现在状态”，准备撤退。胡宗南的小哥儿李文手下的第二三二团团团长马载文，在冈田资11日夜抵达信阳城外后，据说第二天不放一枪，便将信阳礼让给了冈田资。

日军第六师团在坦克开道和飞机掩护下，沿广济至漕河、滠水的公路滚滚西进。

江北沙洲平原，正是机械化部队大显神通的广阔战场。牛岛旅团以骑兵开路，坦克居中，步兵压后，十里烟尘，从东边天际席卷而来。

整个鄂东突然间颠倒过来，数十万国民党军洪流乱注，泼豆似地向西滚动。

小界岭与冯安邦对峙的日军获洲第十三师团10月22日越过大别山，与田镇南、宋希濂决战的藤江第十六师团10月24日翻过小界岭，25日到达麻城；

武胜关外冈田资第八旅团10月12日占领信阳后，向西越过桐柏山，进入鄂西北，10月28日占领安陆、花园，继续向西南发展；

江南波田台湾旅团，19日攻占黄石港，22日进入鄂城，23日高品彪第六十联队迫近武昌东闻葛店；

沿长江水道进攻的近藤海战队，此际以其航空兵正与国民党军海军舰队激战于武昌县金口江面……

用20万围歼敌人 两万，结果……

日军突破九江后，切断浙赣线的企图日益明显，刚到南浔线上任的一军团军团长薛岳立刻作出决

定,集中南浔国民党军主力,将孤军深入的日本松浦第一〇六师团捕捉并歼灭之。基于这一设想,他将第一军团共25个整编师计20余万部队反复掂量,作出部署。

薛岳是个特殊人物,大革命时期他倾向共产党,“四·一二”事变前,他曾建议“把蒋介石抓起来”,一旦为蒋所用,他率国民党军尾追红军,转战滇黔、直掠川陕,被捧为“常胜将军”。

薛岳军团20万部队向万家岭地区云集的阵势,日侦察机看得清清楚楚。冈村急令松浦师团第二线部队投入战斗,对国民党军实施反包围。薛岳电令第九十一师、五十一师、一〇二师将松浦第二线部包围起来。

松浦第三线部队赶到,又使薛军团被围。薛岳命令吴奇伟和王陵基,将作为预备队的第一八七、第六十、第新十三、预六师等全部用上。这一下,连松浦的师团指挥部,也被紧紧地撞了进去。

三层包围,三层火网,在万家岭狭窄的地区燃烧起纵横二十来里的战云。

冈村并不着急,他指示第一〇六师团参谋长亲率作为预备队的第四线2700余新兵部队杀将过来。

“这时战斗非常激烈,而我已无兵可派了。”当时的少将作战科长赵子立谈起数十年前的往事,似乎还心有余悸,“西线敌第二十七师团猛攻白水桥街,那边的第三十二军打得苦极了。东线敌第一〇一师团也发起了强大攻势。南浔战场到了这个局面,很可能彻底溃败呀!薛岳当时闷不作声,眼睛死盯着地图,我们都很着急,这个仗就这样半途而废吗?我们都不甘心。我突然想到,还有一支部队可以用上嘛——”

赵子立说的部队是叶肇的第六十六军。在去年淞沪抗战后,蒋介石



日军部分战俘



日军尸骨遗物

很欣赏这支部队,便决定将他们留在庐山地区打游击,并由他自己直接控制。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赵子立建议下,薛岳决定动用这支老广部队。

当冈村在外围一线一线加围的时候,整个万家岭地区便像一个旋转的星系,愈是中心愈是光焰流火,耀斑猛烈。松浦知道自己的确切位置离德安只有30多公里,他选择的突破口是张古山,这里是俞济时第七十四军之第五十八师防地。

为确保松浦突围一举成功,冈村亲自协调空军协同作战。从这天上午8时开始,日飞机30架对张古山一带轮番轰炸,直到下午2点,整整炸了6个钟头。敌机把张古山炸得像翻了一遍的土豆地,掩体全部

被毁,第五十八师官兵大部殉国。尘满空山之后,青木指挥他的一三六旅团发起冲击,占领了张古山北部阵地。第五十八师素质本来是比较好的,师长冯圣法,9月30日率全师发起反击,在道童山、梨山一带大战一场,虽然首战就歼敌500余人,但自己也伤亡2000多人。接着又猛攻箭炉苏,与日军白刃格斗3个多小时,亦歼敌500余,可本师骨干第三四八团已基本拼光,往后又是背溪街、长岭、陈家山……仍一次次披坚执锐,战功斐然,薛岳迭电嘉奖冯圣法之第五十八师“英勇无敌”,但三四四、三四三团已伤亡过半,元气全失。冯圣法是一点法儿也没有了,抱着电话向俞济时说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你必须给我顶住!”俞济时大

喝一声，扔了话筒，扭头吼道，“警卫营！”警卫营两个连二百余如龙似虎冲上去死死砍，终于遏止了日军的攻势。但敌利用张古山制高点，火力俯瞰我附近阵地，对我军威胁太大。薛岳命令第七十四军必须把张古山夺回来。俞济时将这个任务交给王耀武的第五十一师。

王耀武店员出身，乖巧伶俐。早熟官场奇门遁甲。在黄埔三期生中，他已爬上中将，是俞济时极少倚重的青年将领。

张古山太高了，没有像日军那样强的火力配合是很难上去的。他将全师团以上长官召到师部，问哪个团有勇气来执行这个任务。在众响毕绝之中，一个浓重的陕北口音说：“我团愿执行这一任务！”

“好！”王耀武循声看去，举起右手，“张团长，我看你行！”张灵甫时任第三〇五团上校团长，他抬起头，挺起胸脯，一副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铮铮神貌。

黄埔四期生张灵甫，4年前就是团长了，这人资质颇高，年纪轻轻，书法倒是老辣，模仿于右任的行草几可乱真，但性情孤僻，内向寡合。有袍泽和他开玩笑，说他那极风流标致的川妹子有个外遇，倜傥非常。他越想越真，提支手枪回家，将美妻一枪打死在菜地里。以故意杀人罪关在监狱里的张灵甫，1937年“七·七事变”后，经老上级王耀武向蒋介石说情，蒋把张交给了王耀武。王耀武将张灵甫接出囚牢，让他官复了原职。不管是精忠报国，还是知遇之恩，在这种场合，张灵甫要装孙子就不是张灵甫了。

张灵甫已定下决心，效邓艾偷渡阴平，取北坡奇袭张古山。回到本团，张灵甫精挑500壮士，亲自率队，黑夜中穿过丛莽，绕至北坡，攀葛附藤，神兵天降般突然出现在张古山顶。

天亮之后，日军在飞机重炮的配合下开始反扑，张古山又给深翻了一遍。张灵甫命令撤下山去，天黑后发起反攻，又夺了回来。连续五天五夜，张古山白天红太阳旗迎风招展，夜里又插上了青天白日旗……

张古山争夺战的故事不久被田汉写成了一个活报剧，剧中主角张灵甫因此而大出风头。

老松浦对张古山望而生畏了。即便是占领了张古山，也没有了再向前攻击的力量啊。他将师团部搬出帐篷，移至刘鞞鼓刘村，住进刘茂良的一栋土屋里，心情极为沉重地电告冈村，请尽快派部支援并空投粮弹，因本部出发时只带了5天的给养和每人180发子弹，株守日久，必生变异。

至此，松浦的四线部队9000官兵，被薛岳以十数倍之兵力，四层包围在万家岭地区。

连天鏖战的麒麟峰，灰蒙蒙的夜暗中，一大片白色的影子向山顶接近。“鬼子上来了！”

果然是敢死队，怪叫着已冲上了山顶。“伙计们，跟老子们上啊！”团长杨家骧率领身边的副职和参谋以及警卫人员，一股旋风杀了过去。

这一战从子时开始，直杀到荒鸡报晓才决出胜负：500敢死队丢下100多具尸体，全披着粘稠的血色“十”字退下山去。

日军头目本间雅晴听说一夜的激战也未能夺下麒麟峰，拈着胡髭冷笑一下：“全毒死掉！”

十年后，驻菲律宾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被判处绞刑。

一阵持续很长时间的沉闷爆炸之后，麒麟峰冉冉升腾着洁白如纱的毒雾。杨家骧和他的全团官兵1000多人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嘴、鼻孔、眼、耳渗出鲜红的血，脸色渐渐地由紫变乌，最后黑若烟煤。

腐败的政治制度导致这片国土

任人宰割和子民备受蹂躏。一个美丽的社会模式唤起年轻人的无限遐思。就在这个战场上，千人一面的国民党军官官兵中，蛰伏着最有信仰的人。

这位干练豪放英俊敏捷的少校炮兵营长，谁能想到他一年前就是共产党员了呢？第三十二军第一四二师炮兵营营长陈锐霆，正从炮队镜里看麒麟峰，他要在今晚的总攻前，让中国军队落后孱弱的炮火发挥最大的威力。

“轰！轰！轰！……”不偏不倚，陈锐霆第一个齐射十多发炮弹直奔谷川指挥部而来，猛烈的电光石火中，——“喜马打！”有人听到谷川吼叫了一声，一头栽了下去。

第一四二师的进攻开始了。第七二五团团长郑克己，被一颗流弹击中不幸阵亡。“弟兄们，为团长报仇！”共产党员副团长朱静波怒虎狂狮似地，“冲啊！”官兵们迎着飞蝗一般的子弹，冲进了敌人纵深阵地，拼开了刺刀。

东北坡，共产党人刘义昆率突击营从小路蛇行兽走，在荆莽中直插主峰。三个共产党员率领国民党军官横扫麒麟峰，将失去指挥的敌第一〇三联队杀得稀里哗啦。满山日军像炸栏的惊马，东奔西蹿，丢下70多挺机枪、14门大炮、100多匹骡马、10多名伤兵……狼狈逃下山去。

本世纪八十年代，一批来自日本的老兵站在麒麟峰下，望着那平塌塌的山岭老眼生出泪光。他们带来了香花美酒，准备祭祀他们当年战死在这里的袍泽。中国兵死了多少呢？没人祭祀过。年轻的翻译在感情上受不了吧，不允许烧香，他们才将酒水浇在地下，默默离去。

薛岳按蒋介石“双十”节前结束战斗的电令，10月7日晚上，他命令万家岭四围的部队发起总攻。霎时

十数万部队，如一轮喷射着冲天烈焰的雷火，向万家岭轰轰隆隆地滚进压缩。

一夜过去，松浦早起站在地图战斗标志前，抿嘴笑了。中国军一夜的攻击，均被击退。张古山、啤麒街、杨家山、石堡山、石马坑等各阵地，坚如盘石。

薛岳看着地图发愣。就这么横竖 10 来里的包围圈，在地图上只有巴掌大的一块面积，以我十多万部队，手拉着手也可以围它数十层啊！

纵观整个南浔战场，形势越来越严峻了，再拖挨时日，胜仗将成为败仗！

“命令各部！”薛岳一拳击在桌上，瞪着凶恶的眼睛看着幕僚们，“各进攻部队均要组织 250 至 500 人的奋勇队，今晚 19 时发起攻击，有完不成作战任务者，军法从事。”

凡亲身经历过这晚作战的老人，印象最深的是这晚上“黑”。夜暗中，手榴弹爆出的白光，机枪吐出的火舌，万家岭地区灼射着一个周长 30 多里的战争光环。如神话传说中太上老君的乾坤圈，以无穷之法力在收缚天遣魔王。每缩小一圈，圈外便露出一转血肉模糊的尸体——各路奋勇队健儿，左冲右杀，向敌纵深猛钻。日军松浦第一〇六师团 9000 余官兵，经过 10 多天苦战，本来只剩五千，被中国军队奋勇队一夜冲杀，现在只剩下 1000 余人，更玄的是，那个光环此刻已缩小在三个小村边沿，已不足千米。

松浦淳六郎中将已是瓮中之鳖，将其活捉真乃探囊取物啊！薛岳命令各部白天稍事休整，晚 17 时准时发起总攻，活捉松浦，克尽全功。

中国军队说是休整一天，其实只不过躲了一天的空袭而已。吃的是水煮南瓜，喝的是一股尸臭的生水——满山遍野都是死尸，所有河沟——即便是博阳河的水，也尸臭

难闻。夜幕帷落，当各部于极端艰难困苦之中拼凑奋勇队，像昨晚展开攻击时，悲惨的故事发生了。

“刺儿”——三声怪响，日军阵地上空突然出现三颗亮得出奇的照明弹，如三颗炽白的太阳，地面上也照得清清楚楚。日机群从北方呼啸而来，向一群群光脊梁黄橙橙的中华男儿铺天盖地地狂轰滥炸。可怜各军各师挑选的最勇敢的猛士，准备像昨晚挽着衣服杀敌的，一个个倒在血泊里扭曲蠕动，极少生还。

万家岭地区不再有黑夜。冢原第二联合航空队的轰炸机滚动式地周而复始，以钢铁羽翼守护着老松浦，科技进步的佛光偏偏照耀着一群十恶不赦的妖孽。

天亮之后，早起的冈村浏览一遍各方战报，其中一份提到松浦师团已安全突围，他长舒了一口气。

冈村轻松的时候，薛岳就该发脾气了。

松浦的阵地那么三个小村子。冢原以三木大佐第十二航空队 24 小时轮番攻击其周边的国民党军阵地，以上坂大佐第十三、蒲赖大佐第十五航空队向国民党军阵地纵深轰炸，万家岭地区方圆一二十公里地面，中国军官兵像地鳖虫似地被死死地固定在原地不敢稍动。

连续几天僵持下来，国民党军的攻击毫无进展。而日军支援的第一〇一师团部队已于 14 日进至修水以北杨家山地区，第十七师团铃木青松少将率领铃木支队 15 日已达甘木关。面对日军的空中绝对优势和两支援军迫在眉睫，薛岳不无遗憾地于 16 日宣布：万家岭战役结束，各部撤出万家岭战场。

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里，承认松浦第一〇六师团遭到了“覆灭”性的打击。

1994 年 8 月初，笔者也来到了万家岭地区，寻找当年的战场遗迹。

杨家畈 72 岁的罗金远老人说——打了那一仗，满地都是枪，手枪，步枪，机枪，都有，都是好枪哩。这地方的王浩、刘德年几个地痞子，各收了 1000 多条枪，拉起了几支大土匪队伍。

70 岁的杨发堂是笔者采访的不多见的精神健旺的老人。他说——

南田下面的死马，整整齐齐地，一个挨一个。是日本佬自己摆的，像摆的队伍。那畈上的田，几年都不能种庄稼，种什么都发乌（疯长），那地是死人死马肥的哩！

熊家畈熊克科老人，谈起当年发生在这里的那场大战，眼里顿时有了光芒。他说——

那时节国民党打日本佬，一夜一夜的拼刺刀，不要命啊！死了多少人，没个数。大跃进大炼钢铁，不是号召我们全体社员上山捡子弹头吗？还捡手榴弹壳，还有头盔，一收几箩筐，堆在一起像座山。你来时路过蔡家桥了吧，那桥上堆了几层的死尸，日本佬一层，国民党一层，日本佬一层，国民党一层，一层擦一层，往河里掉……

会战惨胜 武汉殉葬

武汉外围千里战场国民党军且战且退，战区数以千万计的人民艰难地向西移动——难民潮。每一个经历过武汉大撤退的老人，回忆起那兵荒马乱的岁月，仍然余悸颤颤。

有钱的腰缠万贯，无钱的一根扁担。牛车拉着老娘的，箩筐挑着儿女的，滑杆抬着富商的……人流滚滚，向那遥远的乐土迁徙。

没有乐土，人离乡贱。滚滚黄沙之中，路边常遗下一具具尸体。

日军占领九江后，来不及撤退的难民都往天主教堂躲。一个小小的教堂，哪容得下成千上万的难民？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霍乱流行。人

死了，往教堂门外一扔。教堂的门口堆了大片死尸，时值盛夏，尸臭弥漫了整个九江市。日本松浦自己受不了了，命令在教堂门口挖了个大塘，将尸体铲了去，浇上煤油烧。有没烧尽的，成了野狗们的美餐。那些天，每当夜色降临，成群的野狗从四面八方蜂涌而来，挤满了尸坑，将烧糊的人体拖得满街都是。松浦又令打狗，扔在塘里与人尸一起烧。冈村要进驻九江了，松浦怕霍乱传染，下令将难民全部关进了监狱……

至于武汉撤退，情景更加悲惨。

在武汉市民看来，武汉是不会丢的。“誓死保卫大武汉！”这个口号太深入人心了。报纸上天天的重要新闻都是前线打了大胜仗，消灭敌人多少万多少万。“小日本”有多少人呢？鄂、豫、皖、赣四省的面积是其两倍，人口也是其两倍，不管怎么说，“小日本”这回是输定了。隔三差五地盛大集会，使武汉三镇市民陶醉在响彻霄汉的歌声和口号声里。陈诚为纪念“双十”节发表的文章，言之凿凿地说已歼敌27万。

武昌徐家棚火车站。本来列车就少，因为种种原因，一列疏散市民的火车停了整整两天，就是开不出去。人挤得太满了，一个挨一个站着，连上厕所也不可能。

在长江内河，三层舱位的江兴轮算得一条大客船了。但它也只能装2000乘客。可这回，它满载10000多乘客，还有6门高射炮和500多箱弹药，成为它航运史上最冒险的旅次。

正当溯江而上，6架日机飞临上空，一颗颗炸弹燃烧弹从天而降。火光中，一簇簇人体成扇形抛入江中，船身顿时起火下沉。

10000多军民，仅84人劫后余生，大约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沉船灾难了，却鲜于文字记载。

1938年10月24日晚7时，蒋介石在白崇禧的陪同下，来到汉口机场。历时四五个月的武汉会战，将以自己的撤出画上句号。该离开武汉了。广州已于10月21日沦陷，纵观整个中南战场，再株守武汉，可能陷全局于被动。

南边的天空像放礼花似地冲起一簇火星，“轰！”一声沉重的爆炸响彻长空，让人感觉到地面在震动。

军统武汉站站站长朱若愚对三镇的“破坏”工作已进行两天两夜了，日本的同仁会医院、正金银行、日清公司等高层建筑，已炸成一堆废墟。水厂、电厂、湖北省党部、武汉行营、汉阳兵工厂、汉口机场、大智门车站、各级政府和交通机关及工业区，悉在焚毁之列。“火烧新野”，史家以为仁政啊。

周恩来等刚送走从延安来参加国防会议的朱德，正起草电文，向中央报告国民党军弃守武汉的决定，朱若愚的“破坏队”就进来安放炸药了。现在人参观的“八办”旧址，是1979年以百万巨资重新修建的。

武汉三镇的大火烧了两天还在继续。方圆二三十里的浓烟汇成黑色的云团，在微雨中沉沉地笼罩着三镇。

武汉空荡荡的了。车辆绝迹，行人稀少，只有江上维持交通的小火轮偶尔发出一两声孤独的啼唤，更增加这空城的幽旷凄凉。大街小巷没有营业的商店，深秋的冷风穿街过巷，形成一个个匆匆走过的旋涡风。大多数门上贴着封条：“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某日封”，有的门面上还写一些伤感的话：“别矣，吾家！”“黄鹤此去何时返，白云千载使人愁！”……而当暮色四合之际，偌大的武汉三镇，一团漆黑，偶尔亮出的一点点马灯或手灯，像基地的鬼

火幽暗闪烁……

近5个月的武汉会战，从安庆失陷算起，中、日双方在赣、皖、豫、鄂四省千里战场，进行大小战斗数百次。国民党军投入120多个师，兵员百万以上。日军参战12个师团，总兵力达40余万。整个会战中，日军死伤十几万，其中，将校以上官佐近700名，15万人病倒，损失舰艇100多艘，飞机100多架。日军战报说，俘虏国民党军官兵15万人。这是中日战争史上投入兵力最多、战场地域最大、作战时间最长的一次大决战。大约，也只有在这片兵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土地上，才可能创造出这样恢宏博大的战争奇观。

说的是打了胜仗，武汉却要放弃了。蒋介石却还发表了气壮山河的《告全国国民书》。

1938年10月26日夜，东京庆祝它自江户时代以来的最疯狂的盛大节日。宫城前的“邦在矣”吼叫声遏云凌霄，彻夜不息；后乐园球场十万人的庆祝大会，掀起激情的狂涛。日本一些“国策”文人——吉川英治等慷慨激昂的演讲，刺激着兽类春情般的亢奋；一簇簇焰火在高空飞泻，50万人的提灯游行，使二重桥前的广场出现一片灯的海洋。樱田门前和紧挨樱田门西的三板宅陆军省、参谋本部四周，被狂欢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

日军自己承认在武汉会战中伤亡5万余人。国民党军从抓获日军战俘的表现，可以看出日军的战斗力已大大削弱。徐州会战前和会战中，很难抓到日军俘虏。但在武汉会战中，特别是末期，日军战俘上百上百的，大部分是举手投降的。

《责任编辑：刘家驹》

（根据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河落日》一书节编）

为“包产到户” 拼搏无悔的周日礼

●江鲲池

从小铁匠到农业 问题专家

本文所叙述的主人公周日礼，在安徽省可算是知名人物。尤其是搞农村工作的人，几乎无人不知道他。他从小铁匠成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而且是一位有着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和丰富的农业知识的农村改革专家。他在解放后几十年的农村改革大潮的起伏中，坚持不懈地长期与“左”的干扰拼搏，为彻底解放农村生产力、为争取摆脱农民长期忍受的落后与贫穷，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推动安徽省在全国率先实行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农村联产生产责任制方面，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周日礼幼时家境贫寒，童年没有读什么书，为求生计，11岁时学打铁，当了五年铁匠。这五年的铁匠生涯，铸造了他铁一般的性格。他是扛着大盖枪，在1949年1月20日解放合肥时第一批开进合肥城的子弟兵，后来在担任皖北军区司令部机要员时，认识了军区政委曾希圣，并给曾希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曾希圣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就指名把周日礼调到身边当秘书，而且一当就是三年，这是周日礼一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曾希圣脾气



周日礼

很大，人对事要求都很严格。他要周日礼学文化、学马列、学哲学，还经常派他到农村调查蹲点，每次还都要周日礼写调查材料。有一次，曾希圣派他到桐城县搞农村调查，周日礼写了篇题为《翻身合作社一年翻身记》的文章，经曾希圣修改了三次后送到中南海，毛泽东为此文写了按语，收入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

跟着曾希圣 搞“责任田”

1961年2月下旬，周日礼参加了曾希圣带领的工作组，到合肥市

郊蜀山公社南新庄生产队搞“责任田”的试点。他在这个极为贫困、落后，处于饥饿之中的小庄子里试点结束后，同陆德生等人一起起草了一份试点报告报省委书记处。不久，又参与起草了省委关于试行“责任田”的有关文件和给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在省委召开各地、市、县第一书记会议上，讨论这个总结报告时，曾希圣对报告中“以产计工”的提法感到有些犹豫，因为他曾直接听到群众反映，既然已经试行“责任田”，再搞“以产计工”，“这是六个指头搔痒——多一个道道。”为了拿准这一问题，曾希圣征求周日礼的意见。周日礼陈述了三点意见：一是以产计工很难避免吃亏讨巧的问题，二是现在干部管理水平低，工分管理很混乱，尤其是非生产性用工很难掌握，群众不放心；三是包工包产，以及大小农活的分配比例已经定死，再搞以产计工，确实是人为地增加一道麻烦。曾希圣认为周日礼很有道理，就决定把“以产计工”的提法从总结报告中删掉了。这一决定，实际上形成了八十年代初“大包干”的雏型。

1962年2月，“责任田”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受到毛泽东的批判，“犯了方向性错误”。曾希圣被罢了官，周日礼也跟着靠边站了。不过，尽管这次“责任田”的试点被暂时压

了下去,但它却为安徽省广大农村此后的再次冲破“左”的束缚,争取农村经济腾起,蕴蓄了萌动的地火。

“绝密件”和“六条” 的轰动效应

1977年初夏,中央决定改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由万里出任省委第一书记。

当时安徽农村形势很复杂,一方面“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喊了多年,虽然并没有给安徽农村带来希望的转机,但是仍有人高举大寨红旗,坚持要普遍推广大寨的经验。而有些熟悉农村现状的人则希望农村早点走出困境。万里对那些“假、大、空”和报喜不报忧的材料不感兴趣,他找到当时还遭冷遇的周日礼同他作了一次长谈。

周日礼快人直语,他一针见血地向万里反映了农村现实中的许多问题。还引用了在农村广泛流行的顺口溜:“男劳力上工带打牌(打扑克),女劳力上工带做鞋”,“头遍哨子不买帐,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周日礼说,农民这种消极怠工的状态,实际危害比罢工还要厉害,几乎是慢刀子割肉。说到底这是政策问题,是人和土地关系的问题。农村政策问题不解决,凋蔽的安徽农业就没有出路。

万里听了周日礼的汇报,颇有同感地插话道:“安徽农村的问题,比城市严重,‘左’的问题更突出……”推心置腹的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双方都感到言犹未尽。

事隔不久,为了给省委决策提出可靠的依据,周日礼邀集了几位肝胆相照的同志,起草了一份对农村极左路线危害严重的“绝密件”呈送万里。之所以称为“绝密件”,是因为诸多观点是有违时尚的,不得不谨慎从事。诸如大胆揭露了浮夸,瞎

指挥,大搞形式主义等阴暗面,等等。

万里认真地看了“绝密件”,特意叮嘱周日礼:“你们能否搞个针对性的政策意见?”

于是,周日礼带着一千人马去了滁县地区。滁县地区气候温和,交通发达,是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令人惋惜的是,从1958年到1977年的20年间,全地区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年递增率分别为2.2%和2.61%,社员人均收入只有70元左右,其中定远、凤阳、嘉山三个县,不少社队人均口粮只有300斤左右,人年均收入只有50元左右。全区大批农民外出逃荒,如此年复一年,恶性循环,农村已陷入焦灼的困境。

经过大量调查,在周日礼建议下省委在滁县地区召集了各地、市农村工作部门的负责同志,就当前农村的突出矛盾和解决办法,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由周日礼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简称“六条”。

1978年11月,周日礼又陪同万里、顾卓新、赵守一等省委领导同志,征求对“六条”意见。不久,省委召开了有各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对“六条”草案进行了讨论,讨论中争论相当激烈,最后终于通过。

“六条”的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其收获完成国家任务后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这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徘徊的中国,所出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它触动了敏感的神经。一经发出,瞬间轰动了全省,

继而吸引了全国。《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纷纷派人来安徽采访。1978年3月,新华社发表了万里的《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文章,此文也有周日礼的一份心血和汗水。

随后,刚刚恢复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对安徽省委“六条”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在出访巴基斯坦的途中途经四川,向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做了推荐。四川省委顶着“左”的压力,仿效安徽颁布了“十二条”。从此,安徽、四川两省点燃了农村改革的火把,照亮了饥饿和贫困的中国。

在起草“六条”之前,周日礼曾深入凤阳县马湖公社调查,发现这个公社大胆创造了分组作业、以产计工的办法。马湖分社实行这个办法后,出现了一派新气象。这个社前倪生产队1973年以前,粮食总产量连续11年徘徊在6万斤上下,实行分组作业后的1976、1977两年,粮食总产量上升到18万斤,比1973年翻了两番。周日礼兴奋异常,连夜奋笔疾书,写成了《加强生产责任制的一个好办法——关于马湖公社分组作业,以产计工的调查》,在江苏苏州召开的全国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座谈会上散发了100多份,顿时成了引人注目的新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两个月,周日礼又遵万里之嘱,与其他同志一起分赴农村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后,写了题为《农村政策需要清除左倾影响》一文,在全国农业经济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了言。这份材料的内容实际上是安徽29年来农业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后来经过加工整理,改写为《农业上需要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一文,作为万里参加三中全会的发言提纲。这份材料共分10个问题,矛头直指左倾错误和

“两个凡是”。“提纲”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改革农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不要提普及大寨县的口号；不要再搞穷过渡；尽快把农工联合企业搞起来，实行农工商一条龙；生产责任制必须联产，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实际上没有责任制；计划不能统得过死，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留有余地，给生产队以充分的自主权；改革农副产品收购政策和办法，用合同制代替从上往下压，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让农民进入市场得到实惠；“以粮为纲”的方针有片面性，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应予改变；特别是针对年年搞政治运动的状况，提出“能否考虑在若干年内农村不搞政治运动，把主要精力转到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这个材料，在万里带到三中全会之前，于1978年10月，全文刊登在中共安徽省委主办的党内刊物《党的建设》第1期上。

率先在安徽 搞包产到户

1978年，安徽发生罕见的大旱，农业面临危机，秋种无法进行。此时，周日礼向万里提出了借地给社员种麦的建议，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战胜灾荒。万里从农村调查中深有同感。后经省委讨论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小麦和油菜，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题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这一重大的政策性规定，突破了多年来的条条框框，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抗灾自救的积极性。口子一开，不少地方实际上搞起包产到户了。肥西县山南公社率先搞起包产到户，接着山南区也跟着干开了，全区77.3%的生产队包产到户的结果，1979年小麦产量达到2010

万斤，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加1435万斤，增长两倍多，当年向国家交售麦子980万斤，为1978年全年交售量的一倍。周日礼看到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的一片丰收景象，激动得热泪直流。

1979年2月，万里派周日礼带领38位同志到山南公社直接向群众宣讲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在原原本本宣讲文件之后，他发动群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对乡亲们说：“有什么讲什么，把心里话统统倒出来。”大家对生产责任制问题最感兴趣，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群众要求，党员要求，干部要求，强劳力要求，弱劳力要求，五保户也要求。讨论中，干部群众对文件中“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很不满意。大家说，早也盼，晚也盼，盼到现在搞了两个不许干。纷纷要求中央取消两个不许干的规定。

2月4日晚，周日礼赶回合肥，第二天向万里作了口头汇报，万里说群众的意见应当重视，还专门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常委会议后周日礼很快回到山南公社，向村队干部传达了省委的意见。干部群众得知这一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的消息不胫而走，山南区的6个公社，在四五天内普遍干开了包产到户，而且很快席卷整个肥西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县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40%。很快，全省也有16个县干开了包产到户。看来当时包产到户这个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责任制形式，大有覆盖全省之势。

“他的意见完全可以代表省委”

1979年3月12日到24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有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个省的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和安徽全椒、广东博望、四川广汉三个县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周日礼参加了会议。会上，周日礼结合三中全会的精神，就安徽省委关于农村政策六条规定的贯彻落实情况，及农村推行责任制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他整整讲了一天。

这次座谈会围绕包产到户问题，争论相当激烈。有的同志还动了肝火，说包产到户虽然承认集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承认集体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必要性，但在否定统一经营这一点上，本质上和分田单干没有多少差别。周日礼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包产到户只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它就与分田单干有本质上的区别。

国家农委为座谈会起草了会议纪要草稿，关于责任制部分，杜润生要周日礼按照自己的观点另外起草一个稿子，准备向华国锋汇报。3月20日下午，华国锋接见会议代表时，开始由杜润生汇报会议情况，接着由李友九宣读会议纪要草稿，周日礼也宣读了他起草的稿子。周日礼起草的稿子主要是，包产到户应当看到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各种责任制都应允许试行，在实践中由群众加以鉴别和选择。会议纪要两个稿子念完后，华国锋要王任重立即打电话给万里，问一问安徽的情况和周日礼的意见代表谁。当时万里正在嘉山县视察工作，他接到王任重的电话后回答：“周日礼同志是省委派去参加会议的，他的意见完全可以代表省委的意见。”王任重把万



江泽民总书记 1991 年视察安徽怀远县农民新居

里的话向华国锋作了汇报。但是华国锋对纪要的两个稿子始终没有直接表态。

两封读者来信的较量

座谈会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插曲：即 3 月 15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张浩的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并加了很长的编者按语。信中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编者按语更是咄咄逼人：“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正确贯彻执行党的

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办法。”

会上，不少同志看了这一新闻，认为各地正贯彻中两个农业文件的精神，党中央机关报发表这封来信和编者按语是不适宜的，会给下面造成思想混乱。特别是国家农委正在召开座谈会期间，容易使下面误解为这次座谈会是“纠偏”的会议。当时，《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也参加了会议，她答应向报社反映大家的意见。周日礼认为有必要对张浩的来信加以澄清，以正视听。于是，立即打电话给在合肥的省农委辛生、卢家丰两同志，要他们火速来北京，也采用来信的办法，写了一封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来信。信中说：“包产到组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为什么现在却把它当作错误的做法，要坚决纠正呢？……”信中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两年多了，但余毒未除，至今还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好像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改变所有制性质，集

体经济马上就瓦解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辛生、卢家丰二人到京后，还向周日礼反映了肥西、滁县等地由于张浩来信的发表，引起了人们的深深不安，认为此信的发表影响相当坏。这促使周日礼下决心与《人民日报》力争。他提出要用同样版面和篇幅并加编者按语发表安徽省的来信。《人民日报》终于在 3 月 30 日的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辛、卢二人的来信，并加了长篇编者按语，承认发表张浩来信和编者按语，其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

七省座谈会上周日礼唱的“反调”，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广泛注意，有人给他起了绰号：周大胆。可周日礼认为，要破“左”、搞改革，胆子是要大。

1979 年，周日礼参与起草了中共中央中发[1979]37 号文件。这份文件中明确提出，在那些交通不便，居住分散，贫困落后的山区和边远地区，可以有条件地搞包产到户。自此，包产到户终于报上了“户口”，全国大多数干部和农民终于吃到了“定心丸”，尽管在当时还是“短效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

“周大胆”在 1980 年 1 月 11 日到 2 月 2 日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又作了一个大胆的长达 2 个半小时的大会发言，题为《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发言用了大量数据和例证，全面地介绍了安徽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指导思想、做法、效果和经验，热情讴歌千百万农民的伟大创造。他尖锐地指出：“这些年来，农民看到的只是极左路线给他们带来的苦难。在党中央提出要加快发展农业号召时，农民群众对生产队集体生产没

有信心,希望用包产到户办法多收粮食,为四化多作贡献,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积极性高涨的表现,也是生产责任心加强的反映。这种包产到户形式的出现,正是极左路线逼出来的,是对极左路线的反动。”发言还明确提出:停止“农业学大寨”的运动。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会发言后分组讨论,与会者分歧很大,尤其是华东组争论极为激烈。一些新闻单位和经济研究部门的同志,都纷纷前来旁听,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有的同志说,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分田单干,它与社会主义沾不上边,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如果放任自流,让包产到户滑下去,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被破坏了。

1月31日下午3时半,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参加听取汇报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农委的负责人也参加了汇报会。

会上,杜润生汇报会议情况后,华国锋讲了话。关于生产责任制问题,他除了重复1979年七省座谈会的观点外,特别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至于已经搞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组织起来。”

邓小平在会上也讲了话。虽然他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问题,没有明确讲什么,但是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本世纪末要达到小康水平,每人收入一千美元。他说:“这是个战略思想,定出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按照一千美金这个目标,考虑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

“我老周要是坐牢, 烦你送牢饭”

1980年1月10日,安徽省委召开了全省农业会议。万里在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稿是由周日礼主持起草的。讲话的中心内容是讲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初稿发给与会人员(各地、市、县委书记、专员、市长、县长及省直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后,争论很大,后来又写二稿、三稿、四稿;但基本内容未变。这时,有人提出,改组会议文件的写作班子,周日礼这班人不能参加大会讲话的起草工作。这个意见被万里否定了。后又三易其稿,定稿时万里讲了几句最核心的话:“实践证明,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比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增产效果更明显。现在对这种包产到户的做法是不是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之一,同志们看法有分歧。有些同志承认这种形式对改变长期落后的生产队效果显著,但又担心这样做违背中央的决定。其实,这样做正是实事求是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和中央的决定和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万里强调指出:“支持绝大多数农民的正当要求,尊重群众的选择和创造,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一切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出发,这就是我们敢于坚持联产责任制、敢于坚持按劳分配的各种形式而不动摇的根本所在。”万里这一番话,说出了广大农民的愿望,也说出了周日礼的心声。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80年3月,万里离开安徽后,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又出现了一次较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由于这次争论是从上面挑起来的,因

而迎合了某些干部的“左”的思想,对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愿望多方压制,在不少地方干部与群众“顶牛”的情况相当突出。此时,周日礼到处游说,为农业改革鼓与呼,为包产到户呐喊。这样一来,一些认识不同身居高位的人,依仗手中权势,甚至把“文革”中批判包产到户的帽子拿在手中,对周日礼等人进行上纲上线的斥责。

在这样吓人的氛围中,周日礼面不改色心不跳。因为他确认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他没有讲错、做错,而且有省委大多数领导同志的支持,更有广大农民的支持。他静待“清算”,并对司机老苏说:“我老周要是坐牢,烦你送牢饭。”

邓小平说:现在 农村工作的 主要问题是 思想不够解放

所幸,1980年5月30日,邓小平讲话了。这位伟人在一个内部谈话中高度赞扬了安徽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地方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

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还指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周日礼听到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后，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他打开酒瓶，大有一醉方休之势。

“周大胆”胆子更大了。他跑遍安徽大地，对农村各个领域的改革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和思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见解，决心把实践上升为理论。1982年金秋，全国农经学会在合肥稻香楼召开，周日礼应邀登台发言，题为《农民致富之路》，全面总结了安徽四年来农村改革的艰难历程，主要经验教训和今后改革的大思路。洋洋万言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会后全文发表在1982年12月21日《安徽日报》上。

著书立说的

酸甜苦辣

1983年秋，中共安徽省委农村

政策研究室成立，周日礼担任主任。在省委领导下，他一方面指导全省农村政策的研究工作，为省委制定保护专业户，加强小城镇建设等许多政策性规定和决定，一面重温马列经典著作，积极认真地探索农村的全面改革，把多年来农民伟大实践和自己参与改革的体会，加以条理化，系统化，1984年夏天，他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写成16万字的《家庭承包制探讨》一书。

这本书涉及的内容如合作经济组织问题；贸工农一体化问题；小城镇建设问题；乡镇企业快速发展问题；发展农村经济联合问题；农业社会化服务问题；流通体制改革问题；农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问题；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问题；开发性农业问题；科教兴农问题；农村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发展问题；大力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合同制问题；切实保护农民利益问题；建立农村各种专业协

会问题；多渠道扶贫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问题；加强合作经济经营管理问题；完善家庭联合承包制问题；开拓农业机械新路问题；雇工的政策问题，等等，许多今天人们仍在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在周日礼写的这本书中都涉及了。特别是全书的最后一章，明确提出并较为深刻分析传统观念必须变革的六个具体问题，对破“左”这个大问题，提出了许多今天看来仍有新鲜感的见解。这本书出版以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学术界人士的广泛兴趣。安徽省著名经济学家欧远方满怀激情，写了一篇书评，充分肯定了此书的价值，不仅称赞周日礼是一贯执著追求农村改革的直接实践者，又说，“总结安徽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探索改革未来之重任，历史地落在周日礼同志的身上。”

(责任编辑：方徨)

邮发代号 2—203 国外代号：
BM423

定价 4.50元 全年 27元

《人物》是全国首创名人传记类杂志，以介绍古今中外各种人物(以中国现当代人物为主)的双月刊。辟有《政坛风云》、《名人自述》、《名人专访》、《名人交往录》、《科技之星》、《当代企业家》、《文坛百家》、《学人春秋》、《艺苑英华》、《港台名人》、《华人与华侨》、《历史启示录》、《环球采风》、《域外写真》、《人物信箱》、《传记书窗》等多种栏目。文章富思想性、资料性、可读性，同时配有珍贵照片，具有长期保存价值。一卷在手，受益无穷。

本刊地址：北京朝内大街166号，邮编：100706，电话：5132884

作家文摘

国内统一刊号：CN11—0222

邮发代号 1—190

《作家文摘》以关注热点、荟萃精品为宗旨，依靠实力雄厚的作家队伍，展示文艺界最新创作成就，是献给广大读者的一份熔文学性、新闻性、趣味性为一炉的九十年代文化快餐。

《作家文摘》每逢周五出版，四开八版，辟有纪实之窗、传记文学、长篇连载、小说天地、艺苑春秋、风云人物、社会热点、生活随笔、文坛公案、中篇拔萃、域处采风、文海星辰等为大读者喜闻乐见的栏目，视野开阔，选编精当，真实生动，品位高雅。

《作家文摘》自1993年元旦创刊以来，已跃为首都零售量最大的周报，愿在新的一年里能得到更多读者的关怀与厚爱！

零售：每份0.40元 订阅优惠：每份0.35元

月价：1.50元 季价：4.50元 半年价：9元

全年价：18元

欢迎订阅「人物」杂志

包惠僧与陈独秀

●张继华

包惠僧是中共党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在周恩来之后出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当年也是赫赫有名，但后来却激流勇退，销声匿迹。

1894年，包惠僧出生于湖北黄冈，原名道亨。他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到武汉当记者，后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参加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仍回到武汉当记者。

“五·四”运动后，湖北建立了学生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当时，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邀请陈独秀从北京到武汉讲演，以扩大“五·四”运动的影响，加强联合与斗争。那时，陈独秀的名气很大，号称新文化运动的“三圣”之一。他到武汉后，讲演了几次，主要是讲反封建、反对北洋军阀，要自由、平等等。

在武汉期间，他们师生俩常在一起谈“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等问题。陈独秀还指导包惠僧读书、做人做事。

1920年下半年，刘伯垂受陈独秀委托到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陈独秀让刘去找包惠僧。后包惠僧和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武汉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组织的名称是武汉共产党临时支部，包惠僧被

推选为临时支部书记。

1920年10月，包惠僧由武汉到上海，同年5月，又到广州。他找到了陈独秀。陈当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包对陈说，李汉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让你回上海，或者把党的机关搬到广州来。陈独秀说，这里到处有无政府主义，对我们造谣诬蔑，怎么能搬到这里来？再说广州地理位置不适中，环境也不好，而上海居中。陈独秀让包惠僧在广州多住些日子。

包惠僧在广州住了两个月，他没事就到陈独秀的住处谈论党怎样搞的问题。陈独秀主张一面工作，一面革命。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了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陈独秀在谈到上海党的工作时，说：国际代表走了，上海滩难道就没有事可做了？李汉俊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可能要100年上下，中国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李汉俊可以先在他哥哥家住下来，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陈独秀主张各种思想争鸣，自

由发展，让各种思想都暴露出来，由人民群众评论是非。他对包惠僧说：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别人信仰无政府主义也不要紧，不要攻击别人。他反对谩骂。

在广州的两个月，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彼此性情相投。包认为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办事不怕得罪人，不迁就。当时，陈独秀是被陈炯明请到广州的，他在广州办了许多学校和宣传员养成所，他还安排包惠僧在宣传员养成所当监事，但包没有到任。陈独秀让包惠僧将来回湖北后也按他的样子去搞。

据包惠僧回忆，第三国际几次派代表来中国都是找陈独秀，把组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也交给了他。

一天，陈独秀召集包惠僧等人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200元路费。陈独秀说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他说，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

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就可以回去。陈独秀说了之后，大家都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后来，包惠僧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但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也不行。这样，包惠僧就坐海船到了上海，住在东亚旅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开幕。参加会议的有7个地区13名代表：包惠僧、陈公博、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刘仁静、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还有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一共15人。在这次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了。身在广州的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仍被选为中共总书记。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包惠僧和毛泽东的地位虽相同、但表现各异，27岁的包惠僧发言活跃，28岁的毛泽东则沉默寡言。

“一大”后，马林、张国焘、李达、周佛海和包惠僧开了一次会，讨论请陈独秀回上海问题。马林说，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就应尽到责任，要回来履职，不能让别人代理（当时，由周佛海代理陈的书记职务，但周要回日本上学，张国焘想取而代之，又说不出口），国际上没有这样的先例。马林还说，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最后，会议决定派包惠僧去广州接陈独秀。

包惠僧到广州时，陈独秀正与广州的军阀闹，很不愉快。包惠僧告诉陈独秀上海的情形，并传达了会议精神。陈独秀说他不完全同意马林的意见，但是答应回上海。他向陈

炯明辞职，陈炯明不同意，后来他就请假同包惠僧一同回上海。

在船上，包惠僧问陈独秀中国革命怎样搞法？陈独秀说，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潮流，共产主义在中国如何进行还要摸索。他认为由于各国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陈独秀还说，他干革命是因为不满现状，尤其不满北洋军阀的乌烟瘴气。作为共产党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包惠僧与陈独秀还说到第三国际的问题。陈独秀说，我们没有必要靠第三国际，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开展再找第三国际联系。陈独秀对于马林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些话非常反感。包惠僧还同陈独秀谈了武汉党的工作等问题。当时，陈独秀年近四十，言论谈吐同年青年人一样富有朝气。

包惠僧与陈独秀到上海后，陈独秀住在老渔阳里二号，包惠僧住在马霍路马德里三号楼上。包惠僧一到上海便派丁竹倩（即丁默屯）去告诉张国焘说，陈独秀回来了。第二天马林与张国焘便去看了陈独秀。

到上海的第三天，包惠僧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去，碰到张太雷正在同陈独秀谈和马林的关系问题。张太雷（又名春木），从苏联回来后协助马林工作。张太雷当时也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是共同的，不仅中国共产党，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

陈独秀、包惠僧等在与马林的接触中，感到他总是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居高临下，高人一等。另外，每次开会，张国焘都爱当主席，当大家对某个问题争论不休时，张国焘就说，先记录下来，等马林来了再决

定，搞得大家很不愉快。后来，陈独秀与马林反复交谈了三、四次，还是谈不拢。陈独秀便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陈独秀让包惠僧将来回武汉或是去重庆教书（当时重庆还没有党组织）。包惠僧说，我听你的意见。

三

陈独秀到上海后，报纸上登出他抵达的消息，竟引出一场大祸。

一天，包惠僧与周佛海、杨明斋、柯庆施（团员）一同去陈独秀家，陈独秀正在楼上睡午觉，陈独秀的太太高君曼让包等陪她打牌，刚打了两圈，有人敲门，包惠僧去开门，进来两个“白相人”，说要见陈独秀。包说陈独秀不在家，高君曼也说陈独秀不在家。那几个人又说要买《新青年》，包惠僧说这里不卖，外滩大自鸣钟下有卖的。这时，周佛海就走了。那几个人边说话边跨进门来。当时《新青年》在上海的印量很大，陈独秀家里四处都堆满了《新青年》杂志。那几个人指着堆在地上的《新青年》说，这儿不是有吗？这时，陈独秀穿着拖鞋下楼来了，见这情形想从后门出去，到门口一看有人把守，就又回到前庭。当时包惠僧等有些紧张，但都没有说出陈独秀来。

不一会儿，来了两部汽车，把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高君曼和陈独秀都带到了巡捕房。巡捕房一一问了被捕者的姓名、职业、与陈独秀的关系等。陈独秀报名王坦甫，包惠僧报名杨一如，其它人也都报上假名字。接着打了指纹。不久，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和邵力子也先后被捕。褚辅成看到陈独秀，上前去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这下陈独秀暴露了。

巡捕房弄清了褚辅成与邵力子的身份后,就把他们释放了。

第二天,审问时,法庭认为包惠僧等是陈独秀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来的,我太太是家庭妇女,有事我负责,和他们无关,后来,巡捕房就将高君曼放了。其他人仍押回监。

在牢中,陈独秀对包说,他家有马林给他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他打算坐牢。陈独秀让包惠僧等出狱后继续干。他让包还是回武汉,不愿干也不勉强。

陈独秀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被捕后闹得上海满城风雨。第二天褚辅成和张继等就将他保释出去了,马林为营救包惠僧等人做了不少工作,花了许多钱请律师(律师名巴和)买铺保。五天之后,包惠僧等也被保释出来。人虽然放了,但要随传随到。20多天后又会上,说陈独秀宣传赤化,最后,经过马林的种种活动,定案是《新青年》有过激言论,结果罚款5000元了事。马林为营救陈独秀等人出了不少力,为此,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好了。

1921年9、10月间,包惠僧按陈独秀的意见回武汉工作,担任中共武汉支部书记,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当时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在上海,张国焘兼任总部主任,南方支部主任是谭平山,北方支部主任是罗章龙。

四

1925年2月,蒋介石、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后方主任。前方主任由周恩来担任。6月,黄埔军校学生全部回校复课,周恩来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于是,整个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全部由包惠僧负责,那时他才31岁。



包惠僧

南昌起义后,他消极脱党,后来,他利用在国民党中的一些老关系,到国民党里当官去了。包惠僧在国民革命军内官阶为中将,也算高级将领,但没有什么实权,只担任幕僚角色。1936年,包由军界退役,转任内政部参事,后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陈独秀,被中共宣布开除党籍之后,又被国民党关押了多年,出狱之后1938年逃难到四川。

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县时,门庭冷落,贫病交加,包惠僧是唯一经常去探望他的老朋友。

陈独秀于1942年5月27日病逝。

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包惠僧逃到澳门,他从大陆带出的钱不多,坐吃山空,万般无奈中,他向周恩来发出了一份电报: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
恩来兄鉴:

兄等以廿余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服,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主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领,蜀胜欷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

弟包惠僧叩

不久,包惠僧回到大陆,先任内务部参事,后任国务院参事。

1966年,“文革”爆发,包惠僧受到很大冲击,吓得他将珍藏40年陈独秀写给他100多封信都付之一炬。据专家们分析,这100多封信政治价值姑且不论,仅经济上的损失就不止100万美元,因陈独秀的墨宝传世不多,在国际文物市场上有极高的价值。

1979年,包惠僧因病去世,终年85岁,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3位代表中第12位离世者。

(责任编辑:刘家驹)

出身微寒的 “政治夫人”李德全

● 舒云



三十年代初，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在泰山

她作为中国妇女的代表，出席过1946年在美国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她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又出席了1953年在丹麦召开的又一次世界妇女会议。当我细细地数着她那遍及欧亚美非四大洲的足迹和有着70多个主席、副主席头衔的履历表时，我的心并没有特别的激动，然而，当我从她女儿那里听到她一件件往事的时候，我的心被撼动了。

她就是爱国将军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应约采访了冯玉祥和李德全的女儿冯理达。

冯理达曾经在海军总医院当副院长，已70岁了，她是享誉国内外的中国气功界专家。

从冯理达含泪对母亲的回忆中，我走进了李德全的童年以及她的一生。

李德全出生在1896年的北京通县德兴庄草房村。有一年兵乱，母亲带三个女孩子逃荒，后接连又生了六个儿子。这一大堆嘴，靠父亲扛大个儿或到运河上当船工来维持。

大姐因为阑尾炎手术误把剪子留在肚子里，第二次手术失败而早

逝。这件事对李德全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年轻时想学医，只是没钱。以后她要求自己的两个女儿和自己妹妹的两个女儿都学医生，想自己开办医院，不能让庸医再害人了。我们国家著名的女医生林巧稚、林兰英都是在李德全的支持下学医的。李德全的下面有七个弟妹，理所当然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是家中的顶梁柱了。她开始在家烧火做饭，照顾弟妹，还经常到地里弯着小小的身子在前面代替牛拉犁。

二

李德全在教会的支持下，进了通县富育小学，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了北京贝满女中。中学毕业后，她以大学毕业后回母校任教和逐年偿还贷款为条件，又申请了教会的一笔钱，成了北京燕京大学的前身之一、私立女子协和大学的一名女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大学生。

大学毕业时李德全已二十四五岁了。在二十年代的北方，女孩子在十六七岁就有了婆家，而李德全为了偿还教会的贷款，以及供养几个弟弟上学，一直没顾上谈自己的婚事。

转眼她就29岁了。亲戚朋友都很着急。有一天，和李德全走得很近的一个堂姐对李德全说：“有一个大兵想请我吃饭，可我害怕，怎么办？要不你陪我去。”

李德全说：“大兵有什么可怕的？又不是三头六臂，去就去。”

就是这一顿饭，月老的红线就把李德全和冯玉祥连到了一起。

冯理达说，其实，这是一个有意引母亲上钩的圈套，母亲是蒙在鼓里，人家早就安排好了。如果要说是去相对象，母亲是不一定会去的。

这时候冯玉祥正在北京任陆军检阅使。有不少热心的人给他介绍小姐，大兵出身的他都不愿意，丧偶两年多了，还一直拖着。正好李德全的堂姐夫是冯玉祥部下，就给冯玉祥提了这门亲。

有缘分的是，偏偏冯玉祥在不久前还听过了李德全的演讲，非常佩服，能让冯玉祥佩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冯玉祥不仅是个出色的带兵人，也长于演讲，还是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冯理达说，父亲家里也很穷，爷爷逃荒逃到山东，给奶奶家打工，奶奶家看小伙子不错，就把女儿嫁给了他。以后，爷爷到保定当了兵，又当了班长，把11岁的父亲补进军队。那时是晚清，晚清的兵都抽大烟，嗓子眼烟熏火燎喊不了操，那时不会喊操就当不了官。还规定，谁能喊操就给谁补助。父亲穷，对那点补助很看重，就天天一大早到操场上喊嗓子，越喊声越高，就由兵成了官。再加上当时有这样一条规矩，谁

能背手枪说明书，增加一块大洋的军饷。这更让冯玉祥如鱼得水，他在家中读私塾时，教师要让学生先背下200篇再教，冯玉祥的背功就这样练了出来，再厚的手枪说明书，他也能很快背下来。

在那顿饭局中，就挑明了话头。冯玉祥首先表示了同意。李德全也没有意见。

李德全早就听说过冯玉祥，对他的行为很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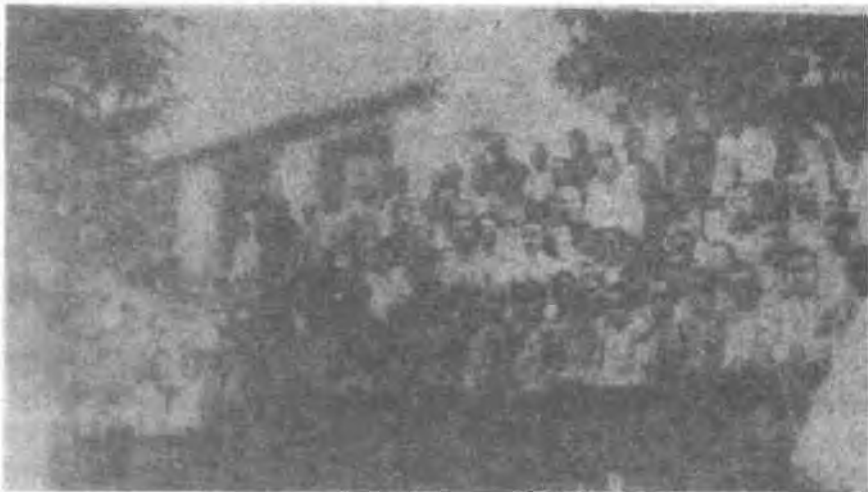
早年，冯玉祥响应辛亥革命，在滦州举行了起义。以后，他反对袁世凯称帝，讨伐张勋复辟，这桩桩件件都很得民心。

李德全自己也是一个很坚定的革命分子。五四运动爆发后，她在北京女学生联合会中担任职务，组织女同学上街演讲，营救被捕同学。

除了这些彼此相似的原因，他们两人还都是基督徒。冯玉祥是有名的基督将军，李德全在她三岁的时候就由父亲抱到教堂举行了洗礼。

有一次开玩笑，冯玉祥问李德全：“你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李德全说：“上帝怕你不为人民



1935年，李德全在泰山创办纪念武训小学15所



1938年，中国战时保育会筹备会上，李德全和邓颖超等合影

办事，派我来监督你。”

李德全由此走出了学校和教会的小圈子，从给中学生讲代数和西洋史，到给军官教导团讲解三民主义，这对李德全来说是一个大大的飞跃，她接触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了政治。她在苏联时，列宁的妹妹十分敬重她。还送给她一支小手枪作为纪念。

李德全在教会学校接受的西洋教育，也给冯玉祥打开了一扇很新鲜的大门。他们结婚的这一年，正是孙中山给三民主义赋予新的内容的一年，他们坚决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李德全代表冯玉祥前去迎接，孙中山送给她6000册

《三民主义》和1000册《建国大纲》，其中有一本亲手抄的。这是珍品，孙中山一共就抄了两本，另一本给了宋庆龄。1945年8月，在重庆九龙坡机场代表冯玉祥迎接毛泽东的也是李德全。

那时，人们都说李德全是“政治夫人”。

女儿冯理达说，旧军人出身的父亲和大学生基督徒的母亲，一个旧，一个新，应该是水火不相容的，他俩却非常融洽。

三

1926年5月，李德全随冯玉祥访问苏联，三个月后冯玉祥回国，李

德全继续留在苏联参观。她结识了很多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同志，也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这使她的世界观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她决心以苏联妇女为榜样，为中国的劳苦大众贡献自己的力量。

早在她来苏联的前一年，李德全就在北京创办了一所求知学校，吸收贫苦的儿童免费入学。回国后，她随冯玉祥潜居泰山时，变卖了结婚时的全部首饰，和冯玉祥一起办了14所纪念武训的小学和一所高等小学，招生2000多人，以后这些学校的学生很多参加了抗日救国行

列。

1938年3月，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党派、爱国知名人士在武汉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分会，安置了大批的战区难童。李德全是其中的一名发起人。她担任了副理事长，理事长是宋美龄，组织大规模的艰巨的难童抢救工作，从战火中先后抢救出了两万多名难童，送到后方建立了40多个儿童保育院。不仅如此，她还倾其所有，认捐了511名儿童的保育费。当时，宋美龄认捐了200名儿童的保育费。按一名儿童60元计算，李德全拿出了30000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了不起的财产了。

1939年，周恩来在中国女子大

学开学典礼上谈到妇女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时说：“李德全等女士，对于抢救难童、保育工作，均有极大的贡献。”

李德全慷慨拿出了自己几乎全部的家产为了素不相识的难童，而对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却极小气。冯理达直到现在还记得她很小就被放在求知学校，一顿饭只有一个小馒头，根本吃不饱。每次坐人力车上学时，她都坐在脚底下的位置。

四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冯玉祥和李德全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从美国赶回来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轮船突然失火，冯玉祥和小女儿冯晓达不幸遇难。

究竟是谁放的火？

国民党指责苏联。因为那艘船是苏联的。

苏联指责是国民党。

因为始终没有抓住凶手，也就始终是一个谜。

其实谜是不谜的，国民党早就把冯玉祥恨之入骨，欲置于死地了。

李德全从苏联回来时，国民党右派分子公开指责她“游俄归来，信仰忽移”。抗日救亡，她一直站在最前线。她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李德全为了反对蒋介石策动内战，组织了陪都各界民众庆祝和平大会。2月9日，重庆各界公推冯玉祥、董必武、沈钧儒、邵力子等27人为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筹委，李德全任大会总主席。

1946年2月10日，轰动全国的“较场口血案”发生，冯玉祥赋诗怒斥国民党反人民、反民主暴案行：

……

开个庆祝会，本来是很对。
会竟没开成，民众被打退。
对着主席团，居然发大威。
有的破口骂，有的砖头飞。
章乃器被打，李公朴被毁。
郭沫若受伤，施复亮挨捶。
还有受伤者，打坏一条腿。
……

被“打坏一条腿”的就是指李德全。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发生后，李德全带着受伤的腿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她和冯玉祥一起设法掩护和营救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

为了除掉实行内战独裁的大障碍，蒋介石以“考察水利”为名把冯玉祥放逐美国。1946年秋，李德全和冯玉祥以及女儿冯理达等来到美国旧金山。李德全出席了世界妇女大会，在国际讲坛上她提出了两个提案，一个是“联合世界各国妇女为争取民主和平而奋斗”，一个是“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发动内战”。两个提案都获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

1947年10月10日，冯玉祥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国庆演词》，公开揭露蒋介石独裁卖国，一个月后，冯玉祥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我为什么与蒋介石决裂》一文，说蒋政权是所有中国坏政府的顶点，无论多少外国金钱也不能挽救他的垮台。这一下，蒋介石是真坐不住了。

李德全给冯玉祥写信说：“国民党党员要重新登记了，老蒋招你回国，这一切都证明你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更高了，高得使他怕极了！努力吧，光明就在眼前。”

冯玉祥不回国，蒋介石宣布了开除冯玉祥国民党党籍。冯玉祥立即发表了一封致蒋介石的公开信：“现在我已经感到过去支持你的罪过，而要向中国人民负起责任，协助他们把你赶走。”

这时，冯玉祥已经做好了随时

被暗害的准备，他于1948年2月10日在纽约亲笔预立了遗嘱。一共七条，主要内容是：1. 联俄联共，这是方针；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和民盟宣言可作为指针；3. 反帝反封建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一定会胜利；4. 蒋介石是帝国主义走狗，非铲除不可；5. 房子全给李德全；6. 还有几个未成年的孩子，能够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7. 如果我是在国内，骨灰深埋六尺种树，树成给学生作桌椅……

冯玉祥口述，李德全记录整理，还写完了《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1948年夏天，冯玉祥一家回国参加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为了安全，坐了一艘“胜利”号轮船，取道苏联回国。本来船上没有什么乘客，却不知道为什么在瑞士的一个港口停了很长时间，还上来一群人。9月1日，船行到黑海，着了场大火。

冯理达当时在船上，她回忆说，因为大家都在睡觉，没有谁知道火是怎么着起来的，等到发现，舱里全都是烟了。冯理达当时就给滚滚的烟熏昏了，被家人从小小的舱房窗户给塞到了甲板上，呼吸了新鲜空气才逐渐清醒过来。小女儿晓达说出去看看，跑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父亲母亲在另一间舱房，满房子都是烟，等救出来，父亲已经去世了。冯理达说底舱还有很多的学生，都被烟熏死了。母亲也被熏昏了。在船上她一直不知道冯玉祥的去世，到了苏联儿女们才告诉她，几天工夫，她的头发就全白了。但她还是撑着病弱的身体，为冯玉祥操办了后事。

（责任编辑：刘家驹）

抗联总司令赵尚志的壮曲悲歌

● 朱秀海

风起于青萍

1936年秋,以小兴安岭为根据地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此时的三军已拥有十个师,活动范围遍及哈尔滨以东地区松花江北岸等二十余县。总兵员达六千余人,成为东北抗日联军历史上力量最强大的一个军。

作为三军军长,又是“东北抗日联合军总司令”的赵尚志,心情上却一直罩着一层阴影。

起因是去年秋天,由中共吉东特委向三军传达《六三指示信》(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1935年6月3日给东北党和军队的指示信)、和吉东特委的《补充信》。信称:“按目前反日统一战线观点来看,我们对保甲制度及(伪)自卫团的策略必须要转变。我们不能把所有保长、甲长、牌长都看作日本的走狗。……对它们的一般原则是联合或中立,而决不是和他们打仗。”随着日寇开始在东北实施野蛮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其对伪军和伪基层政权的控制越来越严密,赵尚志觉得这种所谓“不与自卫团作战”的提法简直是痴人说梦。赵尚志对“抗日反满”不并提”等口号也极为反感,他认为其足以动摇和瓦解敌众我寡情况下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抗联部队的士气。

更使赵尚志迷乱和生疑的是,吉东特委本来是一下级组织,如何代表起满洲省委来了?恰好又传来了四军代理政治部主任罗英被捕叛变、吉东特委被破坏的消息,赵尚志于是猛醒地给自己的怀疑找到了解释:所有这些文件都是假的,是敌特机关伪造出来破坏北满抗日武装斗争的。不是省委出了奸细,而是吉东方面出了奸细!于是,赵尚志决定

“独立处理一切”。

1936年9月18日,北满方面的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联席会议在汤原帽儿山三军被服厂召开,北满临时省委正式成立,原满洲省委书记冯仲云任书记,李福林任省委部长,张兰生任宣传部长,同时选举李兆麟等15人为省委执行委员,赵尚志担任省执委主席。会议对《六.三指示信》、《吉特补充信》、认定其是“右倾投降主义政策”,肯定了三军一贯的斗争策略,确定了北满抗联主力三军和六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风雪两千里西征

1936年9月,伪“满”军进入南满“讨伐”杨靖宇,关东军主力则汇集到三江地区“讨伐”北满和吉东抗联各军。9月中旬,由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吴景才率领的二、三师先遣队跨过松花江,刚进入铁力东山,就与当地日伪军展开了激战,先后消灭了80多名敌人。

三军先遣队在铁力的出现已引起北满日军最高指挥官的高度注意,赵尚志率三军主力刚刚启程,日军司令部便迅速部署“大讨伐”。

在敌人重兵围堵之中,赵尚志率领骑兵队声东击西,迂回急进,让敌人相信他的攻击目标就是木兰以西的呼兰县城。日军在巴彦一线迅速组织起数道大纵深的阻击。赵尚志率队突然转道北上,向庆城、铁力前进。12月中旬,赵尚志进入海伦、通北两县交界处,他决心对尾追之敌杀个“回马枪”。时值隆冬,冰天雪地,赵尚志率领部队进入深山,在一个叫“冰趟子”的地方设下了伏兵。

这“冰趟子”乃是一面山坡,上面是几座伐木工人住的木屋(木屋),山顶终年流淌着几道泉水,冬天便在山坡上结成了冰面,当地人

称它为“冰趟子”。赵尚志让部队在沟口两侧用雪和水筑成冰墙。第三天夜晚，七、八百日军果然进沟了。赵尚志发令：“打！”刹那间，山沟两侧，枪声震耳，弹雨纷飞。日军仗着人多，“呀呀”叫着向我坡顶阵地冲击。敌人夜间看不清楚，冲上冰趟子就往下滑，滑下来再往上冲，最后只能趴在沟底，被动挨打。是夜奇寒，我军战士的枪栓半小时就要上冻，赵尚志令人在木营里生上几堆火，让大家轮换着进来烘烤枪栓。日军就惨了，他们趴在“冰趟子”上，枪栓拉不开，受伤的日军则被冻在冰面上，一夜竟有数十人冻死。天亮时，我军子弹已差不多打光，一部分日军才从沟口突围而出。赵尚志派人打扫战场，发现被击毙或击伤后被冻死的日军达 300 余人。

“冰趟子”战斗是三军历史上与日军作战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也是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军作战中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之一。

“冰趟子”战斗后，赵尚志率一师和军部少年连继续北上，进入黑龙江流域和龙门境内。这里是一片茫茫林海，没有人烟，部队在零下四、五十度的酷寒里夜夜露宿雪野，给养已断绝，赵尚志被迫下令杀马充饥。日军派来三架飞机和大批步兵，紧追不舍。这时赵尚志身边只剩百余人，他让人将多余的枪支埋起来。一天夜晚，部队宿营时哨兵因过度劳累而睡死，跟踪而来的敌人趁机将我军包围。战斗中我军牺牲 30 人，还失去了所有战马，突围而出的仅 70 余人。他们在赵尚志带领下，靠橡籽充饥，终于穿越茫茫原始森林，回到了汤原汤旺河后方根据地。一年多的时间内，面对日军的重点“讨伐”，三军和六军部队风雪二千余里，大小百余战，虽打破了关东军 1936 年冬天对抗联各军“聚而歼之”的计划，实力却受到了重大损失，在

长期缺粮的情况下，他们仅战马就吃掉 1500 匹。困厄之中，他的目光北移，希望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因为中共代表团正在莫斯科领导东北的斗争，东北抗日联军既是为祖国而战，也牵制了日军，保卫了苏联。

汤旺河会议 总司令的 悲剧开始

赵尚志哪里知道，当他率三军主力远征之际，北满临时省委与吉东党组织之间的争论愈演愈烈。这年冬天，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看到了北满传到吉东的珠汤联席会议指责《六、三指示信》的决议，极为震惊，认为北满党组织正在执行一条“反中央”的路线。

与此同时，被赵尚志派往木兰、巴彦一带改编三军六师与九师的李兆麟回到汤原，看了珠汤联席会议决议，当即向北满临时省委提出了一份《意见书》。《意见书》说：珠汤联席会议决议“否认中央驻东北代表来信”，是“小资产阶级神经过敏无端生疑。”他要求北满的临时省委“彻底猛醒这一决议的错误精神”。

6 月下旬，李兆麟和周保中一起北上，到达汤原汤旺河后方基地。6 月 28 日，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六军被服厂正式召开。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及北满临时省委的其他主要干部都出席了会议。在三天的会议中，周保中



赵尚志

阐述了吉东对北满所犯“错误”的一贯看法，对北满方面盛传的“吉东有奸细”的问题做了解释，明确了坚决维护“中央路线”的原则立场。

赵尚志开始发言。他仍然坚持珠汤联席会议决议的观点，不承认“中央来信”中诸如“抗日反‘满’不并提”、“不要把伪军视为日本走狗”之类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吉东方面执行的是“右倾取消主义的投降政策”。最后，会议通过的决议仍然坚持珠汤联席会议的观点。会议不但没有纠正珠汤联席会议的“错误”，相反还对省委书记冯仲云的“调和主义”错误展开批判，决定撤销他的书记职务，改任宣传部长，由原宣传部长张兰生担任省委书记。

周保中带着强烈愤懑之情离开了汤旺河。会议结束时，李兆麟也没有认可这个决议。他现在更有理由认为，北满党组织正沿着“反党”的道路越走越远。



赵尚志指挥的“冰趟子”战斗(油画)

从伯力 带来的“口信”

此时，赵尚志一点也不知道悲剧正向自己走来。1937年冬天，敌人组织“三江大讨伐”的总兵力达五万多人，比过去任何一年都要多上几倍。汤旺河会议以后，由于三军精锐西征受挫，改编的七师、八师又相继叛变投敌，队伍急需巩固。他调李兆麟回三军任政治部主任，加强思想工作。部署中，赵尚志对三军各部的反“讨伐”已力不从心；他要求在哈东和下江活动的各部队就地坚持游击战争。11月，他做了一件后悔终生的事：写信给驻伯力的苏联远东军司令布留赫尔，要求苏方给予援助，并将他写的一封信转交中共中央。

严寒的12月，六军一师代理师长陈绍滨率一支小队伍于战斗失利之后，踏着黑龙江上的坚冰，退入苏境。不久，陈绍滨带队回到南岸，带给北满临时省委一个“重要口信”：

苏联远东军司令部要求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去苏商谈重大问题。这个口信让一直在等待苏方回音的赵尚志十分振奋，也让北满临时省委的成员们非常激动。省委主要负责人随即在依东杨家沟召开会议，会议上大家情绪很高，都说：既然苏联邀请我们，我方又急需援助，一定要去！我们今天在东北拖住了日本人的腿，也就保卫了苏联。无论是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还是基于苏联自己的利益，他们都应当支持我们。赵尚志说：这次派人去苏，一定要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恢复北满临时省委与党中央的直接联系。他和李兆麟很快草拟了一个计划，要求苏方为我军提供枪枝弹药、粮食服装，在黑龙江对岸建立后方医院、营地和军政干部学校，从根本上改变东北抗联没有后方支援的困难局面。

在谁代表东北抗联赴苏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赵尚志提议李兆麟去，李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主任，擅长“外交”

(指做友军的政治工作)，现在与“老毛子”打交道，非他去不可。李兆麟坚持赵尚志去；苏方要求会见的是东北抗联的主要领导人，你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总司令，你不去不足以表示我方的诚意。赵尚志再三说他去不合适，他是三军军长，北满的总司令，1937年冬季的反“讨伐”斗争刚刚展开，他不能脱离自己的指挥位置。这时李兆麟等人说：时间不会很长的，你去了，很多问题就能当面决定，别人去了不行，这样反而节省时间。赵尚志没有理由不同意这样的分析，再说他也真想亲自赴苏，与“党中央”接上关系，就吉东与北满之间关于现阶段斗争策略的乱麻，搞个清楚！他答应去苏方交涉一回！

1937年12月31日，赵尚志在萝北县公立永屯与李兆麟、张兰生、冯仲云、戴鸿滨等人告别，约好一个月后仍由李兆麟等人集结三、六军部队来此迎接，搬运赵尚志带回的武器弹药和给养。之后，赵尚志由三军九师师长李振远率一支小队伍护送，另带警卫员郭录等6人，一步步向冰封的黑龙江走去。在接近江岸的地方，他让李振远等人停下，自己和警卫员继续朝前走。

1938年1月1日凌晨，赵尚志越过黑龙江宽阔的江面，踏上异国的土地。

雪原茫茫，褐色天际处有一亮光，是苏方的一个边防哨所。赵尚志走过去，他向他们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第二天，他被一辆卡车送往伯力，关进监狱。进监狱前，一位苏联远东军少校会见了。赵尚志对苏方给予他的粗暴接待大为惊讶和不满，声明他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是应苏联远东军司令员布留赫尔的邀请来此商谈重大问题的。苏军少

校去打了一个电话，回来后告诉赵尚志：苏联远东军方面从来也没有对他或东北抗联的任何领导人发出过邀请，苏方不能承认他是自己的客人，只能认为他是一个擅自偷越国境者。对于他这类人，苏方一贯的做法是送入监狱。

1938年2月4日，为接应赵尚志，六军军长戴鸿滨、三军一师师长蔡近葵、九师师长李振远率领三、六军部队五百人，兵分两路，向萝北县城肇兴镇发起突然袭击。战斗进行三昼夜，我军虽攻进西门，终未能将该镇攻克。为避免重大伤亡，戴鸿滨指挥部队撤出，随后与由富锦来援的日军遭遇，敌将我压至黑龙江江岸一线，突围无望。戴鸿滨和蔡近葵、李振远决定率部退入苏境，2月5日，戴鸿滨部入苏，当即被苏军缴械，以防止瘟疫为理由，衣服、枪支悉数被焚，戴鸿滨被送至伯力监狱，半年后方与赵尚志关在一起，蔡近葵、李振远所部五百人被送上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送往新疆，交与苏方关系尚好的“红色军阀”盛世才。北满抗联部队的一支精锐，就这样永远退出了抗日战场。

千古之谜： 谁要关押赵尚志

赵尚志被苏联远东军关押是抗联斗争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成了北满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是谁要关押赵尚志？为什么要关押赵尚志？直到今天，有关历史都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有的干脆避口不谈，有的语焉不详，有的则只将赵尚志被关押的事实写出来了事。没有人试图对它做出解释。

但事隔50余年之后，再不回答这些问题，笔者便很难向今天的读者做出交代。赵尚志不是一般的抗

日英雄，他是北满抗联队伍的主要奠基人和领袖，无论事情多么复杂，时至今日，人们都应当还给他一个公正。

然而解开这个谜却不容易。我们必须透过重重迷雾，看到深处。

谁要关押赵尚志？最希望关押赵尚志的是日本人。日伪最高当局出动了十万大军“讨伐”南满、北满、下江地区的抗日联军，他们最想从肉体上消灭的抗联领袖有三个人是南满的杨靖宇、北满的赵尚志、吉东的周保中。但设想由日本人和苏联人合谋，将赵尚志骗至苏方关押，可能性几乎完全不存在。“九·一八”以来，苏联一直想与日本“睦邻友好”，订立苏日互不侵犯条约，日方却不理这个茬，始终把苏联视为敌国。

其次是苏联人。出于苏联人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们也有可能想把赵尚志关押起来。“九·一八”后，斯大林一直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在处理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之类的事情上，坚持所谓“中立政策”，诸如过去对于退入苏境的义勇军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各部，均以“擅自非法越境”为口实，将其首领“礼送出境”，部队全部缴械，遣送新疆。这样做既给予了越境的中国军队以“保护”，又帮了日本人的忙，将抗日联军“驱逐”出了东北，对于后来兵败越境的抗联部队，苏方采取的也是同样态度。赵尚志是东北境内影响最大的抗日领袖之一，日本人对其恨之入骨，赵尚志越境赴苏会让关东军“极为不安”，从一贯执行不“刺激”日本人的政策方面考虑，苏联人将赵尚志以“擅自越境”的罪名关押起来，也是毫不奇怪的。但赵尚志归根结底是因为苏方传来的一个“口信”才决定赴苏的。没有这个“口信”，一切都无从谈起。

发出“口信”的只可能是需要让

赵尚志赴苏、并加以关押的机构或人。

有“理由”关押赵尚志的首先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袖王明和康生。由于赵尚志公开对抗“中央指示”，把北满变成了一个不听“中央”指挥的独立王国。对这样一个，由王明或康生下令，通过苏联远东军肃反机关，将其骗至苏境关押起来，不但是非常可能的，从王、康的角度看，还是合“情”合“理”的，是他们作为领导者应做的事情。

唯一的漏洞是：“七·七事变”后，共产国际决定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回国工作，他们已于11月27日飞抵延安。赵尚志是在11月中旬接到苏方“口信”的，这时王明、康生已经离开莫斯科。他们有没有可能于行前从容地将一切都安排好，然后由苏联远东军去执行这个诱骗加关押的计划？

第一种可能：王、康制订了上面的计划，交由苏联远东军执行，后者在执行过程中将时间拖延到了王、康离苏之后。这里的问题是：苏联远东军会如此耐心地为他们尽这种颇为棘手的“国际主义义务”，并将事情做得如此天衣无缝吗？

第二种可能是：王明、康生可能早有除去赵尚志之意，但他们却只能将这件事交给东北党组织自己做。王明已经知道赵尚志的种种“反党”行为，对此不做任何反应倒是不合逻辑的，但远在莫斯科的他们直接指挥苏联远东军是困难的，却能指挥东北党组织。但并没有资料表明王明向东北党发出过这种指示。

如果赵尚志被关押与王明、康生完全没关系，那么东北党内希望苏联人将赵志关押起来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周保中，一个是李兆麟。

周保中与赵尚志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他们之间的分歧都是些重大

原则分歧。赵尚志拒不执行“中央路线”，客观上阻碍了北满党与吉东党及下江各军的统一，赵尚志在北满存在一天，吉东和北满就会对立一天，要改变这种局面，方法只有一个：除掉赵尚志。为了维护党的纪律和统一，为了下江及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周保中这位原则性极强的人，想到这件事是可能的。

但现存的所有史料却都在无意之中说明了恰恰是周保中与此事毫无干系。

1938年2月，他第一次越境赴苏，得知赵尚志、戴鸿滨等人被关押，向苏方联络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和要求就是：“赵尚志等人被关在哪里？必须赶快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重返东北战场！”3月，赵尚志一去两个月不返，北满党内便开始了一场反对赵尚志的斗争，并很快对赵尚志本人做出极严厉的处分决定。周保中为此大为吃惊，他非常不满地写信给北满省委的领导人，指出：批判的目标“不能限于个别同志对个别同志”，而应追究省委的责任。1940年初，北满省委决定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又是他主动提出，让赵尚志到二军来担任副总指挥。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周保中在赵尚志的问题上是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

最后是李兆麟。在所有可能插手关押赵尚志的人中，他的嫌疑最大，行为也最容易让人生疑。李兆麟认为赵尚志已带北满党和军队走上了一条“反对中央路线”的道路。他失败了。北满党已经不可能运用正常的手段解决赵尚志的问题，那么，在极端情况下采用某种极端措施，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李兆麟不是无耻小人，也是一位名满北满的抗日英雄。北满党和军队需要摆脱赵尚志，回到“中央路线”上来，当他真地去做那件事时，不但不会认为自己有错，相反，他的

内心里，还极可能充满了强烈的党性意识，巨大的勇气、使命感和豪情。

能够说清一切的人，只能是那个将“口信”从苏方“带回”的陈绍滨。“文化革命”期间，陈绍滨被打成“叛徒”，饱受折磨，但他一直没有承认自己当年给北满临时省委带回的“口信”是假的。现在陈绍滨已经去世，我们能够想象的是：也许他是诚实的。陈绍滨极有可能一直认为，当年他参与了将赵尚志诱至苏联以便摆脱他的行动，不仅不能说是一桩罪恶，相反倒是他为北满党和军队立下的一件功勋。

从本质上说，赵尚志所处的正是一个悲剧时代，而他的遭遇则是一幕时代的悲剧。日寇加紧对东北抗日联军“大讨伐”的危机形势，东北党和军队与党中央长期隔绝的状态，王明等人后期对东北抗联斗争指导上的右倾倾向，三十年代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恶劣风气，共同酿造了这幕悲剧。以今天的眼光看，赵尚志当年反对“中央路线”中的“右倾”倾向其实是正确的，无论是周保中还是李兆麟，在以后的实际斗争中，从没有机械地去执行过这条“路线”；但是，赵尚志坚持正确斗争策略的同时却违犯了党的原则，犯下了公开反对“中央路线”的错误。正是这种错位，直接给他带来了悲剧性的命运。如果他在汤旺河会议不那固执己见，在“吉东渠道”的合法性被证实、“吉东有奸细”的流言被澄清之后，他那怕对“中央路线”和吉东代表周保中表示一点妥协的愿望，事情也许就会两样。

但假若如此，赵尚志也就不是赵尚志了。

赵尚志的悲剧也是性格悲剧。他有很多缺点，粗暴，专横，在北满党和军队内的地位和威望越高，他就越显得霸道、独断，不给别人民

主。在斗争和妥协两种策略之间，他越来越倾向于斗争。他有坚定的意志，明确的信念，火样的热情，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经历的胜利和挫折越多，他就越是比相信别人更相信自己。即使对于所谓“中央路线”，他也要求它与自己对现实斗争的理解和分析相一致，一旦出现分歧，他也不总是固执己见，但若认定了自己正确，他却会走向极端，不管自己反对的是来自哪个方向的大人物。他在汤旺河会议上明目张胆地反对所谓“中央路线”就是明证。我们看不出他当时那样做对个人有什么好处，唯一的解释是他深知按照“中央路线”搞，东北抗日联军就会从总体上走向消极和瓦解，大好的斗争形势就会转入衰败。他这时的固执只能用他对东北党和军队、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大局负责来解释。赵尚志这时也在坚持一条共产党人的“原则”，不过它是一条未正式载入党章的“原则”。从这层意义上看，赵尚志不是一位完全成熟的共产党员，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他具有的只是一种悲剧人格，于是也就很自然地走向了个人的悲剧命运。

赵尚志在伯力的苏联监狱（一间地下室）里被关押了一年又六个月。第一，他没有被苏方当作马占山、苏炳文一类的抗日领袖“礼送出境”。第二，他也没有像蔡近葵、李振远等五百名三、六军越境官兵一样被遣送去新疆。这种结局很可能是当初要关押他的人从未想到的。赵尚志的命运在这里出现了又一次转折——

在他被关押的时间内，东北抗日战场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抗日联军仍在浴血奋战，但大好形势却看不到了，抗联作为一支曾兴盛一时的抗日队伍，正步当年义勇军的后尘，在最后的悲壮斗争中走向溃败。更重要的是，在一年零六个月的关

押期间，赵尚志自己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明白自己被人“暗算”了。一年零六个月的异国囚徒生活结束之后，当他重新率领一支小队伍踏上东北大地时，他那暴烈而受了伤害的心不仅是愤懑不平的，而且是充满了阴暗猜疑。这时，他的悲剧人格被强化了。

悲壮的西征

关进苏联监狱之后，没有了赵尚志的北满党和军队又遇上了空前严峻的斗争局面。2月，万余名日伪军进入我汤原根据地，用枪杀、火烧、刀劈、填井等等野蛮手段，成百上千的屠杀居民，仅用23天时间，就基本摧毁了北满抗联部队赖以立足的汤原后方根据地。

3月15日，由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直接指挥，叛徒提供的情报，对我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所属七个县的党组织实施大搜捕，我方被捕三百余人，中共依兰、桦川、富锦、绥滨、汤原县委和佳木斯市委均遭破坏，通河、延寿、方正、凤山等县的党组织几乎全部损失。接着大批日军进入深山，三军三、四师在依兰东部山区的密营被摧毁，师长郝贵林、陆希田相继牺牲，4月，活动在宾县、延寿一带的三军二师师长关化新在敌人“拉网清剿”中牺牲，余部冒死突围，兵力只剩下五分之一。同月，由义勇军收编的十师师长高士魁悲观失望，带部分人员投敌。5月，活动在巴彦、木兰、东兴一带的六师和九师王德富、孟广才牺牲或被捕。六军一师、五师在军参谋长冯治纲率领下，向东突围到富锦，在萝北南岗的一次伏击战中，一师师长马德山英勇牺牲。六军二师十团、三师九团大部牺牲或失散。北满抗联领导下九军的洪洼河、四道河子密营遭到彻底破坏，二师师长王振祥叛变。

十一军军长祁致中率十一军一部由富锦北上同江，向苏方求授。祁致中带着七军军长李学福的介绍信单独过江，越境后苏方将他关押起来，送到伯力，与1938年初越境的赵尚志、戴鸿滨关在一起。2月，十一军七星砬子兵工厂陷落，以共产党员胡志刚为首的50余名工人、战士全部壮烈殉国。同月，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金正国被叛徒杀害，所部失去领导。6月下旬，原十一军一旅政治部主任杨子歧于林口车站被捕叛变，十一军在各地的密营再也无密可保，全军处境岌岌可危。

赵尚志的离去，北满党内的激烈内争，北满各军失去了及时的战略上的引导，不得不各自为战，完全丧失了主动。直到这一年的6月，北满临时省委意识到形势严重，才在通河召开的第八次常委会上做出了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所属的三、六、九、十一军突破敌人对下江地区的包围，向黑嫩地区做大规模战略转移的决定，同时决定在“中央”没有给三军新配军长的情况下，李兆麟以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领导三军工作。

会后，李兆麟率北满抗联主力八百余名健儿，重新在黑嫩平原和大、小兴安岭地区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游击战争。

总司令重返战场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在中国东北大量增兵，斯大林断定日苏战争不可避免，苏联远东军急需要得到日军的各种情报，东北抗联部队恰恰可以帮助他们获得这些情报。1939年2月，苏联远东军情报部门代表王新林（化名），与监狱里的赵尚志举行“会晤”，表示过去发生的一切都是误会，苏方基于国际主义精神，答应赵尚志过江时提出

的要求，从各方面帮助东北抗联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同时要求抗联与之建立“情报共享”关系。

赵尚志思考了两天后，同意苏方的提议，唯一的要求是让他将所有越境后在押的东北抗联人员组织起来，编成一支队伍，由苏方提供服装和武器弹药，打回东北去。

赵尚志很快组织起了自己的队伍，这支百余人的小队伍里包括了北满方面历次入苏被扣押的人员，其中有六军军长戴鸿滨、十一军军长祁致中。赵尚志将这支队伍编成一个总队，两个中队，一个教导队，任命六军军长戴鸿滨为参谋长兼总队长，直接领导教导队；十一军军长祁致中为副官长兼一中队队长；刘凤阳为二中队队长。苏联人给这支队伍配发了全套日军军装及武器装备，以及一部用于与苏方联系、“分享情报”的电台。1939年6月末的一天夜里，这支队伍在黑龙江北岸一个叫拉宾的苏联村庄登上一艘旧式苏联客轮，一夜航行后顺利地将赵尚志和全体队员送上了自己的国土。

东方露出黎明的曙光。重新踏上祖国土地的赵尚志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赵尚志回国后的思想、情感、新的生命目标赖以建立的两个支点是：一，虽然坐了一年半的牢，他却终于获得了苏方的承认和支持，在三十年代末的东北党内，这是一个很重的砝码。二，一年多的铁窗生涯之后，他仍然坚信自己在北满党和军队内威望依旧，以为只要自己回到东北境内振臂一呼，北满党和军队就会重新回到他身边来。赵尚志不明白，第一，苏联人需要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想通过他要得到日军在东北的情报，一旦苏方发现他不能控制东北抗联部队，或者别人能

比他更好地实现苏方的初衷，黑龙江彼岸对他的承认和支持就将不复存在；第二，经过1938年3月开始的“反倾向”斗争，北满党和军队内部新的领导与权威中心已经形成，没有人再需要这位过去的领袖和英雄了。不仅如此，他的突然回归，还将使北满党和军队肌体上一道刚刚愈合的伤口重新开裂。

赵尚志回国后第一仗打了乌拉嘎金矿。6个顽抗的日本人被击毙，20余名伪军投降，伪警察大队长被俘，赵尚志令人打开了金矿仓库，看到里面堆着许多面粉，非常高兴。夜里，部队召开矿工大会，赵尚志亲自给大家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宣布政策。矿工们问这个人是谁？战士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赵尚志，抗联的赵总司令。会场上轰动起来，当时就有40多人要求参加“赵司令的队伍”。归国后打了第一仗，这支队伍就扩大到了150人。

第二天一大早，部队处决了人人痛恨的伪警察大队长，将伪警察们教育释放，带上缴获的战利品，向小兴安岭林区前进。行前，赵尚志要求每个人都背上两袋面粉，他自己

也不例外。但即使这样，仓库里的面粉也没能背完。矿工们不等动员，主动帮助这支“中国人的队伍”转运面粉。

但是，就在这天，有一个人公然违背了赵尚志的命令，没有背面粉，并在私下里向一些战士表示了对赵尚志的不满。此人就是抗联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

祁致中对赵尚志的不满由来已久。1936年，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被改编成了抗联第八军，李华堂的自卫军支队被改编为抗联第九军，祁致中所部却只被改编为抗联独立师。只是因为李兆麟出使吉东时对他做了大量工作，祁致中才没有下决心脱离北满抗联总司令部。

祁致中越境赴苏被关押中，听到李兆麟带十一军主力离开下江、西征黑嫩的消息。这位矿工出身的抗日英雄此时满心愤懑，对什么人都深怀猜疑。他不仅不可能再信任包括李兆麟在内的整个北满省委和北满抗联，自然也就不能再信任赵尚志。他和戴鸿滨都是北满抗联总司令部领导下的军长，获释归国时，赵尚志让戴当了自己的参谋长兼

这支队伍的总队长，却只让他当了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副官长兼一中队队长。祁致中本来就一直觉得赵尚志瞧他不起，这种安排再次让他怒火中烧。因此，过江之初，他心中就生出了与赵尚志分道扬镳的念头。

接着发生了两件事，却成了祁致中死亡的导火线。

一件事是：在攻打乌拉嘎金矿时，戴鸿滨率部队包围了西院伪军，祁致中还没带部队去攻打东院，结果造成东、西两院敌人对我军两面夹击。只是在赵尚志率司令部人员去攻打东院后，祁致中这才冲了上去。

第二件事上面已说过：离开乌拉嘎金矿时，全队包括赵尚志，都扛了一袋白面，唯独祁致中拒绝执行总司令的命令，坚决不扛。他说：过去我连枪也不背的，今天扛什么面粉。

祁致中也许根本没想到，他已经大大地“蔑视”了总司令的尊严和权威。赵尚志要重建自己的领导权威，要维护这支小队伍的团结和统一，要再次在整个东北打开局面，就



抗联第三军五师一团二、三连的战士在营地

不能姑息这种公开的冒犯和“分裂”。

于是，就在队伍继续向小兴安岭腹地进发之前，抗联第十一军军长、著名抗日英雄祁致中被枪杀，年方25岁。

枪杀祁致中是赵尚志一生中犯下的错误中最大的一个，他不仅使一位抗日英雄死于非命，还直接造成了这支队伍的瓦解和他自己的垮台，后一种结果是他是根本没想到的。

队伍继续前进。在小兴安岭青山里地区，他们遇上了一个日本武装测量队。经过短短几分钟交火，就结束了战斗，将一名日本测绘师俘虏，缴获了一批日军刚刚测绘的边境地图。接着，他们来到汤原境内的马把头“碓营”，赵尚志决定暂时停下来，以此为基地，分兵游击。

他派参谋长戴鸿滨率主力100余人西进，到原六军活动过的唐里川一带恢复旧游击区；派刘凤阳带四十余人东去绥滨开辟新区；自己带司令部十余人留在原地，派出交通员，以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主席和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通知”北满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李兆麟、冯仲云、金策等到他这里来开会，“研究在北满地区重整旗鼓、继续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等等大问题”。

赵尚志是要表明：他还是北满临时省委的执委会主席，东北抗联的总司令。如果你们来了，就是承认你们过去做的一切决议都是无效的。

但是，一天天过去了，不但接到他“通知”的人一个也没来，连他派出去的戴鸿滨和刘凤阳两支队伍也一去不返。

赵尚志没有意识到，他枪决祁致中的行为已在队伍里引起了巨大的心理震撼，这支队伍里指战员已经不再信任他了。

戴鸿滨率队离开了马把头“碓营”后，开始在汤旺河沟一带击溃了一支白俄铁路守备队。第二天夜晚，他们遭到了这支白俄部队的反击，队伍被打散。突围后戴鸿滨收拢部队，只剩下了十几个人。带着这样的“战绩”他是不敢回去见赵尚志的。在山里藏了几日，他干脆带着这最后十几个人，穿越小兴安岭，西去铁力，寻找北满省委。

刘凤阳带的另一支40人的队伍还在东去绥滨的路上就遭遇了一支日军“讨伐队”，全队被打散。刘凤阳带几个人边打边退，一直退到黑龙江边上粮弹全无，不敢再见总司令，只好再次退入苏境。

这年深秋，远在黑嫩地区的北满省委从戴鸿滨等人口中，听到了祁致中被杀的消息。正式做出决议：“永远开除赵尚志的党籍”。

关东司令部获悉了赵尚志重返北满的消息，立即高度紧张，命令黑龙江沿线日伪军警宪特全部进入“紧急治安肃正状态”。日伪三江、滨江、龙江三省特务机关还接到了特别通知，要他们派出所有特务，化妆成樵夫、猎人、皮货商，进入深山老林，寻找赵尚志。进入11月，天寒地冻，给养断绝，应该等到的消息一个也没到，该来的人一个也没来，赵尚志才意识到“事态严重”。他向苏方发电报，苏方告诉赵尚志：北满省委已于9月派冯仲云为代表赴苏，要求苏方协助“召开北满、吉东党的扩大会议，以便决定吉、北党的统一合并，二、三路军的合并和统一”。

赵尚志迅速发电报给苏方，要求过界与会。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归国时他所依赖的两个生命支点正在坍塌。无论是北满党还是抗联部队，都不欢迎也不再承认他们是他们的总司令了；只有参加这次会议，维持苏方的支持，他才能为自己争到回归北满的权利。

苏方同意了他的请求。12月中旬，赵尚志一行十余人穿越冰雪茫茫的小兴安岭，北上黑龙江。一天深夜，他们踏过黑龙江江面上的坚冰，再次回到关押过他的这座城市。

英雄末路

赵尚志一到伯力就发觉自己事实上已处于一种异常无力的位置。无论是国内的李兆麟，还是在伯力的周保中和冯仲云，都不认为他“没有错误”，他们在他们眼里已成为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会议还没开始，他就不再是昨天的总司令了”。

性如烈火、在党内斗争中几起几落、从来没有认过错的赵尚志会接受这一切吗？他接受了。赵尚志不仅接受了北满省委给予自己的处分，还亲笔写下了一份“情辞恳切”的检讨书。可以想象，他做出这种选择是不容易的，他所以“接受”处分，无非是想以此种方式重回北满。但北满方面没有给他这种机会。北满省委给周保中、冯仲云发来的电报称，他们不让赵尚志再回三军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面对打不开的僵局，周保中气忿之余，做出决断：请赵尚志到他领导下的二路军任副总指挥。

赵尚志的“问题”就这样被解决了。但赵尚志已经不是东北抗联的总司令了。

伯力会议在东北抗联历史上意义重大。多年来，抗联部队屡起屡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后方支持，现在这个后方出现了。会议的另一个成果是结束了北满与吉东的纷争，周保中成了被苏方承认的吉东、北满党和抗联部队的新的核心领导人。

但伯力会议对于赵尚志却有另一种意义：它使这位抗日英雄迅速地走向了末路。会前他对于未来领

导北满乃至东北抗联部队进行斗争的前景,仍然充满了信心;现在他不仅不再是东北抗联部队中人人敬仰的领袖和英雄,还成了一个因“犯有严重错误”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经过别人收留才暂时有了栖身的人。

伯力会议结束后的3月27日夜晩,赵尚志随同周保中,率领二路军总部警卫队,越过乌苏里江,28日晨到达虎林县小穆稜河二路军总部。其后,他在周保中领导下工作了半年多一点时间。10月末,周保中与赵尚志分开,赵自带二路军直属队往虎林活动,在日军追击下越境赴苏,进入苏联在伯力以北75公里处为抗联部队设立的北野营(相对于金日成等人入苏后进驻的海参崴以北26公里的南野营而言)。

血战梧桐河

1940年1月到1941年10月,赵尚志在北野营的一间斗室里孤独地度过一年又十个月。这段时间里,他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他不能就这样忍辱含垢地活下去,他为抗日而生,死也应当死在战场上。他要回东北去重新打开大好的抗日局面,或者英勇地战死。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悍然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日军继续向东北增兵,独处北野营的赵尚志想到了:一旦日军大举进攻苏联,东北就会兵力空虚,一个在敌后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的机会就要到来。

1941年10月的一天黎明,赵尚志带领一个五人小组,越过冰封的黑龙江,重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赵尚志不嫌人少。当初他拉出珠河游击队时,全队也只有七个人。

他们在萝北境内上岸,很快在松花江支流梧桐河地区的老白山上北坡,赵尚志遇上了第一架猎人的

木克楞(木屋)。

日本人没有忘记赵尚志。自上次他率队回国又神秘地“消失”,敌人始终没有放弃张开的“警戒之网”。仅仅在赵尚志到达的鹤立县,日伪特务机关关一年派往山林中潜伏的特务就达三百多名。

木克楞里住着青年猎人王永孝和一个名叫冯界德的“皮货商”。得知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赵尚志,两人眼睛一时都“亮”起来。王永孝当即决定参加赵尚志的队伍,一起抗日。冯界德却以家庭拖累推辞了。夜里,这个“皮货商人”悄悄地溜了。

日本特务冯界德下山之后,连滚带爬地跑到鹤立县兴山警察署,将发现赵尚志的消息报告给鹤立县警佐兼兴山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和特务部主任东城正雄。

1942年1月的一天,“收皮货”的“老客”刘德山在山里找到了赵尚志。刘德山要“跟着赵司令抗日”。

一个月后,田井久二郎和东城政雄又派了一个叫张青玉的特务进山,经刘德山介绍也“加入”了赵尚志的队伍。一天两个人一起向赵尚志献计:梧桐河金矿附近有个伪警察分署,快过年了,署里只剩下几个人,趁机打它一下,准能得手。

赵尚志确实需要武器扩大队伍。他决心冒险一次。

2月12日凌晨3时,刘德山、张青玉将赵尚志、姜立新、王永孝带到距离梧桐河伪警察署一公里左右的一个菜园子里。这时张青玉对赵尚志说,他要“先去看看情况”。赵尚志同意。张青玉一口气跑到伪警察署,向正在那里等候的东城正雄和日本警备队队长穴泽武夫报告说:“赵尚志来了!”两个日寇马上带一队日本警察赶来,要对菜园子实施包围。赵尚志在菜园子里久等张青玉不归,有些着急,要刘德山带路直奔伪警

察署。刘德山见赵尚志要走,慌乱起来,装作解手,蹲在路边,放赵尚志和王永孝走到自己前面,突然举枪射击。赵尚志正在前行,背后“砰、砰”两声枪响,第一枪从他左腹部打进,从右腹部打出;另一枪击中了王永孝。赵尚志已知受骗,身子摇晃了一下,回过头来,向刘德山骂了一句:“坏人!”忍着巨痛,掏出手枪,“叭、叭”两下,一枪击中刘德山胸部,一枪击中头部。这个认贼作父的日本特务,还没有拿到赏钱,便一命呜呼了。

日本人听见枪声,向菜园子蜂涌而来。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赵尚志咬牙将身上的文件包交给姜立新,让他快快逃走。之后便伏在地下,向敌人射击,直到昏死过去。

东城正雄和穴泽武夫用马爬犁将赵尚志和王永孝拉到梧桐河伪警察署。

伪鹤立县警务科长陈云峰、日本人科副春日兵吉当即对他进行突击审讯。

“你是抗联总司令赵尚志吗?”陈云峰问。

“你是一个中国人的败类,没有资格和我说话!”赵尚志痛斥这个汉奸。陈云峰被他骂得开口不得。东城正雄走过来,在他被击穿的腹部踏了一脚。

“你的,快快地说!”

赵尚志昏死过去又清醒过来,将无比轻蔑、憎恶的目光转向这个日寇。

八小时后,赵尚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停止呼吸,终年34岁。

日寇锯下了英雄的头颅,装进木匣,连夜送到伪三江省警务厅。很快,赵尚志的头颅被送进长春伪满军政部,与杨靖宇的头颅陈列在一起。

(责任编辑:刘家驹)

《文汇报》 的 苦斗岁月



● 杨培新

杨培新

1946年春天,我和钦本立从重庆飞往上海。是董必武要我们去筹备上海的《商务日报》。

我在重庆《商务日报》做记者时,就和范旭东、李烛尘、胡厥文、章乃器、卢作孚、王志莘等著名企业家、银行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再次成为经济中心。我们认为在上海再建一个《商务日报》,还是像在重庆那样,拿工商界的钱,教育工商界,鼓舞工商界起来斗争。这个设想经过鲁明同志向周恩来、董必武汇报后,取得批准。周恩来并批准由广大华行卢绪章出面投资五百万法币,作为创办经费。当时国民党不给《新华日报》发在上海出版的登记证,党希望《商务日报》早日在上海出版。党还指定宦乡也帮助筹备,还让我们找民盟的吴晗、第三党的章伯钧,民革的李世璋、李维城(聚兴成银行总经理)共同支持这张报纸。

抗战期间宦乡在第三战区主持《前线日报》,编得很出色。他是顾祝同的外事秘书,利用他的地位,曾保

释过皖南事变后被捕关在上饶集中营的同志。他是贵州人,蒙古族出身,身材魁伟。他当时已经参加上海《文汇报》工作,担任主笔。在解放战争期间,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吸收入党。他在旧社会已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却毅然投身革命。周恩来同志称赞,说他这支笔顶得上新四军一个纵队。当时宦乡住在虹口,我和钦本立、徐逸安住在吴淞路,每隔几天就去看望他。我们赤诚相见,经常分析时局,商量《商务日报》的筹备事宜。当时我手持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八行书,见过上海市长吴国桢、社会局长吴开先、内政部长张厉生,他们很快为上海《商务日报》发给登记证。敌伪产业管理局长刘攻芸拨给瑞丰里宿舍五栋、吴淞路、汉口路门市部各一栋。党已准备将上海《新华日报》的卷筒机转移给《商务日报》。企业界、银行界,我们已以取得王志莘、周耀平、金名钰等的支持。1947年春,在筹备工作即将完成之际,全面内战爆发了,形势急剧恶化。这时《商务

日报》即使出版也会被封,党决定我们停止筹备工作,参加上海仅存的几家进步报刊,并让我进《文汇报》。当时宦乡很希望我参加《文汇报》,因为《文汇报》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文教界,党要通过《文汇报》争取中间阶层,特别是工商界。他要我直接去看徐铸成。

徐铸成是新闻界的奇才,他在敌伪统治上海时期,坚持抗战立场,不怕敌伪暗杀和恐吓。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敢于坚持真理,不趋炎附势,是一个有正义感、不畏强暴、不接受国民党威胁利诱的有骨气的人。我和他以前没有见过面,我写信给他,他立即约我见面,并邀请我主编经济新闻,钦本立当经济新闻记者。实际上他在大后方时,已密切注视重庆《商务日报》,了解我们的情况。他很知道经济新闻对工商界的影响,希望通过我争取工商界支持《文汇报》。我去以后,经济新闻由我主编,并主持工商界座谈会,及时为编者的话写经济方面的画龙点睛的评论。当时我还应姜春芳之邀,用杨

深的笔名为苏商《时代日报》写“半周经济述评”，和“秦上校”写的“半周军事述评”轮流刊出。经陈虞荪介绍，每天下午为《新民晚报》编《生意经》专栏。夜晚则到《文汇报》编经济新闻。我七点多钟就到编辑部，看稿件，打标点，写标题，交给排字房排出小样。大体上一天看稿一万三四千字。由于时间紧迫，笔不离手，紧张、快速的边看边标点。到十二点钟才看排出的小样，到深夜一两点钟才定稿下班。深夜回到家后还睡不着。

当时多种进步报刊几乎全部被封，只剩下《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晚报》和《时代日报》坚守阵地。《文汇报》在工人、学生和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由于物价飞涨，工人、学生吃不饱饭，“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口号响彻全国，工潮、学潮来势汹涌。国民党对罢工的工厂、罢课的学校，实行包围和封锁，禁止外界慰问和支持，但无法不让《文汇报》记者进入。当时孟秋江是共产党员，受党的委托，派记者进入学校和工厂，传达党的指示，交流各方讯息，并将他们的宣言和呼吁记录下来，于次日《文汇报》刊出，这就使全国各地学潮、工潮连绵不断，像钱塘江的海潮一浪高过一浪。这种作法巧妙机智，突破了国民党军警的包围和封锁。我主编的《经济版》，则主要刊出国民党统治地区四大家族运用通货膨胀，掠夺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工商界的新闻，让人们心中的怒火迸发出来，使之熊熊燃烧。当时《文汇报》无形中成为党领导和指挥群众运动的一支号角，使上海、青岛、广州、北平、天津等地的群众运动相互配合，此响彼应。

1947年春天，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工潮、学潮如火如荼。国民党认为《文汇报》是罪魁祸首。复旦大学发

生学潮，吴国桢市长亲自出动劝阻，并当《文汇报》记者麦少楣的面，骂《文汇报》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当场发生顶撞，国民党造谣说群众殴打了吴市长。当天晚上，麦少楣回到报馆，气愤填膺地描述当时的情况。徐铸成、宦乡认为《文汇报》已届生死关头，是战是降，请大家讨论。如果要委屈求全，苟且偷生，就要按国民党定的口径，报导复旦学潮。如果如实报导，国民党就会乘机封闭《文汇报》。麦少楣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姑娘，她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有一股慷慨赴义的献身精神，当时编辑部沸腾起来了，频频向徐铸成、陈虞荪、宦乡提出意见。宦乡认为，不必抱有幻想，国民党不可能放过《文汇报》，准备它封报馆、抓记者。徐铸成默默思考，心情沉重，他知道抗战期间，日本人在公共租界封闭《文汇报》的故事即将重演，他最后说照大家的意见办，准备关门。决心已下，大家如释重负，安然编出最后一张《文汇报》，互道珍重，离开报馆。次日凌晨，国民党政府警备司令部贴出封闭《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晚报》布告，《文汇报》编辑部还贴上了封条。当天晚上逮捕了麦少楣。鉴于特务总在深夜抓人，互相叮嘱不要在自己家里过夜。我到《伤兵之友》社王水家过夜。这时接到孟秋江的来信，他说，我就在你家附近转游，但不好进去看你，希望你珍摄。到了生死关头，同志之间的情谊越发深厚。由于他是国民党追捕的主要目标，必须转移，不久之后就去了香港。宦乡由于第三战区许多熟人在上海，国民党不好动手，我们仍然经常去看他。

一天深夜，《文萃》的陈子涛来到我家。《文萃》是党办的刊物，由黎澍、孟秋江、陈子涛主编，经常要我写稿。这个刊物在学生、工人中销路

很大，因为它通俗、易懂、信息量大。国民党政府首先把《文萃》封掉，黎澍、孟秋江去了香港，由陈子涛留下来负责。那天晚上，他说：上海没有报刊，仅剩苏商的《时代日报》，而报刊中最受欢迎的是《文萃》，他准备搞《文萃》地下版。他希望我们帮助弄一笔钱，并撰写稿件。我认为这件事风险极大，他说党已经同意他搞地下《文萃》，他本人愿意豁出性命干。我们认为，既然党已经批准这件事，当然应给支持。徐逸安认识一个商人老马，（他实际上是党派出来经商的），就出钱顶下《文萃》在北四川路的一栋房子。这就有了印刷费。陈子涛用丛刊方式出刊，用32开本以利于工人装进衣袋，书名每次更换，用过《论纸老虎》《毛泽东对史特朗谈话》《新傀儡戏》《讽刺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书名，但封底印有一个士兵扛着一杆枪，这就是《文萃》的标记。读者一看标志，就抢着购买。我每期写一篇文章，其中一篇是《美金公债不是生意经》，劝上海人不要买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美金公债。陈子涛已没有编辑部，夜间把校样带来，在我房中校对，天亮就走。地下《文萃》出版后，受到职工、学生的热烈欢迎。在外摊报刊批发地点，《文萃》一到，报贩就一抢而光，然后带回去零售。几十分钟时间就发行完毕。特务多次扑击，都晚了一步。《文萃》依靠收回的书款，再印下一期。但是一天晚上，一位姑娘匆匆赶来，告诉我陈子涛已经被捕，身上带有你写的稿件，你要立即转移。原来国民党竭力追捕陈子涛，但是总抓不着。后来，找到他雇佣过的保姆，从她家里抄出一张当年郊游拍摄的照片，从中认出陈子涛，然后把照片放大，发给许多特务。陈子涛那天上印刷厂，没有料到那个厂已被破获，他一进去，就被逮捕。陈子涛说自己是送信的工人，特务看他相貌平凡，有点相

信。但一对照片，发现这就是他们追捕的陈子涛，把他逮到阿尔培路中统看守所。当时麦少楣也被逮捕到该处，曾看到陈子涛。据说，陈子涛上老虎凳，腿关节被折断，但他只言不发，身上那些稿子他已经咽下肚子。要他供出上级领导名字和刊物文章作者名单，他默默无言。那些特务也佩服这个硬汉子。陈子涛曾对我说过，麦少楣这种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善良的女孩子，在时代的洪流中，也成长为坚强的战士。麦少楣在狱中看到陈子涛的表现。十分感动。麦少楣出狱后，她的爱人李肇基请我们到他家吃饭，她以虔诚心情，描述陈子涛的事迹。我到香港后，听说他被押送南京，国民党用绞刑把他处死了。

1948年夏天，徐铸成找我谈话。他说：潘汉年是他的亲戚，最近向他建议《文汇报》上海被封以后，已无复刊可能，不如到香港创办《文汇报》。香港《文汇报》还可运往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向文教界传递信息。他准备邀马季良和我一起去香港创办《文汇报》。我建议找宦乡同去。他说：宦乡另有任务。我问宦乡，他告诉我，章汉夫、乔冠华已去香港，他留在上海，和外国记者联系。我们商定，钦本立留在上海，担任上海特派员，浦熙修担任南京特派员，潘静远为平津特派员。我秘密离开上海，当时《新民晚报》的张之江、吴中送我上船。

到香港以后，我们住在荷里活道，立即着手筹备。徐铸成任总主笔，并担任督印人，马季良任总编辑，金慎夫任编辑部主任，孟秋江任采访部主任。要我主持经理部并继续主编经济新闻。当时徐铸成、马季良经常去找李济琛（民革负责人）请他们筹措创办经费，并找陈济棠的儿子，租下荷里活道房子和印刷机。丁君匋也曾来帮助安排印刷厂。

香港当时人才济济，有从上海撤退下来的乔冠华、许涤新、龚澎，有华南的方方、连贯、饶彰凤，还有金仲华、刘思慕、张铁生、千家驹、杜国痒。当时出版的《华商日报》每日一大张，主要读者对象是工人和学生。新闻中直指“蒋匪”，态度鲜明。

《文汇报》八月出版，当时正碰上淮海战役和八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改发金元券。这两件事，震动了香港中层人士。《文汇报》称国民党军队为国军，称解放军为共军，既登中央社、外电的报导，又登新华社电讯，转弯抹角透露出国民党军队节节失利的新闻。徐铸成的编者的话，画龙点睛，指点迷津。马季良任总编辑，金慎夫任编辑主任，黄立文、杨卓之等编报，他们巧妙地透露战局的真实变化，吸引了广大读者。要知战局变化，必须看《文汇报》。国民党发行金元券，各报纷纷捧场。但是《文汇报》依靠上海特派员钦本立、南京特派员浦熙修，拿到国民党中央银行的金银外汇储备统计，说明国民党在唱空城计，自身并没有黄金外汇储备，就发金元券，还强迫工商界缴出外汇、黄金、白银。由于战费支出极大，金元券越发越多，我们计算，国民党的空城计只能唱一个月、最多唱两个月。我们报导的全是铁的事实和确凿的统计，工商界做生意必然碰到金元券，不能不考虑《文汇报》的报导。但不到一个月，“限价”就崩溃，出现了抢购风，整个市场陷于停顿。事实证明，《文汇报》的报导是真实的、可靠的，这就获得工商界的信任。香港报纸的批发市场在利源东街，每天《文汇报》的销路都在增长，而为金元券帮腔的报纸销路下跌。几乎是《文汇报》增加一份，他们就跌一份，在中间阶层中展开销路争夺战。这样，《文汇报》就站住了。《文汇报》经费依然困难，天天为筹集印报的白纸发愁。但是由

于《文汇报》声誉日隆，愿意帮助的人越来越多。徐铸成希望我当经理，而且说这是报纸生存的关键。我勉为其难。当时资金主要同民主党派筹措，但香港的银行家郑铁如、庄世平，企业家章乃器、王宽诚、黄长水、庄希泉也给了很大的支持。

《文汇报》在香港的影响，对《大公报》的进步起了推动作用。王芸生等最终走上和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当时，香港新闻界的头头每周末在一起吃饭，有新华社的乔冠华，国新社的金仲华、《华商报》的夏衍、刘思慕，《文汇报》的徐铸成和我，《大公报》的王芸生等参加。这种聚会协调各报刊的步骤起了一定的作用。

南京、上海解放以后，党的领导人、民主人士和新闻界人士纷纷北上。《文汇报》宴请马寅初、陈叔通等过港赴北方的人士。不久，徐铸成说，他应邀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走后由我担任督印人，代理他的权力。我先后欢迎金仲华、刘思慕、孙思毅、莫乃群担任总主笔，欢迎张堪琴来任总经理，张演任副经理。刘思慕任总主笔时，对英国紫石英号逃离南京发表社论加以谴责。香港政府卫生署忽然派人来查报馆厕所，指出人多厕所少，违反卫生条例，向法院提出控诉。采访部唐海告知需要和香港政治部谈话，我们约他们饮茶。席间政治部人员委婉地暗示，希望少和英国人正面相撞。法院通知我出庭，那天我作为法人代表，排队入庭。我入庭后，被判罚款10港元，如果没有钱就入狱。我当即交了10港元。英国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叶，在香港颁布的法律多得不可胜计。平常并不严格执行，但一旦在政治上抓你把柄就援引这些条例惩罚一通，给你点颜色看。不久，我回到北京。

（责任编辑：仲文）

周恩来与国民党 杀手张冲

●仲向平

眼前的这幅照片，虽然经历了58个春秋，图中人物却依然清晰可辨，表情凝重、目光深邃的左立者是大家熟悉的周恩来，面带微笑、踌躇满志的右立者为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

当我们在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帮助下，从尘封已久的国家文物档案中，寻觅到这张编号101的珍贵照片时，不禁对照片本身及它所蕴含的丰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便由此引发……

炮制“启事”

1932年2月中旬，在一个神秘人物的主谋下，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等相继刊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在白区工作时的化名）。其时，周恩来早于1931年底秘密从上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已近二月。“启事”诬蔑攻击中共和苏联政府，进而诬陷“伍豪”其人，欲借此蛊惑人心，制造混乱。这位神秘的幕后策划者就是张冲（淮南）。张冲生于浙江乐清县，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

张冲为何造这个谣呢？原来，

1931年4月下旬，一件对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的事件突然发生了。中共中央特科（情报保卫机关）负责人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后，在汉口被捕叛变。主持此次行动的正是张冲派出的调查科武汉特派员蔡孟坚。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解送南京后，供出了上海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行踪机密，其中包括周恩来经常去的地方。张冲当即率领人马由南京赶赴上海进行搜捕。当此紧要关头，幸亏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时任中统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机智地截获了这一绝密情报，抢先一步通知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中央。

周恩来接此情况后，立即与陈云商定对策，并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神速、果断、周密地处置了一切，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破坏。张冲虽有顾顺章的指引却处处扑空，所获无几。事后他叹惜道：“如果没有钱壮飞，定能一网打尽，周恩来也难幸免。”

就在伪造启事抛出后不久，我党在陈云等组织下，当即采取措施进行反击，在上海散发了《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并利用与《申报》的关系，用曲折的笔法在同月的《申报》上登出辟谣启事。与此同时，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也以中华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宣告：“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至于几十年后的“文革”期间，江青一伙又翻出这个“启事”，以同样拙劣的手法诬陷周恩来则恐怕是九泉之下的张冲也始料未及的。

穿针引线

几番较量，几度春秋，转眼间到了1936年春天。上海《申报》忽又刊出一则寻找“伍豪”的启事，要求被寻者见报后务必于5月5日去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某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这则“寻人启事”仍然出自张冲之手，但却不是故伎重演，而是出于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计，与当年的“伍豪启事”不可同日而语了。

张冲为何放出这只“试探气球”？

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为团结抗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停止

内战，反蒋抗日，首次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当晚，张冲属下的“中统”南京香铺营电台收听到了这一宣言，张冲随即将电文抄送蒋介石和其他要员。张冲在调查科任上，确曾竭尽全力，出谋划策，大搞特务活动，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情报资料和共产党人，事实使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并非是“杀人放火”的“洪水猛兽”。特别是《八一宣言》对他触动很大，他对蒋介石“攘外须先安内”的政策产生了怀疑。他曾对部下说：“当前日寇侵略日亟，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

《申报》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员昼夜守候在这家酒店的房间里。

鉴于几年前的教训，我党经慎重考察，几经曲折，终于由潘汉年出面与张冲联系上了。潘汉年代表中共和共产国际与张冲、陈立夫等先后在上海、香港、南京等地经过多次接触，商谈了有关国共合作的问题，取得了一定的谅解。随后，潘汉年于1936年8月8日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会晤的有关情况。3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建议将我党“抗日反蒋”的总方针及时改为“逼蒋抗日”。

也许是历史的必然，就在国共代表初步往来以及中共调整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之际，1936年12月12日，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临驾以备咨询的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亦被扣押，失去了自由，国共双方亦一时失去了联络。不久，事变在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的斡旋下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有了新的转机。

在西安，蒋介石亲口向周恩来许下了联共抗日的诺言，并以“领袖人格”相担保。但他又要避日本人和“亲日派”的耳目，国共间的往来还

是采取秘密方式。此时的张冲则日益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脱离了“调查统计”工作，这位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委穿针引线，成为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同延安及莫斯科秘密联络的专使了。

西安相识

本来，蒋介石已在西安向周恩来作了承诺：你可以直接到南京找我谈。但在张学良送蒋被扣以后，蒋介石的诺言已使人感到怀疑。于是，1937年1月5日和6日，毛泽东连电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即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

这样，1937年2月初，潘汉年将重返西安的张冲介绍给周恩来等中共代表。2月9日，国共在西安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贺衷寒等。会谈历时一月，其间，张冲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频繁接触。这时，国民党内有人放出口风：“淮南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如果做得不好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张冲闻知后坦然处之。他说：“调查科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



张冲

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

西安会谈最初较为顺利，达成了一些协议，但国民党方面出尔反尔，很快又推翻了协议。以至连代表之一的张冲也十分反感。一天晚上，他私下跑到中共代表住处对周恩来说：“此等反复，太不够格”，“但实权不在我手，无能为力”。他还告诉周恩来：“顾祝同规定你们一个师为一万人，其底牌实为一万二千人，你们还可力争超过此数。”张冲又向周恩来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当即电告中央请示。这年4月中旬，蒋经国从莫斯科抵达上海，毛泽东、周恩来派李克农在上海会同张冲见了蒋经国，希望蒋经国以民主思想影响蒋介石。

西安会谈最终虽因顽固派的阻梗而未取得理想结果，但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

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总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张冲将军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来谈判的结果，在四、五、六月里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经济封锁取消了，红军和外界建立了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双方悄悄地恢复了交通联系。在边界上，红星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象征性地交叉挂地一起。”

而作为国民党代表的张冲，虽然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和周恩来周旋，但他内心深处却十分敬佩周恩来不计前嫌的宽大胸襟、坦荡人格和外交风度。西安一月，这两位江浙同乡朝夕相处，谈笑风生，完全看不出是曾经有过生死博杀的对手，并由此结下了超越党派利益的私人情谊。正如周恩来后来所回顾的那样：“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

西湖相知

由于西安会谈收获不大，许多问题需要同蒋介石直接谈判才能解决，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提出直接与蒋介石面谈。蒋便电约：“恩来兄22日至25日到沪再约地相晤”，随后决定在杭州会晤。

3月22日，周恩来与张冲同机由西安飞往上海。在上海，周恩来先同宋美龄会晤，将根据中共15项谈判条件拟成的书面意见交给宋美龄，请她转交蒋介石。宋美龄表示，她个人认为中共是可以合法存在的。但宋美龄毕竟不是蒋介石。

周恩来由潘汉年、张冲陪同在上海秘密活动数日，会见了蒋夫人，宋子文等人后，一行人忽又悄然消失了……

烟村三月，江南早已是春乱人间的花季了，西湖更以她“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的妩媚姿色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此刻，位于湖滨的“澄庐”也迎来了它的主人——蒋介石夫妇。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因腰伤先往奉化溪口，再赴杭州西湖休养疗伤。每当人生得意或失意之时，这两处“风水宝地”便是他韬晦养心的避风港和栖息处。不过此次来西湖，就更多了一层神秘色彩。

此刻，蒋介石望着夫人转来的中共文件，听了夫人的看法，不置可否，惹得宋美龄不悦而去。他心中的如意算盘，从来是不允许他人拨弄的，尽管西安事变宋美龄在他心中的地位和份量大大地提高了。蒋介石沉吟良久，陷入了矛盾彷徨之中……

谈判终于开始了，地点选择在“一角夕阳藏古洞，四周风翠遥接村”的西湖烟霞洞。

寒暄过后，对阵而坐，周恩来和蒋介石身旁各有一个干练的助手；潘汉年和张冲。周恩来单刀直入，表示了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但强调中共拥蒋的立场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决不能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投降”、“收编”。蒋介石也开门见山，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但“彼此都要有勇气去检讨过去。”周恩来紧扣主题，又一次重申了中共主张，要求蒋石给予明确答复。蒋介石则认为：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至于合作，你们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而是与我合作。周恩来清楚蒋的真实意图在于“领袖问题”，所谓合作也是有条件的。但眼下最要紧的是共同创造一个全民抗战的局面。所以周恩来提出：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的最好办法。蒋介石思考良久后表示，由周

恩来先起草这个纲领。他说：即使办法尚未肯定，他也决不再打红军。

西湖会谈，双方几次交锋，几易场地，几经曲折，终于取得较为理想的结果。蒋介石对中共有了新认识，表现了向前看的积极态度。张冲更是鞍前马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周恩来为表达对张冲的真诚谢意，特请潘汉年为他们合影留念。

“咔嚓”一声，历史在这一瞬间定格。

折冲尊组

此后，国共代表又二上庐山，终至南京。双方自1937年2月到1937年9月，共举行了5次正式谈判，历时7个月，终于扫除了重重障碍，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作为自始至终全过程参加这场历史性谈判的周恩来和张冲（他们进行过几十次会晤磋商和正式谈判），张冲充分展现了杰出才能和热心投入。对此，贺耀组（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评价说：“他张冲洞然于民族的危机，抗战的需要应取得之途径。在辅助总裁从事内部团结工作，在南京、陕北间曾多次作善意的努力。”后来，周恩来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中这样回顾道：“我识淮南先生在西安事变之后，但淮南先生奔走两党团结却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临潼变化，淮南先生亦被羁留近两个月，我于事后知之，以不及谋面为憾。事平，先生复入陕，遂得相见。为商两党团结事，几朝夕往返，达三四月。彼时，甚至以后，参与其事者固不仅先生一人，唯先生为能始终其事。”

在这段谈判期间，有一件事对张冲的思想影响很大。那是1937年5月下旬，由张冲出面与中共牵线搭桥而组成的国民党考察团访问延

安。张冲随团参观考察了延安的机关、学校、工厂。毛泽东也在一周之内四次会见考察团成员，阐述中共的方针政策。延安军民在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下所表现出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满腔热忱的敬业态度，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都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使得久居都市、沉浮宦海的张冲为之耳目一新。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与他的几次单独长谈，气氛友好，关系融洽。中共领袖情真意切，光明磊落，使张冲深受教益，切身体验到中国共产党为国为民的殷殷诚意；而周恩来豁达大度，不咎既往，不记个人怨仇的博大胸怀，更令张冲感动和惭愧。事后，他悄悄告诉好友：“中国不会亡，民族大有希望，人民大希望，这是我去陕北后亲自领略到的。”

张冲此次延安之行，还与中共建立了秘密的电台联系。此前西湖会谈时，蒋介石就嘱咐张冲尽快编制出一部密码交周恩来亲自带回延安，以供两党联络、建立“热线”之需。

张冲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后，亲自布置“中统”香铺营电台与延安定时联络，沟通信息。凡有陕北来电，张冲必守着译电员译好，随即拿去面交蒋介石。蒋介石有什么答复，口授要点后，他当即拟成电文，待蒋点头认可，立刻赶到香铺营电台，守着译电员译码，等到报务员发完后才放心离开。

风雨同舟

张冲最初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创建的“中统”干将，后来成为陈立夫办理对苏外交和与中共谈判的代表，最后直接受蒋介石指挥，成为国共间联系的“桥梁”。

在张冲与周恩来频繁接触的5



1937年3月，国共西湖会议时，周恩来与张冲合影

年间，虽然各自代表所属党的立场和观点，但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言：“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然自相识之日始，直到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坚持国策，至死不移。淮南先生诚五年如一日。”“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张冲也十分钦佩仅长他几岁的周恩来的为人和才干，他常说：“周恩来先生是当代杰出的政治家。如果共产党取得政权，担任外交部长的一定是周恩来先生。”

张冲性情随和，为人豁达，聪慧敏锐，能言善辩，他“为国民党的青年中委，但从未以此骄人，且曾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亦从未染近日‘调查统计’工作的习气，在平时接人待物，尤极谦和，而青年英俊之气，亦未稍衰”（周恩来语）。加之他学贯中西，见多识广，思想较为开明，故而容易接受新事物，听得进不同意见。周恩来对他“这种动定咸宜的守身立世之道”极表赞赏。

精通俄文、熟识苏联的张冲1932年起就参与了对苏外交；1936年他与冯玉祥、孙科、陈立夫、邵力子等人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1937年11月，他出访苏联，奉命直接与斯大林会谈。深居简出的斯大林单独约见他达几小时之久，可见其重视之程度；回国后，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军委会顾问处中中将处长，专司对苏事务……成为国民党内主张

力维大局

联苏的中坚分子。张冲内引外联，广揽人才，积极开拓，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深得苏联专家青睐，为争取苏联援助做出了贡献。因而周恩来谓其“在国内，国内合作成，出国，国际强援树，去国事顿，回国势转，先生虽非决最后大计者，然其任事之勇，奔走之劳，已匪异人任了。”为此，苏联总顾问还曾带给他一件斯大林亲赠的高级西装大衣，以示问候。

与此同时，张冲仍尽心竭力地从事国共的联络工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置顽固派的攻击陷害于不顾，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以帮助。在重庆，凡周恩来对蒋介石提出要求和见蒋，或蒋要见周，都由张冲代为转达和安排，并居中周旋。在顾问处常可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而张冲通常是这样开头的：“喂，我是淮南，你是恩来吗？”关系融洽由此可见一斑。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的住所处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张冲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证周恩来顺利地进出，开展工作。一次重庆都邮街发生了所谓的“民众”捣毁苏联驻华使馆的不幸事件，张冲即于大风大雨中陪伴周恩来在现场勘查，以保护中共代表的安全。周恩来之所以能在1939年春到安徽、浙江等地视察慰问新四军、回乡探亲等，同年夏天又顺利返回延安议事，都是与张冲的大力协助分不开的。

是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已同意周恩来北返延安，但当周恩来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借故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双方争执之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张冲眼见情况有异，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组，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到蒋介石手令后，又亲自送往机场，直至周恩来上飞机才放心。事后，张冲愤愤地说：“这是顽固分子在蓄意制造国共分裂！”

张冲为人从政，都富有正气。如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屡遭特务破坏干扰，周恩来开始向张冲提出这个问题时，张冲不以为然，认为是夸大了事实。周恩来就陪他去现场。在亲眼目睹了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的情景后，张冲也感到气愤，随即采取了制止措施。1941年1月初，国民党悍然发动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举世为之震惊。张冲闻讯，痛心疾首地对部下说：“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他看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关于事变的报道，对其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一派胡言非常不满，当众将报纸摔在地上，来回踱步，许久不发一言，气得饭也不吃。此时，国民党的政治压迫愈演愈烈。1月18日，《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涂国林被特务拘捕，周恩来当即通过张冲迫使当局将人放回。2月中旬的一天，《新华日报》发行部又遭破坏，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赴现场，于寒冷的黑夜里，在曾家岩宪兵队门前盘桓交涉达两小时。最终迫使宪兵队退还被扣压的报纸，周恩来随即将报纸亲自分发给围观的群众。当夜，我党干部陈家康（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送张冲上车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日之事作何想法。陈家康说：“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张冲听后喟然长叹：“我死必在君先！”

张冲出此悲言，不是没有道理的。从远处看，国共合作“五年来国内外风波频起，甚且浸及先生。但淮南先生辄处之泰然，绝未以一时‘行情’动其心态，变其神态。且困难愈甚，而先生之努力亦愈多，奔走亦愈勤”（周恩来语）；由眼前说，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裂痕进一步加深。

“一月事起，二月报事随之，三月为参政会期，四、五月有中条山战役，此中风浪之险，环境之恶，为五年来所创见。先生劳神焦思力维大局，备极憔悴”（周恩来语）。张冲力促国共合作的如此作为，自然深遭顽固派之忌恨，意欲除之而后快。在国民党内的一个高干会议上，当张冲谈到国共应继续合作时，与会的一个死硬派反共人物竟破口大骂，还猛然将茶杯掷向张冲。张冲遭此侮辱，颇为灰心，加之对时局的担忧，自感回天无力，心情沉重，甚至准备必要时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心态。他对周恩来说：“一朝之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

这一时期，张冲处境艰难。他既不满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想极力弥合两党裂痕；却又必须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中共代表周旋。己所不欲者而为之，矛盾而又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他在蒋介石和中共代表间频频穿梭往来，以期双方都能作些让步。一次，为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一事，张冲又与周恩来连续谈了三个小时。他苦苦劝说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甚至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请求也可以。周恩来马上劝道：“这不是个人问题，政治压迫，军事进攻，人身伤害，我们确实无步可让。经过中共的坚决斗争和国际舆论的影响，蒋介石才软了下来，又是召见周恩来，又是由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等，国共关系才趋向一定的缓和。

然而，尽管蒋介石对张冲“慰勉有加”，尽管他仍置顽固派的攻击陷害于不顾，为国共合作奔走呼号，但他已预感到国共关系将跌入低谷，自己也可能遭受顽固派的毒手，心情至为沉痛。并立下遗嘱交代家属：“我一旦身遭不测，你必须把保险箱里我和周恩来先生历年往来的信件

全部烧毁，不留一书半纸。”迫于形势，张冲去世后，大量珍贵的信件被毁，殊为可惜！

鞠躬尽瘁

张冲虽未遭顽固派的毒手，却不幸于1941年6月染上恶性疟疾。他起初没有介意，仍力疾从公，为国共合作奔走操劳。周恩来多次前去探视，在病榻前问长问短，关切备至。张冲于病榻还不忘国共团结，询问两党关系近况。后来，他自知不起，还嘱周恩来与自己的后继者保持联系，免使国共关系冷淡。当时，正值日机轰炸重庆，加之气候炎热，医护不周，政敌刁难，8月1日，张冲在重庆郊外的山洞病逝，年仅38岁。

斯人既逝，国共两党都为之痛惜。中共中央决定为张冲追悼会捐送3万元，并委托周恩来、董必武拟送挽联。11月9日，张冲追悼会在重庆夫子池大礼堂举行。会场内外挽幛高悬，哀乐低徊，冠盖云集，备极哀荣。张冲追悼会及生平事略均分别由贺耀组主持和撰写（贺耀组、倪斐君夫妇被称为“国共夫妻”，张冲与他们是挚交）。蒋介石也亲临祭奠，并撰哀辞：“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联名致送的挽联是：“大才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与张冲从对手到密友的周恩来，在时局艰难险恶的情势下，对张冲的过去尤感哀痛：“先生既逝，联络乃似中断。嗣每遇风波，辄增先生不在之思，而每念先生，更兴安危谁共之感。”为此，他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短联当哭，既表哀思，更忧时局。不仅如此，



1940年，周恩来、邓颖超回延安，张冲到机场送别

周恩来还与董必武、邓颖超等参加了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表了历时20分钟的演讲。他讲到后来，感情激动，语不成声，闻者无不动容。事后，特务头目徐恩曾感叹道：“周恩来真厉害，做宣传工作竟然做到我们家里来了。”与此同时，周恩来又指导当日的《新华日报》刊出悼念张冲的专页，并撰写了纪念专文《悼张冲淮南先生》，作为《新华日报》代论，肯定张冲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劳神焦思”，“奔走坛坫”，称颂他“独持正义”，“力维大局”；抗日还在坚持，团结更须加紧……前线的血还在流，怎能分得出属于何党何派？碧血丹心，精忠报国，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而淮南先生正是其中杰出的一个。”代表中共和人民表达了对一位爱国志士的高度评价。

解放后，周恩来仍未忘记张冲这位“安危与共，风雨同舟”的朋友。1949年开国大典时，他巧遇张冲的同乡、著名医学专家洪式闾教授，还特意提起张冲，说张冲是他的好朋友。周恩来对张冲所遗子女也格外关照，长子张炎遵照周恩来的嘱咐进了华东军政大学读书，女儿张雪梅则早年就在家乡参加了革命，与其夫邱清华解放后都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

周恩来与张冲这两位有特殊领域展开特殊斗争并结成特殊关系的爱国者，为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民族的存亡作出特殊的贡献，历史已有定论，人民不会忘记，往事没有如烟。他们交往的历史仿佛已昭示人们：祖国的统一大业终将要实现！

（责任编辑：刘家驹）

红军总供给部长杨至成在乌兰巴托讨饭记

● 奚孝鹏

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总供给部长杨至成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到1938年初，病得连床都爬不起来了。有一次，毛主席找他去谈工作，从驻地八一礼堂到凤凰山麓，路不算太远，他走不动，只好叫人抬着担架送他去。

周恩来副主席找他谈话：“至成同志，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到国外去看看病，把身体养好，再学习些新东西，开阔一下眼界，提高提高，以便将来挑更繁重的担子嘛！”

这样，杨至成只好告别首长，告别战友、告别妻儿。与刘亚楼、李天佑、钟赤兵、谭家述等，踏上了赴苏的道路。

苏联方面对他们很关心，每周专门安排他们去克里姆林医院看一次病。克里姆林医院是莫斯科的高级医院，设备和技术力量都是一流的，杨至成的病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也基本得到控制。

1939年春，他被安排在优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军事。

杨至成在军事班学习的内容有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有进攻战、防御战作战指挥的原则与艺术；有诸兵种、大兵团联合作战的组织与指挥；有战争的后勤勤务学等等，光笔记本就记了几十本。

1939年冬，周恩来副主席右臂被惊马摔伤，来莫斯科治伤，特地看望杨至成，检查了他的学习情况后夸他学得认真，成绩不错，鼓励他继续努力，取得养病、学习双丰收。

在异国他乡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杨至成心情很激动，他暗暗下决心：争取早点学成，投入反法西斯的战斗。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发动了向苏联的进犯。不到三个月，战火便烧到了莫斯科城外，在优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中国同志，只好宣告结业。

9月，在苏联人民组织莫斯科保卫战的前夕，共产国际把中国同志集中在莫斯科，着手组织他们返回祖国的事宜。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匆匆来见了大家一面，然后指派苏联的哈尔诺夫少校护送，杨至成等十几个人在林彪的带领下，从莫斯科坐火车、倒汽车一路向东奔驰，于1941年10月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他们准备从这里通过边界，到达内蒙的大青山，然后转回延安去。

杨至成他们万万没想到，当他们来到乌兰巴托后，日本侵略军已封锁了边界，十几个人，前进不能，后退不得，个个心急如焚。

经过一个多月与有关方面的紧急联系，他们才同意林彪可以坐飞机回国。因为他当时是国民革命军115师师长，是在平型关对日作战后受到误伤公开来苏联养伤的，可以公开回去。其他人是秘密出国的，只能设法秘密回国。

滞留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同志刚到时，住在苏联大使馆安排的地方，时间一长，供应发生困难，共产国际派来的哈尔诺夫少校也无法管他们的生活了，便要他们去自谋生路。

杨至成等人感到抑郁难耐，就去找苏联少校质问：“我们这些人，大部分既不懂俄语，更不懂蒙语，一说话就暴露，叫我们怎么保持秘密身分去找工作？”

过了几天，少校经请示后答复说：“只能委屈大家了。你们只能对外，是被俘的中国国民党军人，现在坐完一年监狱，被放出来了，暂时回不了国，要找饭吃……”大家感到非常气愤：“他娘的，这简直是对我们的侮辱！”

“是谁出的这个馊主意！”

细想一下，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革命的利益，只得委屈



1950年杨至成和朱德、杨立三在北京

自己。于是，杨至成去一家农场干苦力，给庄稼锄草，钟赤兵去剧院卖票，李天佑和李士英去帮人养兔子，周碧泉去造纸厂当临时工，刘亚楼，卢冬生由于俄语水平高，在苏联驻军里当了侦察参谋，贺诚因为懂医，去一家医院当了护士。后来这家医院的内科主任发现他技术娴熟，医疗知识丰富，又提拔他当了医师。当时，贺诚在同伴中，挣钱最多，他经常拿出一些钱来周济杨至成等生活困难的同志。

过了三个月，李天佑、李士英等人实在忍耐不住了，便打算骑马越过沙漠，通过中蒙边界，进入内蒙的乌兰察布盟，跨过黄河，回陕北去。

他们经过一番准备后，在一个交通员的带领下，冒着呼啸的寒风，便骑马上路了。其他人也都怀着急切的心情，企盼着他们的消息。

十几天后，他们返回来了，说边界上日本鬼子的骑兵巡查甚严，无法通过。看着他们沙尘满身、面容憔悴的样子，大家的心里又压上了一块石头。

又一个严冬来到了蒙古草原。西伯利亚的寒流，随着漫天的雪花横扫过来，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四十

度。对于这伙寄人篱下的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冬天农场无活可干了，为了不至于饿肚子，杨至成去给饭店当跑堂，后又给人家放马，在草滩上任凭风吹雨淋……他在苏联恢复好的身体，又急躁地垮了下来；他那形容枯槁，衣衫褴褛的叫花子样子，谁也无法把他与中国红军的高级指挥员、总供给部长的职位联系起来。

回祖国，无路可走，连个信也通不了，返回莫斯科吧，那里打得正紧，根本无法顾及他们。杨至成一伙人在度日如年的痛苦中煎熬。

1943年3月份，共产国际又派来一个50多岁的苏联少校，叫谢妙恩，到乌兰巴托负责处理滞留的中国同志的问题。

谢老头把中国同志召集在一起，传达上面的精神：现在是战争期间，要靠政府供养有困难。中国同志应尽量设法回国去，可以采取多种办法，妇女、文化人和身体不好不能骑马的，可以送到新疆去；实在走不了的，设法找工作，自己找饭吃。

会后，一些文化人如搞音乐的冼星海、搞电影的袁牧之以及身体不好的谭家述等，被送到新疆去了。但到了边境，因新疆形势恶化，不能

过去，也滞留在那里。

为了找饭吃，杨至成人介绍，到乌兰巴托市的一家中国饭店去干临时工。他仍然得用假身分。结果周围的人一听说他是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吓得都不敢接近他，谁见了他都像见了犯人一样侧目相视。

杨至成感到气忿而无奈，只好默默地离开这家饭店。可是，到哪里去吃饭呢？他的肚子正饿得咕咕叫。

他管过红军的总财务、总给养，他的手头上曾经手过上百万银元，上百万石的粮秣。可是现在，身上连买个烧饼的钱都没有了。他在街上踽踽徘徊，一趟，两趟……饿得都快走不动路了。

街道两旁的饭馆和小吃摊上，不断飘来一阵阵诱人的香味。杨至成开始还流着口水瞅几眼，最后连瞅也不敢瞅了，他怕自己经受不住这诱人的诱惑。

唉，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啊！隋唐时威名盖世的秦琼在穷困潦倒时，卖了黄骠马，当了双铜锏，才度过了难关。可是杨至成手头却一样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讨饭！他的脑子里突然跳出了这个字眼。

既然‘监狱释放犯’都当了，再

当一次叫花子又何妨！

几年前，当红军西路军西渡黄河，进军甘新一带时，被马步芳、马鸿逵的军队打散，不少红军抛尸沙漠，幸存的一些将领和战士，为了回到党中央的怀抱，不是也一路讨饭、一路赶脚么？！

他来到一个华人聚居的小巷，在一家门口，看见一位老大娘在择菜，就开口叫道：“大娘，我是一个过路的，能给一口剩饭吃吗？”

慈祥的老大娘，看见眼前这个操着汉话的中年男人，饿得都快站不住了，忙说：“你等着。”

她进屋去，很快拿出两个乌黑的青稞面馒头，端来一碗水。

杨至成接过两馒头。狼吞虎咽地塞进了嘴里，然后一仰头，把一碗水也灌了进去。

世界上好人到处都有。杨至成千恩万谢地向老大娘道别后，又走向另一家。……

有一天，他在一个餐馆门前要饭，一个店伙计厌恶地唾了他一口，吼道：“滚！不要到这里来搅我们的生意，扫客人的兴！”

杨至成心头的怒火升起，一把揪住那个伙计的衣襟：“给我把你那脏水擦掉！”

伙计鄙夷看了看他说：“嗨，还神气起来了！”

杨至成不再和他罗嗦，左手狠狠一揪，右手举起凳子朝他腰上顶去。杨至成虽然身体不好，但在黄埔军校和部队的军事训练中练就的功底，依然存在。那伙计一下子被杨至成顶倒在地上。杨至成一脚踩在他的肚子上，一手高高举起凳子，骂道：“你今天不把你的脏水擦净，老子就砸碎你的头！”

那个伙计吓坏了，忙说：“好，好，我擦我擦！”

他狼狈地爬起来用衣袖在杨至成的衣服上擦了擦那口唾沫。杨至

成这才放了他。

刚回过身走了几走，突然一个声音喊住了他：“这位大哥，且慢走，我有话说。”

杨至成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他并不认识的人。此人30多岁，穿戴颇为整齐，眼睛大大的，满脸洋溢着热情。

“你是叫我吗？”杨至成问。

“对，是叫你。你刚才在那家餐馆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了，兄弟颇为敬佩。”

“不敢，不敢。请问……？”

那人把杨至成带到前面不远的-一个饭店里，要了两碗羊肉泡大饼，说：“边吃边聊。”

那人告诉杨至成，他是山西人，是来这里做生意的。在国外难得见到杨至成这样正直有志的同乡，愿意帮他渡过难关。

杨至成说自己来这里投亲不遇，没有盘费了。

那人大方地掏出一沓钞票给杨至成说：“亲不亲，故乡人。这钱你拿着用吧！”杨至成却没有接。他不了解对方。

那人见他不要钱，笑了笑把钱收起来，随即叫来掌柜的，交代说：

“老掌柜，这位是我的朋友，以后他在你这里吃饭，最后由我结算！”

老掌柜满口答应说：“你放心吧！”

“另外，你也打听打听，哪里有什么工作，给他找一个！”

从此，杨至成便暂时吃住在这家饭店里。

半个月后的一天早晨，那位山西老乡突然不见了。问饭店掌柜的说已经走了。他的饭钱那位山西客人已给结了帐。杨至成正感到莫名其妙，当天上午，一位叫张罕的人来找他，约他出去谈话。

这个张罕是中国湖北人，在当

地一个机关工作，不久前，苏联来的谢妙慰曾介绍杨至成与他认识。

张罕把杨至成带到一间办公室，告诉他：“受朋友的委托，帮你找了个工作，是到中国工人报社去作编辑，怎么样？”

中国工人报，是在乌兰巴托出版的一张中文报纸。杨至成有点担心地问：“当编辑？我……行吗？”

张罕热情地说：“没问题，我找一个熟人带带你，你有文化，一定可以胜任的！”

论起文化，杨至成自信还是可以的，他上过中学，上过黄埔军校，最近又在苏联学了两年多，各种知识灌了个下。于是他便满怀信心地随张罕来到了中国工人报社。

张罕把杨至成介绍给报社一个负责人王西。杨至成一看，这是位30多岁的知识分子，文质彬彬，待人热情，没有一点架子。

王西给了杨至成一些钱，让他上街买些衣服和日用品，以后就吃住在报社里。

杨至成上了一趟街，买了一套符合编辑身份的服装穿了起来，住进了报社大院，总算结束了讨饭、流浪的生活。

正式工作了。王西先让杨至成试着编了几篇稿子，他审阅后，肯定了杨至成的文字基础不错，但在编辑技巧上还要下一番功夫。接着，他就告诉杨至成，怎么根据当前形势选稿、组稿；怎么根据主题需要改稿、编稿；怎么制作醒目的标题，怎么定眉题、副题等等，他边讲边举例，杨至成听了脑子大为开窍。

报社人手不多，杨至成既要当编辑，又要作记者，下到工人当中去采访。

这时，王西又告诉他：采访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新闻消息怎么写？什么是新闻的导语、主体、结尾？通讯应该怎么写？什么是人物通讯，工作

通讯?评语应该怎么写?怎么确立论点、论据等等。

报社每月只发给他200元的薪水,生活仍然紧紧巴巴,但他已经很满足了。

杨至成怀着感激的心情,总想探听王西的身世和来历,但他总是笑而不笑。直到全国解放后,王西以吉雅泰的名字被任命为我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时,杨至成才明白了这其中的一切。

杨至成的工作生活虽然安顿下来了,但“梁园虽好,并非久留之地”。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仰望长空明月,常常自叹:“何日才能返回祖国呢!”

眨眼间,杨至成到工人报社已半年了。这期间,他几次去找谢妙恩老头,探听回国的事宜,总是没有消息。

1944年的元旦刚过不久,谢老头找到杨至成谈话说:“莫斯科来电报了,要你返回苏联去,你准备准备走吧!”

原来来到乌兰巴托的十几个中国人几乎都走完了。李天佑和李士英二人实在等不及,也于去年八月第二次冒险,骑着骆驼,向西越过沙漠无人区,越过宁夏大草原,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绕着几千里,返回祖国去了。他们在途中九死一生,经过将近九个月的跋涉及无数风险,于1944年3月28日,才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

所以这时留在外蒙古还没有着落的,就剩下杨至成了。他想党中央通过共产国际让他返回苏联是可能的。因为这时,苏联的卫国战争也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德国法西斯已处于溃败之中。

杨至成正发愁自己不会俄语一个人怎么走,谢妙恩老头大概也想返回莫斯科去,于是,他自告奋勇要亲自护送和陪同杨至成返苏,杨至

成自然十分高兴。

当时乌兰巴托与莫斯科尚未直通火车,需要从这里坐汽车一直向北,经过两天的行程,到达苏联的乌兰乌德市,从这里才能坐上去莫斯科的火车。

真是好事多磨。二月份,当谢妙恩与杨至成经过两天的颠簸,坐汽车来到乌兰乌德时,又接到了莫斯科来的电报,说战争还未结束,又不让他们回莫斯科了。

杨至成气得和谢妙恩吵了一顿,但也没有办法。处在矮檐下,岂能不低头!他只好在此又住了下来。生活问题怎么解决呢?

好在这里已是苏联地面,谢老头出面与当地赤色互助救济会联系,由他们把杨至成接收下来,每月发300个卢布,供他生活用。

互济会是苏联内务部管辖下的一个救济性的组织,每年的救济金都由上级拨款,主要资助一些国外或兄弟党来苏联学习、治病而无生活来源的同志。

300个卢布,勉强能维持他一个人的生活。陪他来的谢妙恩,把他托给互济会后就离开了。

一天,内务部门的一个官员找到杨至成说:“住在城市,物价高,生活困难。我们想送你到城外的一个集体农庄去住,那里生产的東西多,生活可能会过得好一些。”

杨至成曾参观过集体农庄,农庄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痛快的答应了。

这样,杨至成搬到市郊的一个集体农庄住了下来。庄员们以农民特有的淳朴来欢迎这位中国客人。

但离开了祖国,离开了组织,离开了亲人,离开了战友,他心里难得一日的平静,却积攒下了越来越多的焦虑与烦躁。

夜里,他常常梦见延安,梦见战友和亲人。……他思啊,想啊,焦躁,

抑郁,精神恍惚。终于有一天,多年未遇的羊角风(癫痫)发作了。他倒在地下,口吐白沫,浑身痉挛,不省人事。

农庄卫生所的一位女医生匆匆地赶来了,她又是揪耳朵,又是掐鼻子,经过一番救治,杨至成才慢慢苏醒了过来。

为了怕这位中国客人再发病,农庄主席便找了辆车,把杨至成送回了乌兰乌德布,交给互济会,让他住在这里治病。

过了一段时间,杨至成的病情平稳了,他不想再回集体农庄去,互济会的人便开始对他冷淡起来,并告诉他,尽量找个工干,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费,互济会的经费很困难,不能长期供他的吃和住。

杨至成再一次被逼向了困境,他看着自己羸弱的身体,不知能干什么工作。

后来,有人介绍杨至成到一家贸易公司去守夜看仓库。这个工作虽然要熬夜,比较辛苦,但他可以在那里住宿,不用再租房子了,能节省一些费用。杨至成已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他不懂俄语,别的工作干不了,只好去给贸易公司看仓库了。

杨至成晚上一个人孤零零的住在仓库的一间屋子里,看着眼前的情景,他想起了过去看过的一出戏《玉堂春》。《玉堂春》里的那个王三公子王金龙,在未中状元之前,因与烟花女苏三交好,致使他银钱用尽,穷困潦倒,最后只好去给礼部衙门巡更守夜。如今,自己虽然不是王三公子,也绝非胡乱挥霍导致穷困,但一个红军的总供给部长来给一个贸易公司巡更守夜,也是够可以的了。

这个仓库里,存放着贸易公司的不少货物和商品,杨至成知道自己责任重大,所以每天夜里都要起来巡查几次。他还专门向公司要了一支猎枪在身边,以便应付紧急情况

况。

十月份的一天早晨,杨至成住的小屋门突然被撞开了,接着,忽啦啦拥进三个警察,带着一只警犬,围着他嗅了好几遍,又在他的屋里翻找了半天,最后把他看管了起来。

杨至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又听不懂他们的话。当然,他那愤怒的责问人家也听不懂。吵了半天,找来一个翻译一问,才知道昨天晚上仓库失盗,一批货物被人偷走了。人家怀疑是他合伙作案。

杨至成一听,脑袋一下木了。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

风,喊冤,辩解,没有用。警察通过翻译告诉他,在没有查清案情之前,不能放他。

杨至成痛苦不堪,他感到自己的精神快要崩溃了。

过了两天,贸易公司的一位副经理,是个40多岁的女同志,找到警察替杨至成开脱说,“这是一位中国同志,他不懂我们话,仓库失盗的责任,我看不一定在他,你们先不要抓他,等案情查清后再说。”

这样,杨至成才被解脱看守。后来,真正的盗贼查到了,杨至成的冤情才被洗掉。

杨至成不想再看仓库了,要求互济会另给换个工作了,但一直没有结果。

又一个冬季来临了,气温降到零下40多度。夜里更是寒气砭骨,杨至成打更守夜,受尽凄苦。日子一久,身体瘦成了一把骨头。不久,又诱发了羊角风的发作,一直折腾了好几个钟头才苏醒过来。

晚上,睡在冰冷的床上,杨至成心里好难受哟!他无法再忍受了,得赶快解脱目前的困境。

第二天,他把自己在中国工农红军当中的工作职务,写了个履历表式的简介,请人翻译成俄文,然后找到乌兰乌德党委机关一个管外事联络的负责同志努斯卡娅,把材料交给了她。

努斯卡娅是位60多岁的女同志,她看了杨至成的材料后,用她那浅蓝色的眼仁打量着面前这位又矮又瘦的中国同志,才知道他是红军中的一位高级领导人。他慈祥地笑着问了问杨至成的一些情况,向他表示了歉意。当她知道杨至成是共产国际请来在苏联学习养病的客人时,对他更加敬重,决定让他搬到一家残疾人疗养院去休养,并答应立即同莫斯科联系,让他尽快返回到莫斯科去。

在努斯卡娅热情的关怀下,杨至成住进了疗养院,在这里度过了1945年的元旦。

努斯卡娅很理解杨至成的心情。二月初的一天,她委托疗养院给杨至成买了一张去莫斯科的火车票,把他送上了火车。

经过四天的颠簸,在一个寒冷的早晨,火车“哐”一声,终于停在了莫斯科车站。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杨至成走出车站,看到战后的莫斯科正在恢复,尽管还留有炸塌的建筑物和毁坏的道路,但人民的



解放战争时期,杨至成夫妇在东北战场



杨至成和孙维世、李天佑、林利、芦冬生在苏联

生活基本上平静的。

该到哪里去呢？他踟躇街头，苦思冥想，理不出个头绪来。按说他应该回原来学习养病的库契诺去，但他在乌兰乌德时，听苏联同志说，共产国际已于前年解散，现在那个机构肯定不存在了，也不会再有中国人住在那里了。

但不去那里，又去何处呢？碰碰运气吧，说不定在那里能找个歇脚吃饭的地方呢。

于是，他摸索着向库契诺赶去。过去从库契诺来市内看病时，有车送，有人陪，所以路线不用发愁。现在要他一个人找到那个地方去，他真不知道该怎么走，或者该坐哪一路车。问人吧，他不懂俄语。几年前每周一次的俄语课，学的一些单词早忘光了。是他的脑子笨吗？不全是，那时他们这些老干部总感到时间有限，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军事课上。对俄语即使学得再好，回国后不一定能用得上，所以在苏联待了几年，连几句俄语的日常用语也对付不下来。现在真有点后悔莫及了。

杨至成一边打听，一边摸索，坐一会儿车，走一会儿路，从早晨下火车不久，一直折腾到下午，总算摸到了库契诺——这个他曾经生活过两年多的地方。

但是，这里却没有了往日的欢乐和温馨，一把大铁锁牢牢地锁着两扇大门。

杨至成感到一瓢凉水迎头浇来。他比划着向附近的一户居民打听这里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人家只是摇头，表示不知道。

此时，杨至成又累又饿，一屁股坐在地上不想起来了。

他这才想起自己已有两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了。本来，从乌兰乌德出发前，努斯卡娅给了他一些零用钱，叫他在火车上买面包吃。上车后，他一听，火车上的东西太贵，他舍不得多花钱，所以坐火车的四天中，基本上每天只吃一顿饭。他本想到莫斯科以后再好好吃一顿，但下车后忙着找住宿地，吃饭的事又耽误了。

他看见那户居民在吃晚餐，面包的香味强烈地刺激着他的味觉。附近没有商店和餐馆，他准备用卢

布向那户居民买两块面包吃，以压抑不断上升的饥火。

他往兜里一掏，大吃一惊，袋量的50个卢布没有了，要知道，那是他目前的全部财产呀！

他回忆起，上午来这里的途中他搭过一段公共汽车，当时车上的人很挤，钱肯定是在车上被人偷了。

饥饿难耐，他双手在身上乱摸，突然从裤兜里竟然掏出一个半卢布！他想起来了，这是上午买公共汽车票时，售票员找回的零钱。

这微不足道的一个半卢布，平时连一包次等烟都买不到，现在却成了他的救命线。

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那户居民门前，连说带比划，硬是用这一个半卢布，从他们那里买来一个黑面包，外带一碗土豆片汤，狼吞虎咽地填进了肚子。

天色已晚，不能赶路了。杨至成便在那户居民堆放杂物的偏屋里，抖抖索索的住了一晚。天气太冷，他冻得一晚上没有伸开腿。

第二天天刚亮，杨至成便饿着肚子，向莫斯科市内赶去，他没有钱，不能坐车，只有走路了。

40公里路，对几天没吃饱饭、浑身无力的杨至成来说，仿佛又是走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

该到什么地方去呢？国防部……外交部……联络部……那些机关太大，自己这么一副模样，人家不会接待的。那么，还有哪些熟悉的单位呢？

他想呀，想呀，脑子里突然迸出一个单位名称：留克斯！

留克斯是高尔基大街一个旅馆的名字，后来，共产国际把它租赁过来，作为宿舍用，不少外国党的代表团来后，也都在那里居住。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及其他一些人如陈潭秋、王明等都在那里居住过。说不定那里能找到

中国同志呢!

大约中午时分,杨至成气喘嘘嘘、满脸虚汗的赶到了莫斯科市内。这40公里路,几乎把他的力气耗尽了。只有消耗,却没有补充。

偌大的莫斯科,留克斯在哪条路,哪条街,他并不熟悉。问人吧,问不清。好在“留克斯”三个字的音他是知道的,问路时只要一说“留克斯”,有人便会给他往前一指,但由于不熟悉路径,他便在莫斯科市内推磨似地打起转来。

当他走得头昏脑胀、一步也迈不动时,终于找到了留克斯所在地——高尔基大街10号。

杨至成艰难地迈进传达室的门坎,往一张破椅子上上一坐,便像一滩稀泥似地瘫在了那里。

传达室的苏联同志被他弄得莫名其妙,问话吧,他说不清,看样子也没有气力说,但他们看出这是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同志,便拿起电话,给住在这里的林利打了个电话,说来了个中国人,讲不清话,请她下来看一看。

下面,是1994年11月10日,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利对当时情况的回忆:

“那时,共产国际解散了,我们

留在苏联的同志归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管。当时,我同孙维世同志住在留克斯的一个集体宿舍里(1939年陪同周恩来来到苏联治病时,留在苏联学习。)接到传达室的电话后,我下楼一看,原来是杨老太爷——杨至成,当时他整个人瘦得都变了形,满脸灰白,讲话都讲不出来了,头低低的垂在胸前,坐在椅子上的身子往下直溜,看样了是虚脱了。我看他没气力说话,就说:‘你等着,我给你去拿面包吃!’当时我们的面包很少,战争期间供应是配给制的,而且得干工作才给吃的,所以当时我在电台帮助搞翻译,女同志饭量小,宿舍里还留有两个面包。

“当我拿来面包赶到传达室时,却找不到杨老太爷的人了。我一想,他刚才昏昏沉沉的,也许没有听清我的话,见我走了,以为不愿接待他,所以他又离开了。

“我着急地四处去找,好一会儿,他才又转回来了,说他昏倒在街上,走不动了。我忙扶他坐下,把面包一点点喂在他的嘴里,又倒了些开水让他喝下去,等他有些力气,才扶他来到我们宿舍。

“我拿起电话,向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管我们的一个同志汇报了杨

至成同志的情况。他很不错,当即安排杨至成同志在留克斯住了下来。当时,住在留克斯的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青是一个人一大间房子,他们便安排杨至成同毛岸青住在一起,一切生活问题由联共对外联络部管。杨老太爷住下后,与毛岸青很合得来,杨老太爷还经常帮助岸青料理生活,两人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为了治好杨至成同志的病,使他的身体很快恢复了,我和孙维世两人轮流陪同他去医院看病,给他带路,作翻译。几个月后,杨至成同志的身体便明显地好了起来,脸上气色也红润了……”

多年以后,杨至成还常常对子女们提起他在这里遇到了两个“女菩萨”。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杨至成多次联系回国,都未成功,当时国内的交通要道,都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控制,这样,直到1946年1月16日,杨至成才同在莫斯科学习的李立三、袁牧之等,搭乘苏联的一架军用飞机回到了东北,回到了阔别八年的祖国!

(责任编辑:刘家驹)

《纵横》征订启事

《纵横》杂志是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创办,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青年文史读物。她以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统战工作服务为办刊宗旨。辟有:辛亥勋杰、民国人物、营垒之间、寻踪探迹、历史疑案、史海钩沉、社会一隅、历史审判台、黑网录、史海拾贝等栏目。所刊登的内容主要以历史当事人的亲身经

历,亲见亲闻史料为主。从敌、我、友三方面多种角度客观、真实地介绍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人物、事件及文史知识。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文中配有珍贵的历史图片,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1985年被评为全国最佳期刊,1992年被列为全国“中文历史类核心期刊”。在1996年即将来临之际,本刊根据广大热心读者的建议和要求,决定将《纵横》杂志改为月刊,并将继续三亲的刊物特色,争取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有关经

济、教育、科技、工商等方面的珍贵史料,力求使刊物更加贴近现实,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多的可供借鉴的文史资料。

《纵横》杂志由北京市报刊发行局发行,全国各地邮电局均可订阅。国内邮发代号2—300,1996年每月15日出版,定价2.80元。如有漏订和订阅不便的读者,也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邮购,汇款零订另加15%邮资。刊址: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邮编:100811。电话6011155—296。

共和国史册上的大匪患

● 屈德寿

蒋介石打出最后一张牌—— “应变计划”

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大西南进军，蒋介石在北起秦岭、东至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的西南防线已全线崩溃。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重庆。由此各地国民党军纷纷投诚：

12月2日，湖北省保安第七旅在四川巫山投诚。

6日，第四十四军军长周廷青率一五〇师在四川隆昌投诚。

7日，“同心号”运输舰在云阳江面起义。

同日，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率所属5万余人，在昆明通电起义。

同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第九十五军军长董隐率二二五师在川西彭县起义，所属一二六师在成都附近起义。

最使蒋介石胆寒的是卢汉、邓锡侯、刘文辉的倒戈，这使他在西南的三根支柱全垮了，能依靠的力量只有胡宗南的20万人了。

此时贺龙所部已经越过秦岭，向绵阳、德阳推进，胡宗南率五个军残部向川西节节败退。

已是穷途末路的蒋介石，决定打出他那最后的王牌。12月10日中午，他在成都北较场他的临时官邸召来顾祝同、胡宗南、王陵基、盛文、严啸虎、余锦源、王缙绪、李迪、周迅宇、王旭夫等人，毛人凤挟着一包中央政府的委任状和几份《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走了进来，蒋介石和蒋经国也从卧室里出来同大家见面。

蒋介石用严峻的目光朝与会者扫视之后，指着毛人凤手中的文件凄惨地说：

“这个‘应变计划’，是在共军渡江时，我就令毛人凤起草了。其中有些措施还在共军过江南下途中就已着手安排……”

接着毛人凤手捧计划开始宣读：“为了更好地在全国范围贯彻总体游击战的计划，特将全国戡乱工作委员会总部设在台北，在中央行政院领导下对五个‘戡乱区’的活动进行指导。这五个‘戡乱区’是：西南、西北、华北、东南、华南区。其主要负责人分别为何应钦、马步芳、李

玉堂、郑介民和薛岳。

此外，还在大陆各地建立若干个“重点游击根据地”，主要有：川黔湘边游击根据地，川南游击根据地，滇北昭通游击根据地，甘青川边游击根据地，湘西游击根据地，湘鄂川边龙山游击根据地，黔东南游击根据地，武当山游击根据地，大别山游击根据地，豫西游击根据地，井冈山游击根据地，广西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苏南太湖游击根据地，浙皖边游击根据地……

应变计划对各游击武装具体要求是：“组织过去留在各地之各种地方部队、警察、绿林武装，与共产党斗争”；“等待一切机会，留心一切机会，创造一切机会，利用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制造事件”；“袭击共党各级政权机关，攻击共军小股部队，破坏一切军事设施，消灭一切有生力量，最后配合国军完成反攻复国大业。”

毛人凤读毕，蒋介石站起来盯着胡宗南、王陵基，说道：

“二位听清了吧，你们若能守住成都和川西，再加上那些游击武装的配合，形势定会改观。”

王陵基劲头十足：“只要委员长

坐镇成都，我们是有信心的。”

与会者一走，蒋介石即和蒋经国、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等人驱车直奔凤凰山机场，旋即登上“中美号”专机飞往台北。

播下罪恶“火种” ——暴乱迭起

在此计划未抛出之前，1949年6月，蒋介石已着手在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筹办“游击骨干训练班”，由该校教导总队长王旭夫兼“游干班”少将主任。“游干班”培训的对象多为乡保长、县长、地主恶霸、地痞流氓、袍哥、惯匪等。至是年12月底，共办五期，培训学员3000余人。这些学员，按照“应变计划”分散到各地，播下罪恶的“火种”，由于王旭夫办班有功，蒋介石逃离成都前封他为“川康边游击挺进军”总司令。

此外，蒋介石还令毛人凤派人到贵阳办了同类的“游干班”，培训学员2000余人，亦派到各地执行同样的任务。

“应变计划”出笼之后，大规模的暴乱霎时席卷全国。

——1949年底，河北省蔚县出现一个“下夜团”，多在后半夜出动，袭击我乡、区公所，抢劫我征粮队和驻军车辆，一次就杀害我解放军干部战士、民兵和村工作人员达百人之多。并扬言在三天内夺回张家口。

——1950年1月20日，国民党暂编第十师师长瞿波平，当起了“湘鄂川边反共游击军”总司令，并与当地民团、土匪联合行动，大肆抢劫，奸污妇女，袭击乡、区政府。

——1950年1月27日，“西南剿共救国军”第一军军长卞占武，率2000余人，在川南的荣昌、泸县等地公开暴乱，杀害我乡、区干部及征粮队员。围攻城镇，袭我解放军小部队。并提出：“只打山东人，不打四川人”；“只打老八路，不打新八路”的口号，企图裹胁群众叛乱。

——1950年2月5日，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带一个加强警卫班。行至成都东北的龙潭寺时，突然遭到上万

名土匪的围攻。朱向璃及警卫班的战士当场被杀害。接着，龙潭寺附近22个乡的土匪群起暴乱。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第四十四军449团的溃兵及土匪武装共2000余人，在永川、大足、铜梁等县暴乱，袭击乡、区政府，拦截运输车辆。

——1950年2月9日，成都西南红白场街头，出现“欢迎游击之母赵老太！”大字标语。

赵老太即赵洪文国，她曾手持双枪在华北一带打击日寇，后到四川定居。蒋介石逃离成都前，封她为“西南反共救国军第二路绥靖总司令”。与此同时，附近的什邡、绵竹等10多个县的惯匪和潜伏的“游干班”骨干，也起来纷纷响应，大举暴动，总人数近2万人。

——1950年2月12日，甘肃省皋兰、榆中两县分别冒出一个“皇帝”和一个“圣母娘娘”来，各聚几千土匪四处袭击，声言要打兰州。

——1950年2月16日夜，江苏省兴化县10多个乡同时遭到土匪



被我军抓获的川东匪首

洗劫，乡公所被捣毁，死伤数百人。

——1950年2月18日，云南省麻栗坡县蒿杖坪竖起一杆“天地”旗。惯匪方传明向几百人宣布：“东南亚民主联盟麻栗坡共和国成立了！我是上帝派下来的救世真主，没饭吃的跟我走。”

——1950年2月20日，“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总司令曾绍华，纠集各县股匪，网罗散兵游勇等近万人，在贵阳附近拦截车辆，袭击政府，攻占花溪等地。

——1950年2月25日，湖南省会同县朗江场出现“暗杀党”，几天内杀害我征粮队员、区乡区干部、解放军干部战士30余人。

——1950年2月的几天内，国民党凤凰乡保警中队长韩德功就拉起千余人的双枪（钢枪、烟枪）队伍，拦路抢劫，杀人越货。

——1950年2月27日，福建省莆田县界外西营有一家“迎宾旅店”。这是一个黑店，专杀投宿的解放军和地方干部，一次就杀了10余人，并将人肉做成包子出售。

——1950年2月29日，安徽省蒙城县天门道道首刘金兰（女），利用春荒之机，散布谣言，拉起一支数千人的土匪武装，涌进蒙城，攻打县政府、公安局和监狱。

——1950年2月30日，一个“杀人研究会”在黑龙江省依兰县黑瞎沟成立，几天之内杀死共产党员和解放军百余人。

当时总参作战部对暴乱武装的成份作过初略地分析，大致可分为：有收罗被击溃的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部队的流散人员组成的武装；有地主、豪绅、恶霸所掌握的武装；有纯土匪武装；有潜伏下来的特务、旧政府官员“游干班”人员拉起的武装；有惯匪、旧政府官员被国民党在撤退时封以头衔而组织起来的武装；有以各会道门的名义欺骗群众

组织的武装；有国民党撤退时有意留下的部队组成的武装，等等。

总参作战部还对匪患的危害作过统计：仅在1950年2月6日至2月13日的8天内，全国各地被土匪包围或攻击的地、市级城市和省城就达20多个，被土匪攻占的县城34座，被土匪杀害的各地方干部、工作人员、征粮队员、解放军干部战士达到1万余人（不含群众）之多。

这个数字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泽东下定最大决心——全力剿匪

1950年春，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坐在会议桌一端的藤椅上，听取政务院汇报灾情。

由于连年战争，有些农田荒芜，再加上国民党临撤退前的大肆破坏，这就给诞生不久的共和国留下有史以来的严重春荒。

就在会议紧张进行之时，又冒出一比春荒更为严重的问题。

机要秘书匆匆进来，把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送到毛泽东手里。这是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刚刚发来的。

毛泽东接过急电，那上面惊心动魄的文字赫然入目：

“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暴乱……利用各地当前一度出现的灾害，公开对群众进行欺骗煽惑，提出‘反征粮，不交粮，反合理负担’，叫嚷‘等待忍耐半年，瞅准时机反攻’，‘赶走共产党，三年不纳粮’的口号，组织名目繁多的各种土匪武装，纷纷在各地包围、袭击军队和地方各级政权，……气焰十分嚣张。”

毛泽东觉得事关重大，一时难

以决断，他要今天到会的同志再把这些电报读一读，认真地想一想，拿出个意见来。”

当然考虑最多的是毛泽东，因他是一党一国的最高统帅，容不得半点闪失。

建国之初，工作千头万绪，诸如：建立政权，土地改革，恢复经济……还有西藏、海南岛和沿海岛屿尚待解放；还要准备解放台湾等。这些都是刻不容缓的。但在当前，最为迫切的是剿灭匪特和救灾工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其它工作就无法展开。匪患危害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救灾不解决，春季不能播种，粮食欠收，人民缺粮或无粮，许多群众就会被土匪裹胁进去。这种局面一旦出现，土匪武装就会像雪球一样愈滚愈大，直至“滚掉”人民政权，共和国就将毁于一旦。严重啊！

次日，毛泽东来到会议厅。

当大家谈到以清剿匪特为中心工作时，毛泽东频频点头：“不谋而合嘛，认识一致，这就好。”他说到这里，加重语气，“全力剿匪！但救灾工作不能松，要落到实处。我说全力，就是我们军队的重点要转，过去是以解放尚未解放的地区为主，现在就要倒过来，以剿匪为重点。”

几天后，一份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号召书，向全党、全军、全国公布了。

军民齐心协力 ——扫除匪患

毛泽东一个号召下去，中华大地一场空前的、长达三年多的剿匪斗争全面铺展开来。

西南军区抽出数个军、师建制部队，以营、连为作战单位，分别开赴川康、云贵地区清剿匪特。航运线

和成渝、川康等公路运输线，采取包干的办法组织护航和护路。

中南军区派出若干军、师、团深入广西十万大山、湘西、湘鄂川边、豫西等地清剿。其中以十万大山、湘西为重点。

华东军区抽出大批部队赴闽北、浙皖边、井冈山、皖北、苏北、苏南太湖等地清剿。在福建沿海一带部署兵力，防止美蒋匪特窜扰；在上海、南京市做好防止匪特和侦破潜特的工作。

西北军区几乎抽出全部兵力，分赴东疆北疆、甘南、甘青川边等地清剿。在北疆的国境线上部署兵力，防止匪特出境。

华北军区的重点放在京、津、主要对暗藏的匪特侦破，并抽出一部分兵力对张北、熊耳山、恒山等地进行清剿。

东北军区的任务主要是消灭潜特和小股土匪武装。

在指挥这场大清剿中，毛泽东通过抓好与差两个典型来推动全国剿匪工作。好典型，推广了西南军区的剿匪经验；差典型，狠抓了广西军区的剿匪不力。

毛泽东当即亲自起草电文，致电广西省委、广西军区，严肃指出：

“广西目前一定要把剿匪工作放到压倒一切的首要位置，作为全省一切工作的中心来完成，集中一切力量，迅速抓出成效，绝不可再有丝毫懈怠，切实争取在明年三、四月之前剿灭广西全境的主要脱匪。”

西南军区的确成绩很大，从3月至7月共歼匪37万人，各省腹心地区基本净化，征粮工作已告一段落，群众初步发动起来，城乡交流日趋活跃，整个西南工作开始转为主动。

毛泽东在批转西南军区剿匪简报后，又挥毫再次致电广西省委、广西军区，要他们仿照西南办法，及时

总结经验，纠正缺点，促进剿匪工作。同时，又急电命令中南军区将第二十一兵团调入广西剿匪，并指明要政治部主任陶铸前往广西督导清剿工作。

11月下旬，广西剿匪刚刚取得一些成绩，福建地区却出现了匪特猖獗。这是蒋帮为配合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战争而向福建沿海增派大批匪特和空降特务所致。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紧急增调1个军入闽清剿，也未能制止住匪势的发展。

毛泽东断然决定推迟进攻金门的时间，命令福建前线所属部队立即就地转入清剿匪特；同时增派5个师的兵力进入福建清剿。

至1951年2月，包括福建在内的华东地区的大股匪特基本剿灭。但在此时，全国剿匪工作在掌握分寸上出现了失之过宽的现象，尤以广东为甚。这引起接近我之群众不满，农会不能成立，农民不敢分田，人民政权不能巩固。

对此，毛泽东愤怒了，即于2月22日亲自起草并下达了处决罪大恶极的匪首、恶霸、特务的命令。

各大军区、各省市遵照“命令”的精神，对匪首、惯匪、恶霸等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广东省出动3个军在各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一天就逮捕各类大小匪首及部分恶霸、特务1.1万余名，处决其中罪恶重大的1700余名；甘肃省在两天内逮捕大小匪首、恶霸9000余人，对其中罪行严重的作了处决；湘西21个县，在四天之内杀匪首、恶霸、特务6000余人。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1月间，那些被打散的土匪又重新集结，其行动更加狡猾，手段更加凶残，目标集中对准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人民解放军。致使有些地区，人民政权根本无法建立和巩固，土改长时间无法

进行，社会秩序始终无法安定。

面对此情此景，毛泽东指示：要求倾以全力，限定3至6个月内肃清境内的大小股匪。

各大军区再次调整了兵力部署。西南军区不仅迅速在川、康、黔、滇全区范围内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而且还摸索总结出一条全区各地在“一元化”领导下开展剿匪、清匪斗争的新路子。这就是成立从大军区到军区、军分区，直到下面县、区、乡、保的各级剿匪委员会，各级剿委下面分别设指挥组、情报通信组、政工研究组和财经经济组等机构，剿委主任、副主任和委员既有部队的干部参加，也有当地县、区、乡、保的各级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并吸收了部分开明士绅。这样就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往剿匪只是部队单独干，现在地方干部和广大群众把剿匪看成是自己的事，因而剿匪成绩就愈来愈大。

毛泽东看了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关于开展“一元化”领导下的剿匪斗争》报告，非常赞赏，立即批转全党、全军，并写了按语。

1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清剿匪特的第二次高潮。经年余的苦斗，到1952年底，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肃清了匪特。

至此，蒋介石寄希望于匪特作乱，以达卷土重来的梦幻破灭了。

剿灭这场匪特，不亚于一场解放战争。三年来，人民解放军在抗美援朝，进军西藏，解放海南岛及沿海岛屿，还要参加成渝铁路和荆江分洪工程建设的情况下，共出动150余万人，歼灭了土匪达240余万之众。巩固了新生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经济恢复工作和生产建设。这在共和国史册上，是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

（责任编辑：刘文）

傅斯年与毛泽东

● 傅哲清 傅 强



傅斯年

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傅斯年，是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的后裔，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又留学美国、德国。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学术成就享誉海内外。

1918年的一天，还是北大学子的傅斯年，来到北大图书馆借阅图书。

这天，毛泽东正值班，见一个学生在签名簿前签下自己的名字——傅斯年，毛泽东抬起一双钦慕的眼光注视着这个胖乎乎的青年。

这时的傅斯年，由于在陈独秀所办的刊物《新青年》上连续发表文

章，并在北大组织新潮社，办《新潮》月刊，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不但名扬全校，而且已是蜚声社会的人物了，毛泽东对他久有所闻，却还未见过面。

现在毛泽东欣喜地与之交谈，两人从此相识。到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念念不忘说傅斯年是“启

蒙运动的著名领袖”，是“大忙人”，“曾试图同他们讨论政治和文化问题”。

1919年，北京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傅斯年当时是北大学生会主席，被选为“五四”大游行的总指挥，是这场示威游行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回到长沙的毛泽东，他和北京相呼应，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并组织起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办起了《湘江评论》。毛泽东在《发刊词》中说：“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以

磅礴的气势，生动的语言，犀利的笔锋，激进的观点，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化界。该刊一出，即引起了傅斯年的注意。《〈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称赞《湘江评论》是当时“最有价值”的少数几份刊物之一。傅斯年和毛泽东虽不相聚，声气却是相通的。

1945年7月，傅斯年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分访问了延安。同行的有褚辅成、黄炎培、冷谦、左舜生、章伯钧等6人。

他们这次去延安的目的，是谋求国共两党的团结，致力于国内和平。

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都胜利在望。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了人们极为关注的一大问题。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大人民群众和包括傅斯年等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的普遍拥护和热烈响应。黄炎培在重庆读了这个报告后，便约傅斯年、褚辅成等人商议，要为国共和谈、团结建国做些工作。

6月1日，蒋介石请傅斯年、黄炎培、褚辅成等人吃饭。几位参政员趁机向蒋介石慷慨陈词，要求国共继续会谈，并表示愿以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表达同样的意愿。蒋介石被说服。宴会后，他们即到傅斯年的住处，继续商量与延

安联系的事宜。讨论决定，由傅斯年、黄炎培起草发往延安的电报文稿。

毛泽东、周恩来接电后，复电“扫榻以待”这几位参政员去延安。7月1日，傅斯年等6人在王若飞陪同下，飞抵延安。他们在机场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欢迎。

会谈中，双方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各抒己见，最后在和睦融洽的气氛中形成了一个文件：《延安会谈记录》。这个文件记录了中共与6位参政员的两点共识：1，停止国民大会进行；2，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傅斯年在延安期间，毛泽东特地安排了一个晚上，单约傅斯年叙话。

他们两人海阔天空，谈到中国的小说，也谈到过去同在北大时的情景，毛泽东肯定和赞扬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功绩，傅斯年则谦逊地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笑笑，未即作正面回答。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请傅斯年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傅斯年则请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欣然答应下来。

傅斯年他们参观了延安的市容，访问了延安的一些故旧，并对延安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进行了了解。当他们慢步走进延安的大礼堂，看到墙上密密麻麻挂满向毛泽东献的锦旗时，傅斯年不自觉地发出赞叹：“堂哉！皇哉！”对毛泽东有如此的崇高威望唤起万千感慨。

临行，毛泽东向每人相赠一床边区土织毛毯，虽价值不高，在傅斯年看来是别有一番情意，弥足珍贵。

7月5日，毛泽东驱车到机场送行，握别之际，交给傅斯年一件亲手所书的条幅。傅斯年等登机后展看；原来是上面写的是北宋诗人钱惟演的两句诗：

不将寸土分诸子，
刘项原来是匹夫。

这是毛泽东对傅斯年题词要求的满足，也是对两人在单独叙谈时傅斯年所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那句话的答复。

傅斯年等人回到重庆后的第三天，即7月7日，向蒋介石汇报了到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会谈的结果，转交了《延安会谈纪录》。

不久，日本无条件投降，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迫于形势，蒋介石连续三次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傅斯年、黄炎培等赴延安的几位参政员拜访了他。此后，双方又有频繁的联系。

9月2日，蒋介石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傅斯年出席作陪。

9月5日，傅斯年等赴延安的6位参政员，在傅斯年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设宴招待毛泽东等。

国共两党这次会谈之所以能够实现，虽由国际国内的多种重要因

素促成，傅斯年等人的积极奔走，互通信息，也是作了努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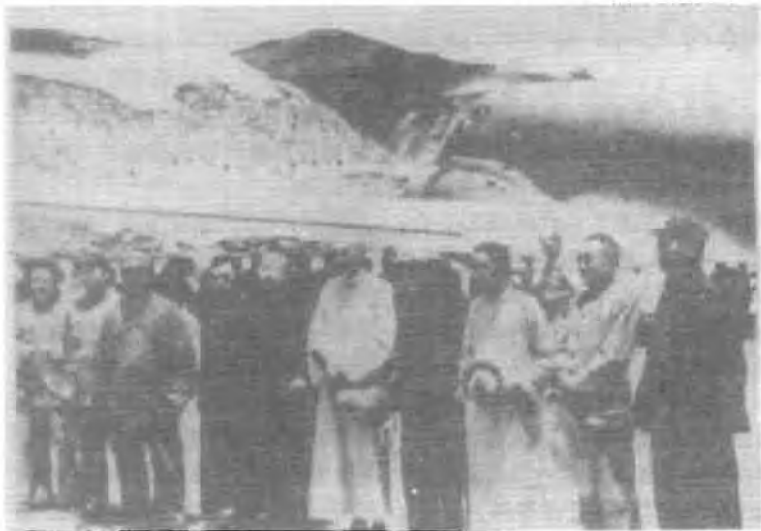
1949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已朝不保夕，傅斯年这时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于1月21日飞赴台湾。

毛泽东佩服傅斯年等人的一代学人的辉煌成就。但在政治上对问题的观察和态度上，毛泽东认为他们却“往往不正确”。1949年8月，毛泽东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作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其中提到了傅斯年，文中说：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少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毛泽东这篇文章发表一年后，傅斯年病死于台湾。

(责任编辑：仲文)



傅斯年等访延安时在机场与毛泽东等合影

习仲勋参加革命之初，就是在和刘志丹共同战斗中，在和“左”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渐渐成长起来的。而正当习仲勋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时，又被康生等陷害，被扣上“利用《刘志丹》小说反党”的大帽子，受迫害达16年之久。后又在邓小平领导下获得平反而复出，积极协助胡耀邦等同志，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在纠正“左”倾错误的斗争中作出很大贡献。习仲勋一生坎坷，我们特请习仲勋前任秘书田方，撷取他与刘志丹和《刘志丹》小说反复曲折的几个故事，说明我们党既能战胜外部敌人，也能在党内斗争中战胜一切错误的东西。

习仲勋和刘志丹 的荣荣辱辱

● 田 方

习仲勋与刘志丹 交往始于1932年

说起习仲勋和刘志丹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32年的春天。那时习仲勋和他的战友们正在甘肃两当地区发动兵变，刘志丹奉命带队伍到陕西的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可是习仲勋的部队在准备攻打永寿县城时，受到当地土匪的包围，遭到很大损失。失败后，习仲勋受派到照金开展工作，第一次见到刘志丹。习仲勋当时才19岁，没有斗争经验，因兵变失败而心情沉重；而此时比习仲勋年长10岁的刘志丹却对习仲勋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么。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得多！”这使习仲勋很受鼓舞。当刘志丹知道习仲勋在搞两当兵变以前，当过营委书记，还坐过

牢，搞过群众运动。因此两人谈的很活跃。刘志丹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行动没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据，逐步扩大游击区，这样，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落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

初次见面的一席话，给了习仲勋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由于当时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刘志丹的愿望很难实现，但刘志丹和谢子长的陕甘工农游击队始终在为建立根据地而努力奋斗。以后，刘志丹又对习仲勋说：“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临别时，刘志丹留下了一支特务队交与习仲勋，以便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当时，被任命

为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的习仲勋，即按照刘志丹的嘱咐，挨村挨户地调查研究，发动群众，相继组织起了农会、贫农团、赤卫队、游击赤卫队，在分粮斗争的基础上，又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政权；在当地青年踊跃参军的热潮中，还逐步建立了几支陕甘边游击队。此后，历经敌人多次“围剿”，乃至大革命失败后，照金根据地始终保存着党组织和农民武装。不久红二十六军成立，中央派来了执行王明路线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担任二十六军政委。杜衡把刘志丹看作眼中钉，诬蔑刘为“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等等，撤销了刘志丹一切职务，把谢子长也调离了部队。但刘志丹心地坦然，毫不计较，仍积极协助红二团团长王世泰进行工作，维护部队团结，精心拟定作战计划，指挥作战。

刘志丹拉着习仲勋的手说：这次我们又上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当！

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蛮干，甚至火烧香山寺，把1000多和尚都推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照金根据地只剩下个巴掌大的蒋家寨。杜衡又强令红军北上“打通国际路线”，碰了钉子又要红军南下到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渭华地区建立新根据地。杜衡不但不听刘志丹劝说，反而诬蔑刘志丹为“老右倾机会主义”。当红军在杜衡强令南下进到蓝田时，被敌人包围，全军覆没，杜衡被捕当了叛徒。刘志丹和王世泰等主要干部在地方党帮助下，相继化装潜出重围。当时习仲勋因身负重伤，留在蒋家寨养伤，并带伤坚持工作，照金根据地总算渡过难关。此时，国民党部队中的王泰吉率领骑兵团在耀县起义，革命武装力量又壮大了，并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就在1933年中秋节之夜，刘志丹、王世泰等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照金。大难之后战友重逢，每个人心里都无比激动。刘志丹拉着习仲勋的手说：“这次我们又上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当习仲勋向刘志丹汇报了陈家坡会议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情况后，刘志丹兴奋地说：“这就好了，我们又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对红二十六军又进行了组建工作，共同组成一个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为了避开敌人的“围剿”，刘志丹率军去甘肃的合水、庆阳、正宁、宁县一带。

1933年冬，红军横扫陕甘边反动武装，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刘志丹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建立三路游击区，逐步把南梁同关中地区的根据地和陕北游击区连接起来，使红军主力和游击区能配合作战。不到一年时间，就解放了陕甘地区十多个县的大农村，拔掉了敌人成百个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建立了工农兵政权。1934年秋，又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作风民主，人们都愿意和他倾谈不同的意见；打了败仗，他首先承担责任，即使受到打击排斥，也不急于辩白，而是开诚相见，与人为善。1934年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挺进陕北，和谢子长率领的游击队共同战斗。在一次河口战役中，谢子长身负重伤，不幸牺牲，此时，陕北游击队编为红二十七军，和红二十六军一起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并肩战斗，消灭和击溃了敌人好几个师，使陕甘和陕北连成一片。



刘志丹

正当陕甘苏区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毁灭的关键，中央红军到了陕北

1935年8月，徐海东和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出豫鄂皖苏区经陕南长征到达陕北。习仲勋和陕甘边军委主席齐景范前往永宁山迎接。同年9月，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并为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已进入甘肃，越过六盘山。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阻止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徐海东、刘志丹率红十五军团在延安以南的劳山地区，消灭敌人一个师又两个营，击毙敌师长何立中。值

此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左”倾机会主义者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所谓“肃反”，诬蔑刘志丹“右倾、右派、与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甚至给他扣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使用欺骗手段把他抓了起来；凡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下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部被抓；习仲勋作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也被关押。面对随时都可能被枪毙、活埋的残酷现实，刘志丹泰然处之，对同狱的战友们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乌云总遮不住太阳！”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去瓦窑堡接管“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控制的保卫局；后来，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一到瓦窑堡，立即释放了刘志丹等人。毛主席安慰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们受委屈了！”而刘志丹毫无怨言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情都好办了！”不久，党中央任命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副主席兼）、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军北路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1936年初，刘志丹率部队东征抗日，当时习仲勋任党校三班班长，在到瓦窑堡途中，巧遇正奔向前线的刘志丹和宋任穷。刘志丹下马和习仲勋握手，语重心长地说：“仲勋，要向挨过整的同志说说，过去的事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那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积极工作！”刘志丹打过了黄河，一路旗开得胜，捷报飞传。不料，1936年4月1日，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战役中，刘志丹在前线不幸阵亡。刘志丹牺牲后，引起了全党同

志和老百姓的哀悼。毛泽东称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诗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称他为“红军模范！”

习仲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回忆刘志丹而写的“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文章中最后写道：

“志丹同志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走井冈山道路，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使这块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的落脚点，党中央、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边区以后，这里又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习仲勋参与小说 《刘志丹》写作经过

过去我曾听说，刘志丹的弟媳、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在写《刘志丹》小说。习仲勋副总理是深知西北根据地党的历史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即使1942年底在延安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专门召开过高级干部会议，对过去的历史问题作了决议，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现在要对刘志丹写传记小说，势必涉及当时各个方面有关人士，写不好就会重新引起纠葛；李建彤本人并不熟悉当时党内斗争的具体情况；要写长篇小说谈何容易。习仲勋还曾通过刘景范对李建彤进行劝说。但由于工人出版社从1956年开始就抓这部书的出版，并派人具体帮助；加上李建彤决心大，信心高，的确也下了很大苦功，先后走访了300多位老同志。到1959年冬，李建彤写出了《刘志丹》小说第三稿送习仲勋审阅。当时，习已是国务院副总理，我忙于习仲勋办公室工作，没有参与其事。又因庐山会议后全国正进行反右倾运动，政治气氛相当紧张。习仲勋看后，感到不仅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

会在当事人中引起纠纷，而且也和当时多事的政治环境不相适应。习仲勋虽对她的小说提了一些意见，但仍劝她谨慎从事。建议她分成片断来写，不要写成大部头。然而，此时的李建彤已难于接受习仲勋的意见。到1961年春夏之交，又送来了小说第四稿的清样。习仲勋自己工作很忙，让我帮助看看。

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得那么复杂，心想李建彤既然已经下了多年工夫写成这部小说，对她既同情又钦佩，于是抱着满腔热情来阅读这部小说。这是小说的上半部，主要描写刘志丹童年及青少年时期在陕北保安县（后称志丹县）永宁山农村的生活，从接受革命教育及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到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过程；特别着重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既顶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又要和党内左倾盲动路线进行斗争，小说还描述刘志丹对毛泽东领导红军在井冈山开展游击战十分敬仰，再三强调要学习毛泽东发动群众组织红军、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精神。小说深情地写了刘志丹和陕北人民的血肉关系，描述了一位双眼失明的陕北老婆婆拄着拐棍、拎着一篮鸡蛋“看望”刘志丹，老人用颤抖的手抚摸刘志丹的动人情景；当刘志丹接到“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欺骗他去瓦窑堡开会、而实际上是保卫局下令逮捕他，刘志丹为了顾全大局，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顾个人安危，自动奔向瓦窑堡，便被投入监狱、备受折磨……等等事迹，都是非常感人的。所以我读后所提的，无非只是些技术性的问题。习仲勋先后两次召集李建彤、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两位编辑进行座谈。由我组织会议并担任记录。马锡五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熟悉当年实际情况，又是

保安(即志丹)县人,曾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习仲勋请马老参加,除了核实小说中某些史实,还想和马老这样前辈人来共同劝说李建彤。特别强调了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一代”、“写毛泽东思想”、“把刘志丹经历时期写成全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习仲勋还说:“写西北大革命,整个写这一时代。思想呢?就是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通过志丹具体实现。最后一段左倾冒险只留下一个陕甘苏区。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个落脚点,以后又是出发点。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写好。当然也有许多错误,但基本路线没有大错。最后是毛主席来了,不然也完了!”

习仲勋说: 毛主席迟到四天 我们就被活埋了!

早在1950年1月,他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我当时还是记者,对他进行专访,撰写的题为“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一文开头就引用了1942年底为讨论西北党史而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嘉奖习仲勋的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我在文章中介绍:1933年和1934年,当陕甘党内关于红军的统一与分散的问题,创造根据地问题、土地政策问题、肃反问题,有着政策路线上原则的争论时,他和刘志丹一起,立场坚定,态度明确,始终坚持着党的正确路线。”粉碎了蒋介石调集十万军队的“大围剿”,终于保留了最后这块红色根据地。可是正在这大敌当前的紧急关头,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竟然诬蔑刘志丹为“右倾”、“右派”,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把刘志丹、习仲勋以及陕甘边

地、县级以上干部和红二十六年营以上干部300多人抓了起来,被投进了监狱,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使革命形势出现空前的严重危机。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所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发现了这一严重形势,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立即释放了刘志丹和所有被捕的同志。这才挽救了最后这块红色根据地。正如习仲勋以后所说的:“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批人就被他们活埋了!”

本来,描写这一过程的《刘志丹》小说,应该是无可非议的。习仲勋的意见,主要是根据他的切身体会,为了避免引起党内再次发生纠纷,为了使这部小说能更高、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刘志丹贯彻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

康生制造了 这桩现代文字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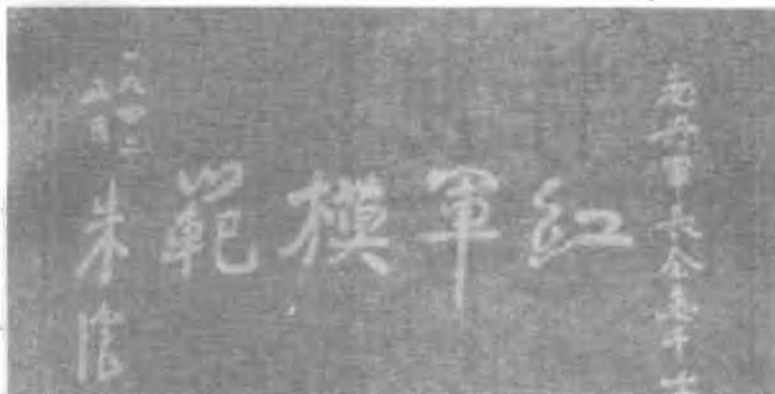
这以后,我已奉调到陕西宝鸡地委任副书记。1962年春,地委书记薛志仁从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回来,还转达了习副总理对我的关怀和勉励。教我好好在下边实际工作



习仲勋

中锻炼两三年,将再次调我回北京工作。我心领了他的一番好意,没有料到的是,当1962年8月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传达下来时,说习仲勋是“利用《刘志丹》小说反党”的反党分子。于是,随即在西安召开的陕西省委扩大会议上,理所当然地要我在会上作出交代检查,我也理所当然地作了如实的交代检查。虽则当时还没有批斗之类过激的行动,但我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已经改观了。新调来的地委书记一到任,就严肃地向我宣布省委关于调我到陕西日报工作的调令。

那个时候,从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彭德怀,并发动了全国性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我被所



朱德同志题词石刻

谓“反党分子习仲勋”秘书的政治压力也压得灰溜溜的。

我更是理所当然地戴上了“反党分子习仲勋的黑瓜牙”、“参与炮制《刘志丹》反党小说的三反分子”等等帽子。“喷气式”、“棍打鞭抽”、“拳打脚踢”、“太阳底下跑步”、“打扫厕所”、“住牛棚”……我被打得休克过三次，以致我从中居然体会到了死亡的滋味。

《刘志丹》书稿后来的经过是这样的：正当1962年7、8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前夕，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看到了《刘志丹》小说送审样书时，就有了不同意见，认为小说中涉及的西北历史问题，“很多原则性问题与历史不符”，因而不赞成出版这本书；同时他又在《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发表了《刘志丹》小说中部分章节。阎红彦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之一，当然是很有发言权的。他一面向全总和团中央建议停止刊载，一面报告康生，康生得知这一情况后，虽则他并没有看过这部小说，却立即断言：“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那时，毛泽东正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康生投其所好，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说这是为高岗翻案的书。利用《刘志丹》小说反党。毛泽东念了康生所写的条

子，并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从此，“利用《刘志丹》小说反党”就成了最高指示；从此，成立了以康生为主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委员会”；从此，不仅该书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为首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均被指责为小说的主持人和幕后策划者；从此，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经过一段停职检查后，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背着那莫须有的“反党野心家”罪名，受审达16年之久；从此，全国被株连受害者成千上万人。

一桩新中国现代文字狱的“罪状”是：一、《刘志丹》小说是“伪造党史”，把陕甘边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二是《刘志丹》小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三和四是《刘志丹》小说中的“罗炎、许锺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

历史终于 大白于天下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经邓小平批示重新审查此案。1978年10月，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审读了《刘志丹》小说后所作的审核报告中

指出：“总的看，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和基本政治倾向是好的，有意义的……把这部小说定作毒草的四点理由是和小说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1979年6月，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认为“《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意见，是完全正常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报告提出，因小说《刘志丹》案而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该恢复名誉，给予平反。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向全党批转了这个报告。

康生为什么对一贯忠于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如此仇恨而狠毒？这是十分值得令人深思的。我在编辑《习仲勋革命生涯》这本书时，发现梅行为习仲勋而写的回忆文中所说的：“固然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有关。但令人怀疑的是，康生这一阴谋家……很难说他不会由于在整风审干和土地改革两大运动中，因仲勋同志反对他的错误作法而怀恨在心，利用机会煽风点火，使用诡计，把人整倒。”

我想，要在今天为康生这起阴谋报复、诬告陷害案取证不是很困难的。四十年代曾在陕北绥德地区工作过的同志们对这两大运动中习仲勋正确掌握党的政策，反对康生在这两大运动中执行的极左政策，还历历在目；当时习仲勋向党中央、毛泽东所写的多次文字报告，尚有案可查。（责任编辑：杜晋）

美国总统特使 赫尔利访延安

● 金牛

1944年11月7日下午，3点钟左右，一架美军运输机出现在湛蓝天空中。飞机在城外简易机场上空兜了一个大圈后，平稳地滑落在停机坪上，舱门开后，一位美国将军出现在舷梯的顶端。此人个头高大，头发灰白，精制的军服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勋表。他就是帕特里·丁·赫尔利少将。他一走下舷梯，就对着迎接他的人们发出一阵莫名其妙的怪叫声。

大约是在半个小时后，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正大步地走过来，人们自动地为他让开一条路。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赶紧向赫尔利介绍说：“他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赫尔利立刻习惯地拉开他那居高临下的架子：“主席先生，你好！”毛泽东却不卑不亢地握住他的手：“欢迎你访问延安。”面对着这位穿着一件灰布军衣的中共领袖，赫尔利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他竟一时有手足无措。

连接机场和中共中央驻地的是一条沙石铺的公路，汽车上下颠簸着。一路上赫尔利手舞足蹈、东拉西扯地向毛泽东述说他的经历。毛泽东话不多，只是偶尔说上一两句应酬，他好像在考虑着什么。

的确，毛泽东这时正估量着这位美国总统的特使。毛泽东早就认识到，打败日本后，美国将取代其他

列强，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必须抓住美国需要中共对日作战这一契机，争取与美国建立起较好的关系，以促使美国不支持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早在1942年春罗斯福的特使居里访华时，毛泽东就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邀请他访问延安。此后周恩来多次向美国官方代表表示，中共欢迎美国在延安设立一个官方机构。经过多方努力，1944年罗斯福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美国向延安派遣了一个美军观察组。在第一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到达延安时，《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毛泽东亲自在标题“欢迎美军观察组”后面加了“的战士们”几个字。毛泽东当时设想的是先与美军建立军事合作，然后再发展与美国的全面关系。

赫尔利一到重庆，毛泽东就在延安窑洞里密切注视着赫尔利在重庆的举动。

1944年夏天，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闹的已不可开交，罗斯福决定再让赫尔利到重庆斡旋，以使史迪威得到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可赫尔利到重庆后为了得到驻华大使的职位，他给罗斯福写了一个报告说：“在中国没有哪一位领导人能像蒋介石那样与您友好合作，如果美国政府继续支持史迪威，就会失去蒋介石，这也意味着失去



赫尔利

了中国。”结果罗斯福终于下决心将史迪威调离中国战区。

赫尔利在帮助蒋介石赶走史迪威后，很快便与重庆的中共代表建立了联系。在与董必武和林伯渠的多次会见中，赫尔利对中共的民主改革和抗战业绩大为赞扬，说中共是“中国真正代表民主的爱国力量”，一面又吹捧蒋介石是“全国公认的抗战领袖”，如果蒋介石与毛泽东能见面，国共纠纷并不难解决。

毛泽东从中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政策的基本点还是要扶持蒋介石，但美国有求于中共，只要我们不反对蒋介石当领袖，美国会作出一些对我们有利的让步。因此毛泽东指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向赫尔利发出访问延安的邀请。

现在，毛泽东看着还在那里叽哩哇啦不停的赫尔利，心中对罗斯福的用人之道实在不敢恭维。他转头对周恩来说：“晚上的欢迎会搞的热闹些，会后你到我那里去。”“主席，今天是十月革命节，晚上原定要开庆祝会，你看能不能一起搞？”周恩来小声询问。毛泽东说：“那就一起搞吧，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了。”

晚会开的十分热闹。来自苏联、英国和美国友人几乎都到场了。赫尔利特别兴奋，他一会儿与中共领袖们交谈两句，一会儿又发出几声印第安人“耶乎”那种呼叫。他的举止使坐在旁边的毛泽东又一次感到不舒服。

晚会结束已是深夜了，当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窑洞里时，毛泽东带着些讥讽地说：“我看赫尔利是个地地道道的政客，浅薄的很，对他的一些话不能太认真。”周恩来附和道：“我也有这种感觉。明天的谈判可以先摸摸他的虚实。”“对！我们基本方针不变，谈判中走一步看一步。”

第二天谈判一开始，赫尔利便迫不及待地首先发言：“我是代表罗斯福总统到中国来帮助你们中国人抵抗日本的。现在中国迫切需要的是团结。在我多次劝说下，蒋委员长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同意我到延安来与毛泽东先生会谈。”说到这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国共协议草案，念了一遍后便顺手交给毛泽东。这份协议草案的要点是中共应交出军队，然后国民党可以承认中共为一合法政党。

毛泽东接过草案看都没有看一眼便问赫尔利：“这个东西是谁起草的？”赫尔利顿时语塞。草案最初的确是他起草的，但蒋介石看后认为，草案过多地宣扬了美国的民主，没有强调他要实现军令政令统一的原则，因此指示宋子文和王世杰等对赫尔利的草案作了重大的修改。深谙美国人秉性的宋子文，担心赫尔利看过后又要修改，所以直到赫尔利登上延安的飞机时，才将修改过的草案交给他。这样赫尔利即使不赞成国民党的改动也来不及了。这时赫尔利从毛泽东尖锐的提问中

感觉到了问题，但也只能含糊其词了：“是我起草的，当然蒋委员长也看过并表示了同意。”

毛泽东立刻看出了赫尔利没说实话，他断定赫尔利是被蒋介石或是蒋的部下给要了，需要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上一课。想到这里毛泽东缓缓地说：“上午就到这儿吧，下午我们再给赫尔利先生一个答复。”

在下午的会谈中，毛泽东侃侃而谈。他先是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和国共矛盾的历史，然后指出：“中国需要团结，也需要民主，中共更愿意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共同抗战的协议，但条件是必需改组现在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组成一个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说到这里时毛泽东加重了语气，“赫尔利先生的草案中说要改组我党的军队，其实真正需要改组的是国民党的军队，因为八年的战争证明这支军队太腐败、没有战斗力。”他接着嘲笑，说：“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每人每月的薪水才够买一包香烟，我军怎么会要求与这样的军队同等待遇呢？真要那样的话，我们的战士也会像国民党兵一样被饿的走不动路。”

赫尔利如芒在背，他终于忍不住为蒋介石辩解起来：“我认为毛泽东先生对蒋委员长的批评是在重复我们的敌人的话，他们才这样攻击中国的抗战领袖。”毛泽东立即反驳说：“我重复的还是贵国总统和邱吉尔首相说过的话，贵国舆论对此有不少报道和评论，我想赫尔利先生对此是不会陌生的。我们欢迎美国朋友来帮助中国团结，但要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当然也是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而不是作独裁者的说客。”毛泽东那种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使赫尔利没有再开口。会谈就在这种僵持的气氛中结束了。

第二天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了第三次会谈。经过昨天的交锋，毛泽

东与赫尔利都清楚地了解了对方的立场和基本态度。在互相寒暄几句后，毛泽东点上一枝香烟，悠然自得地抽了起来。赫尔利可没那么沉得住气：“我仔细考虑了主席先生昨天的谈话，”他不等主人开口便抢先说到，“我相信主席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当然……蒋委员长也是一位爱国者，只要主席先生能与蒋委员长见面谈一谈——我相信那将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会面，国共两党就一定能克服分歧。”

“我很愿意到重庆去看一看委员长，已经有十六、七年没见面了，有些事情还是见面谈谈才能解决。可就这么去见也不现实。我看我还是先搞个协议，如果委员长能接受，我就到重庆去同他一起签字。”

“太棒了！”赫尔利忍不住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几乎不敢相信毛泽东的话。他最担心毛泽东的是让他空手而回。在来延安的前一天晚上，他还给罗斯福发了一个电报，声称“解决国共纠纷是大有希望的。”昨天碰了一鼻子的灰以后，心中一直在盘算怎样才能使毛泽东回心转意，没想到毛泽东现在这么痛快就答应下来。

这时周恩来将昨晚准备好的一份协议草案交给赫尔利。在翻译的帮助下赫尔利很快地看了一遍。“这下更有把握了！”他心中不禁一阵暗喜，“看来中共不像蒋讲的那么可怕么。他们这些要求说到底不就是要参加政府吗？老蒋误会了。”他急忙向周恩来说：“我看这里还要加上几句罗斯福总统倡导的四大自由。”“请翻译同志把赫尔利将军的这段话加上去。”周恩来吩咐着。

一份修改好的协议草案放在赫尔利面前。“将军还有什么要改动的吗？如果没有就请你和毛泽东主席一起在上面签字。”听到周恩来的询问，赫尔利迫不及待地拿起笔来。他

刚要落笔，又有些不放心。“你们真的同意蒋委员长继续做国家的最高领袖吗？”赫尔利问毛泽东。“他还做他的委员长，国民党还是政府中的第一大党。就怕他还不知足哟。”毛泽东略带点儿嘲讽地答道。“我来说服他。”赫尔利一



1945年8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赫尔利、张治中在延安机场

边说着，一边在协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他根本没有听出毛泽东话里的话。随后毛泽东也在协议上签了名。赫尔利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他将协议草案的副本匆匆地装进公文包里。毛泽东告诉他：“明天周恩来先生与你同机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怎么样？”赫尔利又是一阵惊喜：“OK！毛泽东先生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赫尔利一回到重庆急不可待地去见蒋介石。蒋介石看过赫尔利与毛泽东达成的协议后，气急败坏地指着赫尔利说：“你上了毛泽东的当了，搞联合政府就是要我下台，让国民党政府完蛋！中共要交出军队，我能给毛泽东的就是中共可以成为合法政党。”

赫尔利开始是惊愕、不服气。见蒋介石已经断言决不考虑他与毛泽东达成的协议，赫尔利慌了，只好想办法要中共再做让步了。他在转交了国民党的反建议案后告诉周恩来：“现在大批美国飞机要到西北去，只要你们接受了这个方案，我们美国就会向你们提供援助。”周恩来不动声色地反问一句：“如果我们的

军队没有了，要那些东西做什么？”看着赫尔利无言以对的窘态，周恩来缓和一下口气说：“我理解将军急于要达成协议的心情，我愿向毛主席报告这里的情况，一有决定便通知你。”

12月1日深夜，毛泽东在煤油灯下仔细阅读着刚收到的周恩来来电。周恩来在电报中是提出，如要争取达成协议，可对国民党的方案提出复案，然后利用赫尔利进一步向蒋施加压力。是啊，美国人急着要国共合作，赫尔利固然可以利用，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马上就达成协议时机不是特别有利。

此时此刻，陈毅的一封长达13页的信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信中说：“美国目前的企图不过是全部着眼他的军事利益，其全部政治见解仍是保持蒋介石的统治体系。美国是认为我们的军事力量必须动用，赫、毛、蒋协定只不过是动用我们军事力量的一个工具，并无诚意要蒋改革政治。以美方的意思仍是以极廉的代价而达大量花费中国、特别是花费我们力量的目的。这是美帝国主义玩弄的极精巧的商业手法，惯

会牺牲别人替自己打仗。目前我们仍是拖下去，拖死蒋，招美依我，而我取得全局中心地位。”

毛泽东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写的好！有远见，有气魄。独立自主，以我为主，这就是我们外交的原则。没了这两条，我们就是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还是不能独立。”

毛泽东当即给陈毅复信：“来信读悉，启示极多。周、董均回，拖一时期。基本方针如你说的那样，除此再无二道。”写罢看了一遍，又接着起草了给周恩来的电报“过早交复案不利，俟七大以后再议复案，请周恩来、董必武同时回延。”

周恩来遵令返回延安。12月7日，赫尔利赶到机场，还想利用送行的机会，再次争取周恩来能给他个保证。然而周恩来只是告诉他：“回到延后我会将我党中央的决定尽快通知你。”望着周恩来乘坐的飞机逐渐消失在云雾里，赫尔利忽然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在延安的共产党人，与在重庆的国民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中国人，他从毛泽东那里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责任编辑：刘文）

柳亚子和 毛泽东的诗交

● 冯锡刚



穷荒自守整贞节

柳亚子得与毛泽东结识，是在1926年5月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在此之前，柳已是颇具名望的南社巨擘，反清反袁的斗士；毛小他6岁，因主编《湘江评论》而为世人瞩目，参与中共的创建，是农民运动的实际主持者。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潮流促成了两人“饮茶粤海”的交往（柳为国民党中央监委，毛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据柳自述，会议期间，他已洞察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狼子野心，向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力主“狙击”而除之。柳确有过人的辩才，广州初识即认定毛为中国革命之英才。三年之后，毛从事“井冈山的斗争”时，远居上海的柳以“湖南赤帜正纵横”，“并世支那两列宁”（柳自注：两列宁指孙中山和毛泽东）的诗句推崇备至；毛虽不赞成柳力主的暗杀手段，但对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及嫉恶如仇的正义感表示钦佩。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在迭经坎坷之后，以共产党和红军的实际领袖成为抗日救亡的擎天一柱。1937年夏，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何香凝，从上海托人向

远在数千里之遥的陕北的中央领袖赠送文房四宝和自己创作的画集和词作，表示敬意和热忱。这年6月25日，毛泽东亲笔函复，其中提及睽违十一年之久的柳亚子：“看了柳亚子先生的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拿句老话说叫人中麟凤，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在何香凝存赠画集中有一幅数年前与廖承志合作的《子卿牧羊图》，上有柳所题七绝一首。

大漠黄沙蔽故山，
羝羊牧尽待生还。
穷荒自守坚贞节，
终见扬旗入汉关。

苏武牧羊是人皆知晓的历史故事。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何柳的诗画确是为着弘扬“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民族正气。毛泽东在复信中予以高度评价，着眼点正是“有骨气”。在毛看来，“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翻遍一部《柳亚子诗词集》，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也是在这一年，柳所作《为人题词集》七绝一首最能显示其风骨和气节：

慷慨悲歌又此时，
词场青兕是吾师。
裁红量碧都无取，
要铸屠熊制虎辞。

难怪毛泽东要引为同调，认为自己的诗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了。

柳亚子在上海的“活埋之庵”（仿效明末抗清志士王船山之举）过了三年“活埋生活”，虽足不出户，但时时关注时局的演变，更不乏血性诗文。哭朱惺公，悼郁曼陀，挽茅丽瑛，这些颂扬抗日烈士的诗章无一不从心灵深处发出“不原做奴隶的人们”的呐喊。1940年12月，为避日寇的加害，柳亚子举家赴香港，与

何香凝等志士重逢。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柳与宋庆龄等联名拟出宣言，抗议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对蒙受“千古奇冤”的新四军将士表示声援：“自坏长城擅道济，曾摧强虏霍嫫姚。”2月初，柳亚子拒绝重庆当局之召，公开致电，发出“终不愿向小朝廷求活”的正义之声。蒋介石恼羞成怒，以“反对国策”的罪名将柳开除党籍。这不但不能使柳屈服，相反激起了他更加强烈的谴责。他的心和中共贴得更近了。这年11月，柳赋七律一首寄延安，赠毛泽东兼柬林伯渠、董必武诸老：

弓剑桥陵寂不哗，
万年枝上挺奇花。
云天倘许同忧国，
粤海难忘共品茶。
社断房谋劳午夜，
江毫丘锦多名家。
高山诸老欣能健，
白头相期莫复华。

毛泽东展读之下，为诗人真挚的情谊和深切的期冀所感动。三年之后，毛泽东在致柳亚子的书信中还分毫不差地记得这些诗句：

亚子兄：
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敬祝

健康！

毛泽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柳展读毛信函时，正值时局紧张之际，“空气又趋沉闷，听说谈判没有结果，董老和周恩来都还去了。接着，敌人在黔桂路猛进，独山失陷

以后，重庆也紧张起来，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可以想见，毛泽东的信将给他带来怎样的精神力量。在次年5月寄毛泽东的诗中，诗人唱出了明亮欢快音色：

工农康乐新天地，
革命功成万众和。
世界光明两灯塔，
延安遥接莫斯科。

重逢握手喜渝州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自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等举行世人瞩目的国共谈判。此时在重庆的柳亚子是怎样的心境呢？据他自述，“觉得苏联参战太迟，日本投降太早，弄成中国内战恐难幸免的局面，是非常悲观的。……怀疑到毛（泽东）先生这次来，到底是不是能够完成他伟大的任务呢？”柳毕竟是一位与蒋介石打过交道的民主活动家，对于瞬息万变的1945年8月，不像一般人那样只是兴奋和惊讶，而是较为深沉的悲观和怀疑。尽管如此，他不能不为毛泽东的胆略感佩。8月28日毛泽东赴渝当天，柳亚子读到《新华日报》号外，就无时不在盼望能与阔别19年的毛泽东晤叙。30日下午，“毛先生亲自到来，我和他单独谈了一次话，觉得他这次是抱着大仁、大智、大勇三者的信念而来的，单凭他伟大的人格，就觉得世界上没有不能感化的人，没有不能解决的事件。所以，经过这次的谈话，便把我心中的疑团完全打破，变做非常乐观了。”正是怀着这样的激情，“这夜又是失眠竟夕，却在枕上做成了送给毛先生的一首诗”：

阔别羊城十九秋，
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移，
遍地劳民乱倘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
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
一笑昆仑顶上头。

诗人的欣慰、感佩、乐观之情化为铿锵的诗句从胸臆间汨汨流出，“说也奇怪，自从和毛先生见面以后，我的心境完全转变了”。以这首七律为标志，柳毛的诗交出现了一次高峰，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的一支别有韵味的插曲。

毛泽东在紧张的谈判之余，数度与柳亚子晤叙，论政衡文，既在交换政见，又为调剂精神。柳由原先悲观、怀疑一变而为“信任中国内部没有存在着不能解决的问题，还不必诉之于武力了”，毛则时以“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海诫。

10月初，毛泽东在红岩嘴又一次与柳亚子作推心置腹的长谈，周恩来与王若飞亦在场，多所慰勉。柳返回宅第，心情激动，万感交集，赋七律两首奉赠：

后车载我过沅溪，
骏骨黄金意岂迷。
兴汉早闻三足鼎，
封秦宁用一丸泥。
最难绝叔能知管，
倘用夷吾定霸齐。
心上温馨生感激，
归来絮语告山妻。

得望光风霁月中，
矜平躁释百忧空。
与君一席肺腑语，
胜我十年萤雪功。
后起多才堪活国，
颓龄渐老意犹童。
中山卡尔双源合，
天下英雄见略同。

柳多诗人气质，刚直而欠沉稳，热烈而乏坚韧，一个月前因“毛先生做着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而我自己还是一介书生”而“哪得不自惭形

秽”，在与毛泽东数度晤叙之后，感激之余则又生发“倘用夷吾定霸齐”的自负之语了。

毛泽东接读柳亚子的书信和赠诗之后，即予函复。这是一封极能显示政治家而兼诗人本色的书信，论政衡文的同时，嘘寒问暖，善解人意，备极关怀之情：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卓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颂
兴居安吉！

毛泽东

十月四日

柳亚子接读复信，于6日赋诗致函，再次向毛泽东索和。在他看来，经由斯诺的《西行漫记》介绍而面世的长征诗足见毛泽东精于此道。在自己，自8月30日以来，已接连三次赠诗，其执著之情可以想见。这第三次赠诗依然是七律：

瑜亮同时君与我，
几时煮酒论英雄？
陆游陈亮宁卓视，
卡尔中山愿略同。
已见人民昌陕北，
何当子弟起江东。
寇莱玉帛葵丘合，

骥尾追随倘许从。

此诗一如前诗，既有“瑜亮同时”的自负，也有“骥尾追随”的热忱。总之，这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颇能显出诗人的本色。

毛泽东接读之后，即于次日回复一首词，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10年间的多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至少先后把这首词书写过四次。

柳亚子对咏雪词有“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乎”之叹。在稍后毛为其纪念册题写此词墨迹之后赓韵一首：

廿载重逢，一阙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土，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林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毛泽东咏雪词非正式公开发表在重庆的《新民报晚刊》上，引起多方关注。国民党当局出于政治需要，以唱和之名，行誉毁之实；进步文化界则以唱和驳斥辩正。一时间唱和四起，毁誉交加，成为诗坛乃至思想界一场别开生面的笔战。柳亚子在一份题为《答客难》的未刊手稿中，痛快淋漓地驳斥了“帝王思想”

的攻击。

毛泽东对“国民党骂人之作”有“鸦鸣蝉噪，可以喷饭”的蔑视。13年后，又作“自注”如下：

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来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

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此，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咒骂这些人吗？别的解释是错误的。

末之句，是指无产阶级。

落花时节读华章

“双十协定”签订，蒋介石还都南京，政治斗争的中心由重庆转移宁沪。柳亚子于这年岁末飞抵上海，以民盟中央委员的身分从事民主活动。这期间他还是不断将近作寄赠延安的毛泽东。

柳亚子呈于毛泽东的印章有这样两方：一方为“兄事斯大林，兼富毛泽东”，另一方为“前身称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印文典出《后汉书·祢衡传》，为防误解，柳特于印章边款说明，中有“绝不不敬之意”等言，以表达自己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敬爱和亲近之情。

在民主与独裁、光明与黑暗这两种命运决战的三年间，毛泽东指挥若定，所向披靡，从杨家岭迁向西柏坡，全国胜利在望。柳亚子的政治活动，在他的一生中也达到了高潮。1947年秋，何香凝、李济深在香港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特联名写信给柳亚子等人，“盼先生等迅即来港，与何香凝等进行紧张的筹组工作，成为民革的创始人之一。1948年5月1日，中共发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柳亚子等125位居港民主人士发表声明热烈响应。

1949年2月，毛泽东电邀柳亚子北上共商开国大计。



1949年5月5日，毛泽东宴请柳亚子、朱德作陪

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由西柏坡抵北平。柳亚子与许多民主党派领袖赴西苑机场迎接，当晚毛泽东在颐和园益寿堂与柳亚子等欢宴，共庆胜利。宴罢归来，柳亚子诗心激盈，夜不能寐，赋七律四首抒怀。出人意料的是，仅仅过了三天，3月28日，柳写出首既带来毛与之唱和的莫大荣耀，也生出种种猜度的《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
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
无车弹铗怒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
肝肺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
分湖便是子陵滩。

此诗之有牢骚，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于日理万机之中关怀这位诗友，4月29日唱和一首：

饮茶粤海未能忘，
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
观鱼胜过富春江。

在毛泽东唱和的前几天，柳已从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益寿堂，毛对于“出无车”的抱怨还是很注意倾听并加以改善的。5月1日，毛泽东偕家人看望柳亚子，谈诗之余，又同去昆明湖划船，尽欢而散。6月5日，毛如约派田家英接柳亚子夫妇赴宴，朱德等作陪。“谈诗论政，言笑极欢，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也！”毛泽东在筹划开国大业的日理万机之中，又是唱和，又是探望，又是邀宴，显然为的是消解柳的牢骚。

柳自然极为感激毛的一片挚情，4月29日接读毛的和诗后，即次韵一首，有“东道恩深敬淡忘”之句。次日，又赋《选韵亲呈毛主席》：

昌言吾释心肝赤，
养士君倾醴酒黄。
陈亮陆游饶感慨，
杜陵李白富篇章。
《离骚》屈子幽兰怨，
风度元戎海水量。
倘逢名园长属我，
躬耕原不恋吴江。

值得注意的是，柳以屈原的《离骚》表示对“牢骚太盛”的保留意见。可以引为佐证的是，柳在6月6日柳作七律中有“英雄惯作欺人语，示必牢骚便断肠”之叹。柳之“牢骚”究竟出何种原因，这是一个需要专门论述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柳的自视过高和直使性，坐而论道当无大碍，于实际的政务则难以胜任。在后来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显然是考虑到这种实际情况的。

得到毛泽东的关怀（虽然在柳看来尚有误解之处），柳之情绪大有改观，5月5日赴宴归来以毛诗之韵赋七律两首敬呈，其中第一首曾一度误为引出毛之唱和的原作。此诗高昂激越，为人民的胜利再放歌喉：

卡尔中山两未忘，
斯毛并世玄黄。
生才西德推圣贤，
革命中华赖表章。
粤海咸京堪比例，
蒋凶托逆漫评量。
腾观今日新天地，
澎湃潮流沸海江。

末句全以水部之字组成，确有沛然而下之势。柳对毛唱和之韵一再再用，竟至46首之多。

在开国前的几个月里，柳与毛还有一次诗歌和书信交往。5月19日，柳呈毛七律一首，内有“藏山修史谋宁拙”，“欲借头衔荣父老”等句，主要是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参与筹组中央文史馆，二是在行将成立的江苏省新政府中任职。隔了两天，毛复信坦诚相告：“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益恐费力不讨好。江苏虚衔，亦似以不持为宜，挂了于已于人不见得有好处。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得太冷否？”柳的两项要求均未能如愿，自是怏怏不乐，当天日记中有“毛来

信，颇有啼笑皆非之慨”等语。身处人民大革命胜利的时代，个人际遇究难终日萦怀。他在答友人的诗中有这样的表示：“忏除结习吾知免，不作苏俄叶赛宁。”（相传诗人叶赛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对现实失望而自杀）柳还要努力讴歌人民的胜利。

最喜诗人高唱至

柳亚子在1949年9月下旬出席首届政协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此前后，柳因神经衰弱症复发而有将近一年时间中断写作，但与毛泽东仍有书信往来。

到了1950年9月，柳病体渐愈，常有讴歌新中国及人民英雄之作。10月3日夜，柳在怀仁堂观看了少数民族文工团联合演出的歌舞晚会，兴致颇佳。坐在他后一排的毛泽东见状，即嘱赋诗以纪大团结之盛况。才思敏捷的柳亚子沉吟片刻，当场以《浣溪沙》应命：

火树银花不夜天，
弟兄姊妹舞翩跹。
歌声唱彻月儿圆。
不是一人能领导，
那容百族共骈阗？
良宵盛会喜空前。
毛泽东展读之下，即步韵唱和：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柳亚子在10月4日和5日接连两个夜晚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女士主演的《和平鸽》歌舞剧之后，又以《浣溪沙》一阙表达“欣赏赞美之不尽矣”之情：

白鸽连翩奋舞前，
工农大众力无边，

推翻原子更金圆。
战败集团仇美帝，
和平堡垒拥苏联。
天安门上万红妍！

毛泽东读到此词已在一个月之后了。看到老诗人的以如此热情表示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又联想到人民志愿军10月下旬入朝参战后的时局，诗意又来，再度奉和：

颜回齐王各命前，
多年矛盾廓无边，
而今一扫纪新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
正和前线捷音联，
妙香山上海旗妍。

“最喜诗人高唱至”，这是毛泽东对柳亚子的热烈赞扬和殷切勉励，事实上，这首词在柳丰富的作品中决非上乘之作，至少较之那首“纪民族大团结盛况”的前调要远为逊色。毛泽东如此热烈赞许，更多的是看重作品的倾向。

由于健康的原因，柳亚子的歌喉未能为新中国唱得更长久。大约从1951年2月起，诗人很少再有诗吟。他和毛泽东的诗交，止于1954年2月20日的《鲁迅赠诗手迹题识》。柳在题记中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全体同志原以此幅献之于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主席、朱德总司令以表崇敬之忧。此举深获我心，引为光荣，特竭诚奉献并恭志数语云尔。”

这幅题诗就是脍炙人口的《自嘲》，鲁迅先生于1932年手书“请亚子先生教正”。“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书写过这联诗句。

柳亚子以鲁迅诗篇手迹奉赠，这为他们近30年的交往（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诗交）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责任编辑：仲文）

伟哉！ 三峡的

文物 保护工程

● 王兆麟

当全国人大对兴建三峡工程作出历史性决定之后，国家文物局就立即对三峡库区文物的抢救、保护工作进行了周密地组织安排。首先部署四川、湖北两省文物部门在三峡库区开展大规模的文物普查，确定文物保护重点。随后，三峡建设、文物等部门又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负责三峡文物保护的规划工作，并组织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30 多家科研单位和高校，划分地段和任务，从 1993 年 11 起，300 多位专家陆续分赴淹没区进行调查、勘测、试掘和资料收集整理。

据统计，三峡工程淹没区共发现文物点 1208 处，其中地面文物 441 处（古建筑 215 处，石刻造像 123 处，桥梁等 103 处）；地下文物 767 处，（古遗址 460 处，古墓葬 307 处），地下文物的埋藏总面积达 2200 余万平方米。

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说：三峡地区的文物从猿人化石开始，经过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一样，同

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

五十年代，在四川巫山县长江南岸大溪镇，考古工作者清理古墓 201 座，出土了距今五、六千年风格独特的红陶、彩陶器物一千多件，被命名为大溪文化。填补了新石器时代这个地区人类发展的空白。

1985 年，在巫山县大庙区龙骨坡，考古工作者又在更新世早期的洞穴堆积里，采集到直立人的门齿及一段带两个牙齿的下颌骨化石。在同一层位还发掘出石制品及巨猿等 116 件哺乳动物化石。经测定，其年代为 204—201 万年前。巫山猿人化石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直立人化石，是早期人类的一个新种。为人类起源于亚洲提供了有力的新证据。

三峡大坝开工前对坝区作抢救性发掘时，在坝址所在的中堡岛发现了厚 3.5 米、有 13 个叠压关系十分清楚的文化层，从距今 6000 多年的原始社会开始，至夏、商、周以迄元、明、清的历史文化遗存俱全，考古专家惊喜的称：中堡岛是一部埋藏在地下的“中国通史”！而在附近的杨家湾，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刻在陶器上的象形文字，比商代殷墟甲骨文还早 2000 多年。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说，新石器时代在这里共发现遗址 73 处。这次对忠县干井沟、奉节老官庙、巫山县魏家梁子等遗址试掘，发现它们是与大溪文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类型（现在还没有正式命名），其陶器制造工艺和生活习惯全然两样，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使长期处于空白的川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日趋清晰。它和大溪文化的不同分布状况，还成为古代楚与巴、楚与秦分界线的历史基础。这对探知中国文明起源以及历史沿革具有重要价值。

巴人千古之谜 将揭开

三峡地区是中国古代巴族的聚居之地。但过去发现的遗址，巴人中心在哪里也搞不清楚。俞伟超介绍，这次考古工作者在三峡库区发现了夏、商、周时期巴人遗址 168 处。经钻探试掘，有些遗址面积大得惊人。像小三峡大宁河边的双堰塘遗址，占地达 10 万平方米，是距今 3000 年左右的巴人经济文化中心。在它的附近还出土了相当于商代的高达 80 多公分的大型铜器，其工艺造型跟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发现的蜀人青铜器非常相似。

在云阳李家坝，专家们还找到相当于 4000 年左右的巴文化遗址，面积约 5 万平方米，附近还发现一处战国时代巴人基地 300 多座，这是巴人又一处经济文化中心。另外在奉节、忠县、涪陵等地都发现了不少稍晚期的巴人文化遗存。像涪陵小田溪基地规模之宏大，随葬品之

丰富，说明这里可能是巴人贵族墓地，甚至是巴王室陵墓区。

俞伟超认为，巴人于湖北长阳县的清江流域（宜昌之南），由于江汉平原的楚人逐渐发展扩张，巴人被逼西移，到今涪陵、重庆一带过着渔猎生活，至战国时，开始与汉族融合。

汉唐城址的 重要发现

过去汉唐城市考古多局限于北方，这次库区发现的汉胸忍故城市和唐代明月坝市镇遗址，则是一个重要突破。

《汉书》记载，位居三峡库区有十多个县城，这次经过调查试掘，已确认了云阳境内的汉代胸忍县和万县境内的南浦县。在云阳李家坝遗址的汉代地层中，清理出一块西汉时期的“胸忍丞印”封泥（封缄简牍并加盖印章的泥块），从而证实了古籍关于这个川东著名大县的可靠性。明代有人考证胸忍故城址在今

云阳县城西 15 公里之旧县坪，这次探明该遗址面积达 100 万平方米，试掘表明地下遗存非常丰富，有大批房址、建筑材料和铜器、钱币。

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面积为 10 万平方米的云阳明月坝遗址，不仅出土大量唐代陶瓷器和建筑材料，还发现一片卜甲，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晚的卜甲，学术价值很高。

世界罕见的 水下文物

有“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水下碑林”之誉的白鹤梁，它位于涪陵城北长江水中，是一条东西长 1600 米、南北宽 10 余米的鱼脊形石梁。上面刻有自唐代广德元年（公元 763 年）至 20 世纪初的 1200 年间 72 个枯水年份的水文资料，共 170 多段。此外，梁上还刻有历代书法家、文学家 300 多人的诗文 3000 多字，颜、赵、苏、黄，楷隶篆草竞相媲美。石刻下部镌刻有两条一米多长的线雕鲤鱼，雄前雌后，作沿江上溯状，这便是古代枯水水位的观测标记。由于三峡建坝后水位提高，白鹤梁将永居水下，1993 年春枯水时节露出水面时，人们认为这很可能是白鹤梁最后一次重见天日，短短几天时间引来了数万人前来观赏探奇。

在库区内从西向东还有重庆灵石、长寿县莲花石、丰都县龙床石、云阳县龙脊石等水下题刻，构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绵延数百里的水下碑廊。其中以重庆灵石最早，始刻于东汉初年，清末民初曾露出水面一次，此后一直深藏水下。其中位置已在朝天门码头下查明。

沿江古建和石刻 石窟称足珍贵

经调查，三峡库区沿江两岸，依



屈原祠

山面水保存着大量的古建筑,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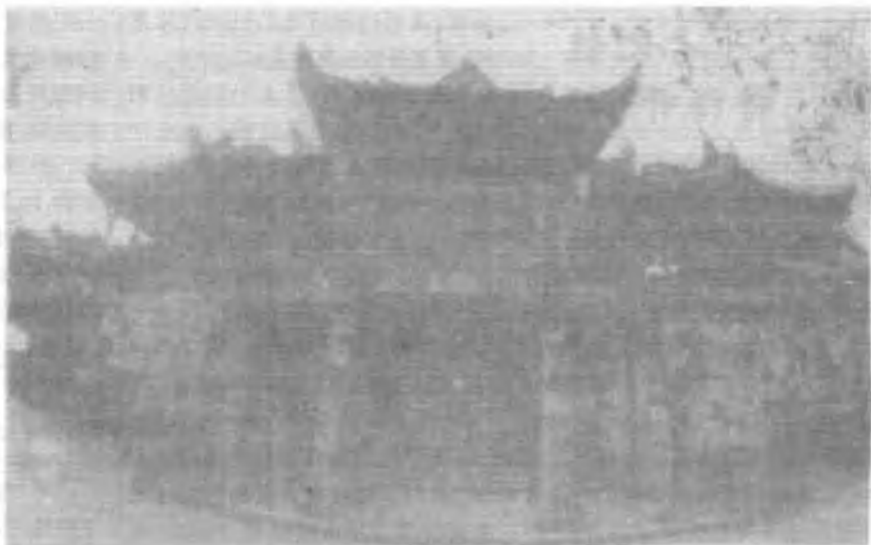
库区内现存最早的地面建筑是忠县的无铭阙和丁房阙,在全国不足30处的汉阙中,此地就占了两处,其重檐结构的建筑,为国内仅存汉阙中所特有的。

忠县石宝寨为明代万历年始建,它镶嵌在孤峰突起、四壁如削的玉印山临江一侧。十二层塔式楼阁,层层叠叠,附山而起,直插山巅;红墙灰瓦,绿树碧波,交相

辉映,人们认为石宝寨是三峡风景最美的地方。门前有“必自卑”三字石坊。此句源自《礼记·中庸》中“登高必自卑”,颇有深意。整个设计布局匠心独具,有“长江明珠”之誉。

云阳张飞庙始建于蜀汉末年,依山临江,林木葱郁,环境清幽,崇楼峻阁,保存完好。最奇的是山门西开,呈“斜门歪道”,其寓意为张飞西望蜀都、忠于刘汉之意。

人们熟悉的奉节白帝城始建于



丰都鬼城

唐以前,三国时刘备伐吴兵败退守于此,临终时在此托孤于诸葛亮。好在建坝后水位只淹至城墙边,届时白帝城将成为扼守夔门的水中之岛,游人仍可在此领略“朝辞白帝彩云间”之意趣。

其他古建筑还有著名的秭归屈原祠、小三峡的大昌古镇、秭归滩民居,以及重庆弹子石大佛、瞿塘峡峡壁石刻、忠县的临江岩和下岩寺摩岩造像,还有大量的古代桥梁、栈道、牌坊、塔寺、城墙、城门等,均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抢救保护 刻不容缓

俞伟超说,根据对三峡淹没区文物的调查试掘,充分表明三峡地区文物密集,名类繁多,其价值之大:堪称“一部完整的中华民族历史的缩影”。要在15年内分期分批对2200万平方米的古遗址、古墓葬进行发掘;对213处古建筑、123处石

造像及103处其他地面文物进行测验、拆迁。按常规要几十年以至上百年才能做完,而现在需赶在坝区水淹之前完成,确实是件极为艰苦、复杂而紧迫的系统工程。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三峡工程已经开工,再过两年多时间到大坝合龙截流,首先被淹对设的78处文物点要立即开始抢救。不久前,贾兰坡、侯仁之、苏秉琦、任继愈、郑孝夔、罗哲文、张镈、谢辰生等3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曾联名发出呼吁,要求中央及有关领导部门尽速解决三峡库区文物抢救、保护工作中的紧迫问题。

三峡库区文物保护是中国迄今规模最大的民族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三峡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全世界已引起极大的关注。因此,不仅应在投入这方面工作所需的经费予以优先照顾,而且建议按照国际惯例,在抢救和保护方面开展国际合作,争取国际组织的援助。至于台湾及海外华人的资助和参加保护工作更应当支持和欢迎。

(责任编辑:方 位)



秭归出土的东周铜壶

相濡以沫 共度难关

为一九九六年本刊调价敬告读者

今年以来，全球性的纸张价格不断上扬，严重威胁着报刊业的经营。

6月12日法新社发自香港的电讯称：全球最大的新闻用纸生产商 FCL 公司宣布，自9月1日起和其他主要纸厂同步把新闻用纸自每吨675美元，调涨为760元。

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主办的《新闻出版报》发表了《全球纸价暴涨，报业面临困境》的消息。

8月30日《光明日报》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中华读书报》在《明年杂志涨价幅度有多大？》的报道中惊呼：“始于年初的、以一周为期的国内纸张大涨价，不但困扰着每一位杂

志主编，也牵动着亿万读者的心。”

9月7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刊载的《如何对待纸张涨价》一文透露：“美国中央报业公司的统计数字表明，新闻纸价格在过去的9个月内上涨了近四倍，达到了三十年来的最高点。”文章说，由于不堪重负，继美国百年老报《休斯敦邮报》今年4月停刊后，香港《华侨日报》、《现代日报》也相继关张。美国中央报业公司今年以来由于营业成本推高，资金紧张，步履维艰。文章继而不无忧虑地说：“我国新闻出版业面临同样困境。”

“同在一个蓝天下”，《炎黄春秋》杂志社今年以来，也毫无例外地一直受此困扰。本刊每册3.20元的定价始自1994年1月。1995年售价未调，1月、2月尚能勉强维持，3月印刷厂因纸价飞涨开始诉苦，5月杂志社不得不给印刷厂增付印制费，提高幅度为22.55%。尽管印制成本大幅度增加，读者订费却因早已预交不得相应调整，致使杂志社处于亏损经营状态，每月亏损在

7000元左右。

长此以往，当然难以为继。“继”，则逃不开提价一着（儿）。《炎黄春秋》杂志如此，全国其他杂志亦然。据《中华读书报》报道，最近新闻出版署一负责人说：“杂志涨价将是读者来年面临的不争的事实”，“这是形势所迫”。那么，杂志涨价幅度有多大呢？该报援引统计资料说：《读书》涨幅40%；《读者》涨幅86%；《当代》涨幅30%；《半月谈》涨幅50%；《中国青年》涨幅71%……面对这样的形势，《炎黄春秋》明年售价上调多少呢？这使我们着实费了斟酌。

《炎黄春秋》是读者公认的具有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和收藏价值的严肃刊物。调查表明，私费订阅的比例极高，读者几乎都是被称之为“工薪阶层”的人们，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离休干部、退休职工，另外就是那些眼下并不“挣钱”而求知心切的青年学生，我们不能不郑重考虑他们的承受能力。陕西省一个偏僻县的读者，因为连半年的订费都无力一次总付，只得分月给编辑部寄钱买杂志。尽管如此情况者在读者中并非多数，但我们每每议论杂志定价时，总是想到他，想到类似的同志。好在我们杂志社的工资性支出很少（工作骨干多为只拿很少补贴的老同志），办公费用能省的还可以再省。这样精打细算，我们认为从1996年1月起，《炎黄春秋》由每册3.20元调到4元，把涨幅控制在25%，是合适的。对读者来说，负担不算过重；对杂志社来说，只要纸价今后不再大幅度上涨，维持正常出版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之所以如此敞开心扉，坦诚地作上述情况的交代，目的是得到读者的理解和支持，同我们一道度过目前的难关。这里也请读者放心，杂志社全体同志一定会将压力变成动力，更加珍惜刊物的每一个版面，编辑精选，以文章的高质量作为对读者支持的回报。

读者朋友，本刊同仁殷切期望着您的支持。续订《炎黄春秋》，增订《炎黄春秋》，向您的亲戚朋友和同志宣传《炎黄春秋》，是给本刊以实际支持的重要方式。相信我们的呼吁，一定能得到您的回应！

1996年报刊的征订工作已经开始，请您尽早去当地邮局办理订阅手续。《炎黄春秋》国内邮发代号为82—507。

如您在当地邮局订阅不便或一下子凑不够全年订阅款，可直接向杂志社发行部订阅或来函邮购，我们一定热心为您服务，满足您的要求。杂志平寄一律免收邮费。

《炎黄春秋》过四岁生日

为纪念《炎黄春秋》创刊四周年，我社于7月28日下午在文采阁举行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我社特邀编委、作者、专家学者。其中有陈沂、李锐、温济泽、廖盖隆、王强华、徐心华、力平、刘国雄、常征、苏双碧、王俊义、戴煌、解力夫、田方、张天来、王景山、尹骐、杨培新、陈英茨、方徨、林耀、林里、段向群、方恭蕴、王澍、陈大斌、于有海、张明江、吕隽、张秀平、孙延彭、舒云。

我社社长杜导正首先致词，对四年来给予我们热情支持的广大作者、读者和各方面同志致以衷心感谢。他说：本刊四年来所以赢得社会的好评和读者的称赞，主要是由于我们高举爱国大团结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贯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人、对事、对史的宣传力求真实、客观、公道，“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今年以来，我刊突出宣传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的正确性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宣传，动手较早，也较有章法，反映是好的。对我刊错别字多和个别文章事实有出入的问题，我们将采取有力措施，努力解决。今年纸张价格大幅度上扬，给刊物出版造成很大的困难。近几年来，参加我社理事会的、热心炎黄文化事业的企业家，都曾在经济上给我们以帮助。最近河南省炎黄文化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华鹏先生又为我社提供赞助并出任副理事长。我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与会者积极发言，热情祝贺《炎黄春秋》创刊四周年，对本刊给予高

度评价，并寄予厚望。原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沂说：今天有这么多老同志到会，说明《炎黄春秋》是有影响和受欢迎的。特邀编委温济泽说：《炎黄春秋》今年上半年对抗战胜利50周年的宣传是好的。以后历史题材的稿子要加强，观点不同的争鸣文章可以多刊登一些。要重视历史英雄人物的介绍，要从各方面积极宣传反腐倡廉。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刘一平说：《炎黄春秋》在读者中的反映是好的，它的内容真实，新颖，信息量大，可读性强。我们将利用我们

的优势，使更多的读者了解这个杂志。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景山在书面发言中说：《炎黄春秋》的成功我以为最主要的是，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办刊方针，而且有了一支较优秀的作者队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黑伯理、冯征、副会长杜子端出席座谈会。冯征代表研究会领导讲话。他对与会者表示感谢，对杂志社的同志致以慰问。希望《炎黄春秋》坚持既定的办刊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坚持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就改的作风，使《炎黄春秋》越办越好。

(赵友慈)

欢迎订阅 1996 年度团结报

《团结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办，1956年4月25日创刊。

《团结报》，中国八个民主党派唯一一张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参政党报纸。

《团结报》，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为和平统一祖国服务。

《团结报》，报道国家大事，反映民主人士意见；宣传爱国统一战线，报道改革开放成就。设有《台湾之窗》《爱国一家》《四海文萃》《文史长廊》《逸闻轶事》《百花园》《艺苑》《茶馆》《团结论坛》等专刊、副刊、专栏。

《团结报》，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熔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一报在手，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提高文化素养，丰富精神生活。

《团结报》周双刊，对开四版，每周三、六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统一刊号：CN11—0051；国内发行刊号：1—27；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外发行代号：D649。

《团结报》，每份零售 0.40 元 全年 41.16 元

社址：北京市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5250051(发行) 5231249(广告) 5250360(总编室)

冠心病在这里速康

郑州市管城中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共产党员王长勇公告：

●同是冠心病，各有各的症，治疗冠心病，必须要对症

●长期对患有冠心病的劳模、党员、离休干部、军烈属、五保户（有证件）免费检查，并根据特殊情况减免治疗费。

冠心病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它还易引起心绞痛、心肌梗塞、心房纤维颤动、房室传导阻滞等严重威胁生命健康的并发症。目前一般疗法着重控制病状，难以标本兼治。郑州管城中医院为此组织一批经验丰富的老中医，组成了由出身中医世家的王长勇主任为首的冠心病攻关小组，他们一方面挖掘传统中医疗法的精华，另一方面全方位探讨了上千个典型病例，找出病根，总结得失，并依据具体病因把冠心病分为气滞血瘀型、胸阳痹阻型、痰浊内阻型、气阴两虚型等十几种类型，分别组方，对症治疗，精心研制出心舒安系列纯中药制剂。该系列药具有豁痰通痹、活血化瘀、祛风通络、理气止痛、平肝潜阳、养心安神、降血压、降血脂、改善心脏功能，预防和治疗动脉粥样硬化、心肌梗塞、血栓形成等功效，对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胸闷憋气、高血压、高血压性心脏病、房室传导阻滞、心脏神经官能症等有药到病消的显著疗效，在临床应用中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用实际治愈病例克服了冠心病没法治疗的说法，从而为众多冠心病患者带来了康复的希望（节假日应诊）。

地址：郑州市城东路60号管城中医院

邮编：450004 电话：(0371) 6318501

从郑州火车站乘3路或29路车到东门口下车即到

郑州市管城中医院心血管病科病历卡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发病时间			血压		诊断
曾用药物			有无其它疾病		
心电图结论					
<input type="radio"/> 胸部憋闷 <input type="radio"/> 口干咽痛 <input type="radio"/> 心慌 <input type="radio"/> 惊恐 <input type="radio"/> 夜寐不安 <input type="radio"/> 不能平卧 <input type="radio"/> 耳鸣 <input type="radio"/> 多梦 <input type="radio"/> 胸部疼痛 <input type="radio"/> 口舌生疮 <input type="radio"/> 健忘 <input type="radio"/> 眼花 <input type="radio"/> 心中烦热 <input type="radio"/> 少食倦怠 <input type="radio"/> 疲乏 <input type="radio"/> 头痛 <input type="radio"/> 心悸气短 <input type="radio"/> 腰酸腿软 <input type="radio"/> 恶心 <input type="radio"/> 呕吐 <input type="radio"/> 肢体畏寒 <input type="radio"/> 四肢无力 <input type="radio"/> 小便清 <input type="radio"/> 喜热恶寒 <input type="radio"/> 头昏目眩 <input type="radio"/> 小便黄 <input type="radio"/> 头晕沉重 <input type="radio"/> 上肢水肿 <input type="radio"/> 高血脂 <input type="radio"/> 面色萎黄 <input type="radio"/> 下肢水肿 <input type="radio"/> 心律不齐 <input type="radio"/> 唇甲青紫 <input type="radio"/> 大便干结 <input type="radio"/> 大便稀溏 <input type="radio"/> 闷疼放射左肩背					
说明：1. 有上述情况在○内打✓号，剪下或复印此卡寄我院。 2. 寄来有关检查资料另附信件补充说明。					

解痉止痛 逐步消化骨刺 郑州市管城中医院治疗骨质增生有突破性进展

骨质增生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在临床上，由于骨质增生引起的头痛、头晕、四肢麻木、坐骨神经痛以至瘫痪的并不少见。手术疗法不仅给患者带来痛苦和不便，且复发率高，患者痛苦不堪。人们对此颇为头痛，因此开始求助于中医药的保守疗法，但效果都不尽理想。

郑州市管城中医院骨质增生专科，是我国最早研制使用中医药法治疗骨质增生的医疗单位之一。他们早期研制出的药物曾为5000余患者解除了痛苦。但由于疗程长，很多患者不能坚持用药。为此，该院骨质增生科医务人员努力攻关，在原有配方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完善，反复组方试验，终于研制出充分体现慢病快治，无毒抗复发的新一代骨刺膏和内服系列纯中药制剂。用于临床后证明，该系列药物采用膏贴、内服的方法，外敷药物通过皮肤渗透，内服药物持久地内攻，活血化瘀、祛风去湿、通络化刺、解痉止痛，可以从根本上抑制骨刺再生，并通过药物产生的长久抗力逐步将骨刺消化，对全身各部位骨质增生，特别是颈椎、腰椎、胸椎、膝肘关节和脚跟等部位骨质增生疗效显著，从而为众多骨质增生患者带来康复的希望（节假日应诊）。

郑州市管城中医院位于城东路60号 邮编：450004 电话：(0371) 6318501 从郑州市火车站乘3路或29路到东门口下车即到。

调理脾胃 祛病延年

● 竹林

祖国医学认为，人的疾病、寿夭与五脏六腑的关系非常密切，正如《灵枢》指出的“五脏坚固，血脉和调……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故能长久”。可见“脏腑坚固”是防病治病、养生长寿的必要条件。

在五脏六腑中，脾与胃相表里，被称之为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维持生命活动的一切物质，都必须依靠脾胃供给。《养老奉亲书》认为：“脾胃者，五脏之宗也”。“安谷则昌，绝谷则亡”、“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脾胃虚则百病生”，古人的这些论述充分地体现了脾胃功能的重要

性及其与人体生命活动的密切关系。

由此不难看出，调理脾胃就成为防病治病，养生保健，延年益寿的主要措施之一。即所谓“善治病者，唯在调和脾胃”。

脾胃系统的疾病是一类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发病率较高，对广大劳动人民的身心健康影响较大。祖国医学所说的脾胃系病包括了现代医学的多种疾病，如急、慢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胃神经官能症，急、慢性肠炎，肠结核，胃肠功能紊乱，消化不良，胃癌，以及某些肝、胆、胰等系统的疾病。

调理脾胃不仅能医治脾胃本脏腑的疾病，而且也可以间接或直接地医治全身脏腑病变，这是因为“脾胃为后天之本，能资生一身，脾胃健壮，多能消化饮食，则全身自然健壮”。

调理脾胃的方法很多，如有以药物（包括中、西药）调理的，有通过物理方法（电疗、磁疗、水疗等）调理的，有通过针灸的办法，以宣畅气机，调理脾胃，有通过饮食疗法达到调理目的的，亦有通过气功、刮疗、耳穴治疗等方法来调理脾胃，达到防病治病，延年益寿目的。这里向大家介绍一种既方便、又实用，既经

济、又实惠，疗效确切，而又无任何毒副作用的治疗方法。这就是由陕西咸阳抗衰老研究所所长来辉武教授发明研制的505神功元气疗法。患者可将505神功元气袋佩戴于神阙穴（就是人们常说的肚脐），药物可以通过皮肤的吸收、经络的传导、粘膜的吸收等途径，使其直接作用于脾胃，达到平衡阴阳，扶正固本，补肾壮阳，健脾和胃，延年益寿的目的。

505神功元气袋平衡阴阳，调理脾胃的作用在防治脾胃疾病方面已得到广泛的应用和临床验证。据统计（引自《505神功元气袋治疗千例疾病的分类总结》），该元气袋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炎、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慢性结肠炎、慢性肠炎、胃下垂、胆囊炎、慢性肝炎、胰腺炎、消化不良症等都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疗效。大量的临床资料表明，505神功元气袋的确是调理脾胃，却病延年的珍品。

中国咸阳保健品厂独家生产（严防仿制假冒）

中国医学科学院西安分院医药保健研究所监制

厂址：陕西咸阳市乐育北路19号

陕西咸阳抗衰老研究所研制

陕西咸阳五〇五医药保健总公司经销

联系人：周华

邮政编码：712003

电话：(0910) 213328 216586 213392

传真 (0910) 218606

电挂：8286

国卫药广审（文）第95060073—78号

邮购价：每条58.50元



炎黄春秋



1949年5月，李德全（前排左二）与林彪（前排左三）、刘少奇（前排左四）等合影



1949年6月，李德全（前排左二）与林彪（前排左三）、刘少奇（前排左四）等合影

“政治夫人”李德全

习仲勋和刘志丹的荣荣辱辱

红军总供给部长在乌兰巴托讨饭记

周恩来与国民党杀手张冲

伟哉！三峡文物保护工程

《文汇报》的奋斗岁月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3.20元